从中央委员到领导核心

1945—1978年间的邓小平

张金才◎著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人民出版社

策划编辑 / 荆彦周

责任编辑 / 唐　丽　段　鲲

美术编辑 / 于艳红

责任校对 / 付敬华


ISBN 978-7-202-10069-1
9 787202 100691
定价：35.00元

从中央委员到领导核心

1945—1978年间的邓小平

张金才◎著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中央委员到领导核心：1945－1978年间的邓小平 / 张金才主编.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5.5
ISBN 978-7-202-10069-1

Ⅰ. ①从… Ⅱ. ①张… Ⅲ. ①传记文学－中国－当代 Ⅳ.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81941号

书　　名	**从中央委员到领导核心——1945－1978年间的邓小平**
著　　者	张金才
策划编辑	荆彦周
责任编辑	唐　丽　段　鲲
美术编辑	于艳红
责任校对	付敬华
出版发行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人民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
印　　刷	河北新华第一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　　张	17.25
字　　数	195 000
版　　次	2015年5月第1版　　2015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2－10069－1/I・1086
定　　价	35.00元

序

程中原

兼具稳定性和灵敏度，是研究人员获得创新性成果的重要素质。我同金才同志共事十来年，一起做了几个课题，感到他是我们当代中国研究所兼具稳定性和灵敏度的有数的几位青年研究人员之一。最近几年，他在完成多项研究任务的同时，经过努力，写成了《从中央委员到领导核心——1945—1978 年间的邓小平》一书。这本书的成功，说明我没有看走眼，张金才同志的确是一位既勤奋又聪明，兼具稳定性和灵敏度的研究员。

作者把 1945—1978 年间的邓小平作为此书论述的内容，而尤以 1956 年中共八大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进入中央常委之后的十年为重点，这是一个非常高明的选择。其一，从历史的高度来说，邓小平从中央委员到领导核心，涵盖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两个历史时期，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怎样通过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成功地培养了自己的新一代接班人。这不仅对邓小平本人，就是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来说，都具有重大意义。其二，从邓小平的传记着眼，邓小平当选中央委员以后的传记，特别是担任总书记十年的传记，相比较而言，是研究不那么密集，相对不够充分的环节，在广度和深度上有较大的拓展和深化的空间，容易出新，容易崭露头角。其三，作者对这个课题有浓厚的兴趣，有相当的研究基础。在好几年以前，作者就把邓小平 1952—1978 年的生平思想作为重点研究方向了，而且写出了好几篇有影响的论文。所以，在接到出版

社约稿以后，能够很快在原有选题基础上加以扩展和加深。做好这个选题，写好这本书，可说是轻车熟路。

我怀着很大的兴趣，几乎是一口气读完了金才同志的这部新作。虽然从事邓小平生平思想研究属于我的专业范围，但是，我从这部新作中确实还是得到不少收获和教益。我感到这部著作至少具有以下两个非常显著的特点。我愿意郑重地向读者推荐这部著作。第一，内容丰富翔实，笔削得当，既具有真实性，也不乏新鲜感。

作者并不是专业的邓小平生平思想的研究者。在史料的占有上，也并没有特殊便利的条件。可是，作者通过各种渠道，对史料的搜集和整理下了异乎寻常的工夫，取得了非比一般的效果。特别可贵的是，大量的、主要的材料来自公开出版物，特别是人人都能看到和利用的《邓小平文选》和《邓小平年谱》。作者的功夫表现在材料的取舍上，可谓笔则笔之，削则削之。细致而不烦琐，扼要而不遗漏。从《南征北战》一章，我们看到邓小平从指挥“上党战役”“平汉战役”到“千里跃进大别山”直至指挥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取得解放全中国的胜利，为新中国的建立创下赫赫战功。从《主政西南》一章，我们又看到了邓小平的文治。这两章对邓小平文韬武略的评述中，读者自然从心里信服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评价：小平，文可以与少奇、恩来相比，武可以与林彪、彭德怀相比。指挥两个野战军的只有一个邓小平。小平举重若轻，善于决断。在《揭批高饶》《筹备八大》《整风反右》《论战主将》等人们熟悉的故事中，作者夹叙夹议，引用、评述了许多史料，也都是引自公开出版的书刊，但经过作者按照历史与逻辑统一的组织评述，显得真实、具体、细致、绵密，也不乏新鲜的内容。

第二，持论稳健，评价公允，体现史家眼光。

全面、客观、公允地判断和评论历史是非，特别是明确指出历史人物的缺点错误，做到不为尊者讳，是人物传记写作的一个难点，也是对作者是否忠实于历史，能否秉笔直书的一个考验。

在《整风反右》《"大跃进"中》这些章节中，作者没有讳言邓小平同志的缺点错误，持论稳健，评价公允，体现了良史的品格。关于反右派斗争，作者写道："邓小平同当时党中央主要领导人毛泽东一样，对反右派斗争的形势估计过于严重了。""过于严重的估计，把本应在一定范围内进行的斗争，扩展成一场全党和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思想战争和政治战争，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关于"大跃进"运动，作者也没有讳言"邓小平在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运动时表现出很大的热情，紧密配合毛泽东的部署。"在作了具体阐述和评论后，作者指明："后来，在总结这段历史时，邓小平对自己的责任从不讳言，更未否认。相反，他多次提到：'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同志都有错误。"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由此也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人物，实事求是，富有自我批评精神，是党史国史客观公允的基础。

目　录 Contents

切可能争取的人，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谨慎稳妥地消除历史遗留的民族隔阂，促成各民族的团结；发动和依靠群众，顺利完成土地改革和其他社会改革，加强各级政权建设；迅速恢复工农业生产，兴修成渝铁路以及和平解放西藏等，开创了西南地区稳定、发展的新局面。在此过程中，邓小平治党治政治军能力得到充分发挥，并有了新的全面提高，为他走上中央领导岗位创造了条件。

1952年下半年，中共中央决定将各中央局书记和大区主要负责人调到北京，并调整和增设中央及国家机关的部分机构。这年7月下旬，邓小平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离开工作了近三年的大西南，到北京担任政务院副总理。到中央工作后，邓小平受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器重。毛泽东批示："凡政府方面要经中央批准的事件，请小平多管一些。"

对于揭批和处理高饶，邓小平始终予以肯定。时隔25年后，他在回忆当年揭批高饶的情形时说："揭露高饶的问题没有错。""高岗想把少奇同志推倒，采取搞交易、搞阴谋诡计的办法，是很不正常的。所以反对高岗的斗争还要肯定。高饶问题的处理比较宽。当时没有伤害什么人，还有意识地保护了一批干部。总之，高饶问题不揭露、不处理是不行的。现在看，处理得也是正确的。"

中共八大是党和国家历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作为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承担了具体负责筹备八大的重任，并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从确定八大报告起草人到处理各种文件，从起草大会的报告到安排大会的具体日程，从讨论八大代表选举问题到提名八届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候选人，从审改大会发言



一致向前看》的讲话。这个讲话实际上是这次全会的主题报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并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经过这次全会，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

第一章 进入中央

DI YI ZHANG

邓小平缺席当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委员，进入中央委员会，这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他投身革命以来各个历史时期，特别是太行八年及主持中共中央北方局全面工作以来建立的卓著功绩及表现出的领导才能的肯定与认可。进入中央这在他政治生涯中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对于他后来成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成员和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都具有重要意义。

邓小平并没有参加中共七大。他于1943年10月代理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并主持八路军前方总部工作，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担负起领导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党政军的全面工作。1945年3月初，为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冀鲁豫根据地工作的指示，邓小平率北方局干部由总部驻地山西省左权县麻田镇出发，通过平汉铁路国民党军的封锁线，进入冀鲁豫地区，住在冀鲁豫分局和冀鲁豫军区司令部驻地河北省清丰县单拐村。中共七大召开之时，他正在冀鲁豫根据地领导开展军事斗争和群众工作。6月10日，也就是中共七大全体会议宣布中央委员选举结果的当天，毛

泽东即致电邓小平："拟在最近举行一中全会，你在七大当选为中委，望接电即赶回总部，待美国飞机去太行时，就便乘机回延开会。"[①]邓小平接电后，于6月中旬离开冀鲁豫根据地返回北方局总部，6月29日离开左权县麻田镇中共中央北方局机关，赴延安出席中共七届一中全会。

邓小平缺席当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委员，这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他投身革命以来各个历史时期，特别是太行八年及主持中共中央北方局全面工作以来建立的卓著功绩及表现出的领导才能的肯定与认可。

邓小平于1904年8月22日出生在四川省广安县协兴乡牌坊村。5岁进私塾发蒙，后转入新式小学。高小毕业后，考入广安县中学。1919年秋考入重庆勤工俭学留法预备学校，1920年夏赴法国勤工俭学。

邓小平到法国后，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影响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23年他参加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4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时年20岁。从此，他走上无产阶级职业革命家道路，成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他先后担任青年团旅欧支部的领导成员和中共党组织里昂区的特派员，还做过青年团机关刊物《赤光》杂志的编辑。1926年初，邓小平离法赴苏，先后在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山大学学习。在苏期间，邓小平比较系统、全面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和其他知识，为回国后进行革命活动奠定了充实的理论基础。

1927年春，邓小平受党的派遣回国，到西安冯玉祥国民军联军担任中山军事学校政治处处长兼政治教官，并任该校中共党组

①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604页。

织书记。邓小平回忆说："这个学校是当时担任国民革命军驻陕总司令于右任办的，于当时属于国民党左派，这个学校的主要职务都是由党派人担任的。校长史可轩是党员（后牺牲），副校长是由苏联回国的李林同志（我们在法国就熟识，李后在中央苏区牺牲），我同时担任校党的书记。学校经过短期筹备，很快办起来，学生不少是党团员，除了军事训练外，主要是政治教育，健全和发展党团等项工作。政治教育主要讲革命，公开讲马列主义，在西安，是一个红色的学校。这个学校在 1928 年成为陕西渭华暴动的基础。"[①] 这是邓小平回国后从事的第一项革命活动，前后不过三四个月的时间。

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邓小平于 1927 年 6、7 月间转赴汉口，到中共中央机关工作。9、10 月间随中共中央机关从武汉秘密迁往上海。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的两年间，主要担任秘书工作，负责管理中央机关的文件、交通、机要等事务，为中央的会议作记录，参与起草文件。1927 年底，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协助周恩来等领导人处理中央日常工作，主要管理中央机关的文书、机要、交通、财务、各种会议安排等，负责起草对一些省区的指示等文件，并继续为中央的会议作记录。1928 年 6、7 月间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时，他协助留在国内的李维汉、任弼时等领导人处理中央日常工作。1983 年 4 月 29 日，邓小平在同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中央代表团谈及当年的情景时说："我二十三岁就当中央秘书长。要讲马列主义水平，说实在的，马列主义的书看得不多，经验也不多。刚从国外回来，担任中央秘书长，这是个不低

① 邓榕著：《我的父亲邓小平：激情年华》，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58 页。

的岗位，但还是承担起来了。”[1] 1984年3月25日，他在同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谈及个人经历时又说：“我一九二七年从苏联回国，年底就当中共中央秘书长，二十三岁，谈不上能力，谈不上知识，但也可以干下去。”[2]

邓小平在中央机关工作期间，参加了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参与了会议的筹备工作，并在会上担任记录。会议批判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八七会议是一个转折点，中国革命从此开始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在这个重要转折关头，23岁的邓小平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也正是在这里，邓小平初次认识了毛泽东。

1980年7月15日，邓小平在参观八七会议会址，回忆会议的有关情况时说：“当时我们二十几个人是分三天陆陆续续进来的，我是第一批进来的，最后走的，在这里待了六天，会议开了一天一夜。当时政局变化很大，决定一部分人举行南昌起义，一部分人开这个会议。”又对接待人员说：“八七会议前，我住在武昌三道街，那是党中央所在地。会后，武昌局势紧张，我搬到汉口，和李维汉同志住在一个法国商人的酒店楼上。那时我不是党中央秘书长，一九二七年底我才当党中央秘书长。这个时候我是秘书。那个时候，陈独秀要搞大中央，搞八大秘书，我就算一个，以后没搞齐。”[3]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为挽救革命，发动了一系列武装起义。1929年8月底，邓小平受中共中央派遣，由中央机关交通

---

①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906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4页。

③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655页；《邓小平自述》，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版，第30—31页。

员龚饮冰陪同，乘船离开上海，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前往广西领导起义。1929 年 12 月，他和张云逸等发动百色起义，创建红军第七军和右江根据地。1930 年 2 月，又发动龙州起义，建立红军第八军和左江根据地。他出任红七军、红八军政治委员和前敌委员会书记。1984 年 3 月 25 日，邓小平在同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谈到个人经历时说："（我）二十五岁领导了广西百色起义，建立了红七军。从那时开始干军事这一行，一直到解放战争结束。"① 1986 年 1 月 27 日，他在游览漓江途中，又回忆起1929 年在广西领导发动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创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以及与李明瑞、张云逸等交往的情况，说："在百色、龙州起义过程中，有一天我在百色地区活动，在一条偏僻的小山路上遇到几个拦路抢劫的土匪。土匪拔出尖刀顶住我的额头，头皮被刺出了血。后来，抢走了我二十块光洋，才幸免脱险，终于摆脱了歹徒的纠缠，顺利到达目的地。""李明瑞是红七军、红八军建立时的总指挥，我是红七军、红八军的政委，当时才二十五岁。红七军很能打仗。"②

在邓小平等人的领导下，在 4 个多月的时间里，红军发展到 7000 人，红色区域扩展到 20 多个县，拥有一百多万人口，成为当时较大的革命根据地之一。就在这时，中共中央的领导发生了"左"倾冒险错误。1930 年 9 月底，中共中央代表邓拔奇来到广西，指示红七军离开右江地区去攻打柳州、桂林，最后打下广州，完成南中国革命。邓小平和张云逸等提出，桂系军阀恢复了在广西的统治，而红七军仅几千人，与势力强大的国民党军在大城市较量难以取胜，打柳州、桂林没有把握。邓拔奇等则坚决主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54 页。

② 《邓小平自述》，解放军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43 页；《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104 页。

张执行中央指令。为团结一致对敌，会议决定执行中央指令。[①]结果红七军在此后的战斗中连连受挫，不得不转战7000里，到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同中央红军会合。

1931年2月，邓小平在转战途中受前委委派，到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他化装成买山货的商人，由赣南特委交通员护送，步行数天，到达广东南雄，后由南雄交通员护送到韶关，乘火车到广州转道香港，乘船抵上海。在上海期间邓小平撰写了《七军工作报告》，详细叙述红七军、红八军建立和战斗的经过，左右江地区地方党的状况及土地革命工作，总结百色起义、龙州起义的经验教训。对于这个报告，受王明控制的中共中央不予理睬，还专门发出《中共中央给七军前委信》，指责红七军的工作。信中说："我们认为，立三主义的'左'的言词之下，右倾机会主义的本质与富农路线，没有像七军前委的领导表示的明显的了！"[②]

1931年6月，邓小平获准去中央革命根据地工作。8月初，到达江西瑞金。在中央苏区工作的3年间，邓小平先后担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会昌中心县委书记、江西省委宣传部长等职。也正是在这里，他遭受了政治生涯中的第一次磨难。此时，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他们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坚持从实际情况出发，执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反对"城市中心论"，主张向国民党军力量薄弱的广大农村发展；反对军事冒险主义，主张诱敌深入；反对用削弱地方武装的办法来扩大主力红军，主张两种武装力量都要发展；反对"左"的土地分配政策等正确意见进行了错误的斗争。邓小平被撤销省委宣传部长职务，受到党内最后严

①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70页。

②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82—83页。

重警告处分，被派往中央苏区边远的乐安县所属南村区委当巡视员。后来在军委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等人的支持下，邓小平被调到总政治部担任秘书长。不久，负责主编总政治部机关报《红星》报。1977 年 9 月 14 日，邓小平在同以河野洋平为团长的日本访华团谈到自己被打倒的经历时说："在江西根据地，王明路线夺了毛主席对红军、对苏区的领导权，还反对什么邓毛谢古路线。我算一个头头，叫'毛派头头'。这件事一般人不大知道。我能在被打倒后的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坚持下来，没有什么秘诀，因为我是共产主义者，也是乐观主义者。"① 1980 年 8 月 21 日，邓小平在同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谈话时，再次提及这段经历。他说："一九三二年在中央苏区，'左'倾领导者说我是毛派。他们把我作为毛派的头头整下去了。"②

1934 年 10 月，邓小平随中央红军长征，年底被调离《红星》报，接替生病的邓颖超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这是他第二次担任中央秘书长职务。邓小平之所以被任命为中央秘书长，是因为到遵义会议前，绝大多数党内和军内的高级干部已对"左"倾错误的领导强烈不满，毛泽东在党内、军内开始有了发言权。在他的影响下，中央任命邓小平为中央秘书长。1980 年 8 月 21 日，邓小平在同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谈话中说："在一九三五年我们历史上著名的长征中召开的遵义会议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和军队的领导地位。相应地，我那时也第二次当党中央秘书长。"③ 这段话十分清楚地解释了邓小平自中央苏区挨整后再次被起用的原因。

---

①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01 页。

② 转引自《邓小平画传》，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38 页。

③ 转引自《邓小平画传》，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41 页。

1935年1月，邓小平以中央秘书长身份参加了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并担任会议记录。1958年11月3日，他在参观遵义会议纪念馆时回忆说："会议室找对了，我就坐在那个角里。"① 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也是邓小平政治生命中的重要转机。1935年6、7月间，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邓小平由中央秘书长调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后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主任。1937年6、7月间，又被任命为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副主任。

卢沟桥事变后，全国性抗日战争由此开始。在中华民族的危急关头，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1937年8月25日，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下辖第115师、120师、129师。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改为第八路军政治部，邓小平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他所担负的八路军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了解部队改编后的思想状况，在实际工作中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国共合作和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为奔赴抗日战场做好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准备。时任八路军政治部组织部长的王平回忆，在部队开赴抗日前线前的半个月，邓小平找王平说："离出发还有半个月，你可以到部队了解一下情况，特别是部队接受改编后的思想状况，看看有什么问题。"王平去了第30军，见到萧克、李聚奎他们。在那里了解到，部队对于改编成八路军，把红军的帽子换成国民党军队的帽子不满意，情绪还没有转过来，许多人把红星八角帽摘下来，悄悄藏起来。他们说：我们外面是白的，里面却永远是红的！回总部后，王平把情况向邓小平作了汇报，

①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467页。

邓小平说他了解的情况很真实，很好。[①] 1937 年 8 月下旬，八路军开始向华北挺进。9 月初，邓小平随八路军总部出发东进，9 月 23 日抵达山西省五台县，进入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最前线。

1938 年 1 月，邓小平调任八路军第 129 师政治委员，师长是刘伯承。1 月 18 日，邓小平到达山西省辽县西河头村第 129 师师部就任，投身于抗日战争的烽火之中，由此开始了长达 8 年的太行山战斗岁月，也开始了他和刘伯承长达13年的合作共事。

邓小平和刘伯承率第 129 师深入日本侵略军占领区的后方，以太行山为中心，依托山区进行了一系列战斗，给日军以沉重打击。1938 年 2 月 22 日，第 129 师主力部队打响长生口战斗。经 5 小时激战，击毙日军 130 余人，俘日军 1 人。[②] 这是邓小平到第 129 师后参与指挥的第一仗，首战告捷。3 月 16 日，第 129 师打响神头岭伏击战。此役共毙伤日军 1500 余人，俘敌 8 人。[③] 3 月 31 日，邓小平协同徐向前指挥发起响堂铺伏击战。此役毙敌森本少佐以下 400 余人，烧毁汽车 180 余辆。[④] 4 月 16 日，邓小平和刘伯承、徐向前等指挥打响长乐村战斗。此次战斗共毙伤日军 2200 余人，缴获轻机枪 2 挺、步马枪 100 余支、马 10 余匹和大批军用物资。[⑤] 1939 年 1 月到 8 月，第 129 师共进行大小战斗 78 次，歼敌 2000 余人，收复多座重要县城。[⑥] 12 月 8 日，邓小平和刘伯承等共同指挥发起邯（郸）长（治）战役。此役共毙伤日伪军 700 余人，收复涉县、黎城两县城，拔掉响堂铺、井店等日军

① 转引自邓榕著：《我的父亲邓小平：戎马生涯》，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90 页。
②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79 页。
③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89 页。
④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95 页。
⑤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03 页。
⑥ 转引自《邓小平画传》，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54 页。

据点 23 处。[①]

邓小平和刘伯承所率第 129 师经过几次战役在太行山站稳脚跟后，分兵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创建了晋冀豫抗日根据地。接着，又率部越过平汉铁路，东进冀南平原，开辟冀南抗日根据地；还先后建立太岳和由鲁西等根据地合并而成的冀鲁豫抗日根据地。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1939 年 12 月，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向八路军总部和第 129 师所在的太行地区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邓小平后来在回顾二野历史时说："国民党同我们搞摩擦，几个大解放区都有，但最集中的是在晋冀鲁豫。"[②] 1940 年 3 月，刘邓指挥部队，在晋察冀军区部队的配合下，奋起反击，取得磁（县）武（安）涉（县）林（县）战役的胜利，共歼灭国民党军第 97 军朱怀冰部及其他反动游杂武装 1 万余人。[③] 此役后，第 129 师完全控制了冀南全部、太行北部、太岳北部共 71 个县，约 800 万人口的广大地区，[④] 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第一次反共高潮取得决定性胜利。1940 年 4 月 11 日，为统一领导太行、太岳、冀南三区的工作，成立太行军政委员会，邓小平任书记。

为粉碎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扫荡"，打击日军的"囚笼政策"[⑤]，从 1940 年 8 月 20 日起，八路军向华北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了大规模的破袭战役。战役初期出动兵力 30 个

---

①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67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36 页。

③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86 页。

④ 转引自邓榕著：《我的父亲邓小平：戎马生涯》，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254 页。

⑤ "囚笼政策"，是日本帝国主义妄图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人民武装和摧毁抗日根据地的一种残酷政策。它是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辅以封锁沟、墙，对抗日根据地军民实行网状压缩包围。

团，后陆续增加至105个团，史称“百团大战”。刘邓率领所部38个团参加，进行大小战斗500余次。太行军区部队在参加百团大战及反“扫荡”战斗中，共毙敌大队长2人、毙敌中队长3人、小队长以下被毙伤3389人。攻克据点、碉堡、县城、市镇7个，炸毁碉堡59个，给日、伪军以很大打击。[①] 对这场规模巨大的战役，邓小平于1941年4月28日在《反对麻木，打开太行区的严重局面》一文中进行了客观而中肯的评析。他指出：“百团大战给了晋冀豫边区各方面工作以最大的考验，也给了一二九师工作以最大的考验。百团大战证明了晋冀豫边区无论在军事上、政治上以及党和群众工作上，都有了相当基础，足使敌伪胆寒，足使全体军民具有充分的信心走向抗战胜利的道路。但百团大战同时也暴露了我们工作上的一些弱点，使得我们在百团大战之后，虽在主力兵团方面得到一些补充与休整，但在根据地的巩固上，则甚为严重。这表现在：敌占区日益扩大，抗战区日益缩小。”[②]

从1941年开始，在日军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夹击下，华北敌后抗战进入最艰苦的阶段。1942年9月1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太行分局成立，邓小平为书记。太行分局统一领导太行、太岳、冀南、晋豫（中条山）4个区党委工作。邓小平在进入太行山的5年间，作为第129师的政委，除配合师长刘伯承进行对敌斗争外，还十分注重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并从实际情况出发，先后撰写了《党与抗日民主政权》《一二九师文化工作的方针任务及其努力方向》《五年来对敌斗争的概略总结》《太行区的经济建设》等文章。这些文章对根据地的建设和发展起了十分重

---

①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325页。

② 《邓小平军事文集》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14页。

要的指导作用。

1943年10月6日，为精简领导层次，提高工作效率，中共中央决定：太行分局与北方局合并，撤销太行分局；第129师师部与八路军前方总部合并。八路军前方总部和北方局直接领导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4个军区。北方局直接领导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4个区党委的工作。因彭德怀、刘伯承等一批高级干部和将领已在党中央的安排下陆续前往延安参加整风学习，并准备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39岁的邓小平接替彭德怀代理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并主持八路军前方总部的工作，在艰苦的条件下，独立担负起领导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党政军的全面工作。

邓小平代理北方局书记期间，在坚持对敌斗争并不断取得胜利的同时，领导全区开展建党、建军、建政活动，进行整风、精兵简政、减租减息和大生产运动，取得很大成绩，胜利完成中央交付的各项任务。

在领导整风和审干工作中，邓小平将中共中央关于整风的指示和方针与北方局工作实际结合起来，使北方局的整风和审干工作深入健康地开展起来。1943年11月10日，邓小平在北方局党校第八期开学典礼上作整风运动动员报告。讲话指出：整风运动是我们建党的百年大计。我们党有22年多的历史了，我党始终站在最前线，为着民族和人民的解放事业而英勇奋斗，始终引导着中国革命向前发展、向前迈进。但是我们也有好几次挫折和失败的教训，每次的挫折或失败，都是学风、党风、文风“三风”不正占统治地位的领导所形成的恶果。我党自从1935年1月遵义会议之后，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彻底克服了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一扫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气氛，

把党的事业完全放在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直到现在已经9年的时间，不但没有犯过错误，而且一直是胜利地发展着。在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党中央的领导之下，我们回忆起过去机会主义领导下的惨痛教训，每个同志都会感觉到这9年是很幸福的，同时也会更加感到三风不正对我们的毒害了。讲话向参加整风的同志提出五条要求：第一，每个同志都要下定决心把自己的思想作风整好。第二，每个同志还要具有帮助别人整风的勇气，这是我们对党、对同志应有的态度。第三，整风要与检查工作联系，这是理论与实践联系的方法。第四，整风中思想上是会感到有压力的。整风不是对人而是对事，在真理面前屈服是可贵的精神，绝不是耻辱。第五，要提倡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态度，对同志、对自己、对上级都应抱有这种态度。[①]这篇讲话阐述了整风的目的、意义和端正整风态度的要求，指出毛泽东思想即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党的事业要以毛泽东思想作指导，是整风运动中的一篇重要文献，对太行区整风运动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

在整风过程中，邓小平还领导开展了审干工作。太行区的审干工作总的来说政策把握比较谨慎，但在一些地区和部门也出现了搞“坦白运动”等“左”的问题。邓小平及时发现并纠正了这些过“左”做法。1944年4月15日，邓小平在北方局会议上分析了审干中出现“左”的问题的原因及教训。他指出：我们的“左”是对当前情况和敌后环境认识不足，机械搬用延安的经验，所以谨慎不够，步骤不稳；在指导运动过程中执行中央的方针不够，首长负责有些粗枝大叶，调查研究得不够。由于我们主观主

①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6—93页。

义风气很盛，没有调查，没有材料，就容易发生错误，所以真正可怕的是领导的“左”。[1] 同年10月16日，邓小平在北方局党校审干工作会议上又明确提出“要有一个清理甄别阶段，真正搞错了的单位，在下半年都要做甄别平反工作”。[2] 由于邓小平在整风运动中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及时纠正“左”的偏差，北方局的整风运动取得较大成效，达到了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增强党性、巩固团结的目的，为此后对敌斗争的开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在领导精简工作中，邓小平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积极筹划和进行这项工作，在太行区做出了精兵简政的模范例子。1944年1月28日，邓小平在给师长刘伯承和政治部主任蔡树藩的电报中，通报了第129师直属部队和太行军区两次精兵的情况：师直及太行于1942年1月开始第一次精兵，中经2月“扫荡”，4月底全部完成。师直属有41个单位，减至19个单位，共减少233人。军分区和旅共减少158个单位，6214人。精兵后，统率机关人员占所有人员25%。全军区共减少7487人，以当时每人每年1000元计（粮食在外），全年节省开支750万元。第二次精兵于1943年3月开始，4月完成。原有两个野战旅的统率机关及直属部队一律取消，加强了战斗部队及军分区的组织，同时充实连队，只留一个甲种团、两个乙种团，余均照缩为丙种团。紧缩机关：司令部的作战、训练、通信各科、股合并，队务管理合并，取消很多乘马；军区司令部由160人再减至149人，政治部由250人再减至179人，分区直属所属战斗部队人数最多的是7与1之比，最少的是10与1之比，团的非战斗员也减少。编余人员的处理，第一次学习的1550人，送地方工作的320人，退伍安家的3661

①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514—515页。

②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539页。

人，余皆充实连队。第二次送延安 531 人，送其安家 1410 人，清洗 2242 人，均超过定额。冀南第一次精兵从 1942 年 2 月至 6 月完毕。共分三次进行，精兵后，军直共 280 人（特务团在外），分区直约减至 300 人，马匹减少 92%。分区完全取消私人勤务，司号、电话员均取消，共节省干部 1017 人，清洗战士 1084 人。[①] 通过精简，加强了部队的战斗力，充实了基层工作的领导力量，节约了人力、物力和财力，减轻了人民负担，同时提高了工作效率，克服了官僚主义，为适应新的更加艰苦的战争形势做好了组织准备。

在领导根据地经济建设中，邓小平高度重视财经工作，多次在北方局会议上专门研究经济问题。1943 年 10 月 12 日，他在北方局会议上指出，开展大生产运动、减租减息和救灾，是当年冬季和 1944 年全年的中心工作。[②] 同年 12 月 16 日，邓小平在北方局会议上再次强调，开展大生产运动和减租减息救灾工作，是 1944 年要做的三项工作之一。[③] 1944 年 1 月 8 日至 11 日，邓小平主持北方局召开的晋冀鲁豫区财经会议，研究确定 1944 年财经工作的总方针是：增加生产，扩大根据地的财富，发展工农业，克服财经困难，奠定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基础。会议决定在晋冀鲁豫全区发展 1000 个生产合作社，种植棉花 5 万亩解决穿衣问题。会议还议定提高生产贷款总额 64 万元及其他一些发展生产的事项。[④] 同年 6 月 9 日，他又在北方局研究太岳工作的会议上讲话指出：要对财经工作给以足够注意，把生产与发展根据地和经济联系起来，在农村中发展各种合作事业，建立合作社，发

① 《邓小平军事文集》第 1 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383—384 页。
②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492 页。
③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499 页。
④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502—503 页。

展对外贸易，增加人民收入，增加我们对换敌区物资的力量，增加对敌斗争力量。[①]

在邓小平的领导和带动下，晋冀鲁豫全区各根据地纷纷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并取得很大成绩。1944 年 10 月 23 日，邓小平在给毛泽东并刘伯承等人的电报中，报告了太行区农业生产、发展互助合作的情况。报告说：（一）目前太行区各阶层群众生产热情高涨，通过开荒、修滩地，耕作面积大大增加，土地深耕细作，生产技术创新，使组织起来的农民劳动效率普遍有了提高。社会秩序较为安定，阶级关系趋于稳定，到处是生产劳动的新气象，到处传播着人们创造新社会的口号，各阶层人士普遍感受到我党政策和领导的正确性。（二）经过秋荒和大生产运动，合作社跟着群众需要，为生产服务，得到群众热烈拥护，从而得到发展。由于正确执行自愿结合、等价交换等政策，互助组织发展很快。在运动中，产生了一批劳动英雄、劳动能手。总之，经过生产运动，合作社在正确的方针指导下，已取得大量发展。[②] 通过开展大生产运动，克服了财政经济困难，减轻了根据地人民负担，为此后对敌斗争的开展奠定了物质基础。

1945 年 2 月 20 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北方局会议上对个人一年多来的工作情况进行了总结。他说："在北方局工作的一年零四个月的时间里，主要是领导总直、党校工作和冀南后梯队三个月的整风，对太行、太岳工作汇报作了些指示，讨论了豫西工作及方针，帮助太行召开了两次财经会议，解决了一些问题。主要存在的问题是对民情了解得不够，对太行的帮助较太岳多些。1944 年工作方针基本是正确的，但也有缺点，主要是在审干工作

---

①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519 页。

②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541 页。

中机械地照搬延安经验。豫西方面的工作，以前没有把开辟河南工作放在北方局工作的议事日程上，经中央指示即开始注意，以后很快进行，还很顺利。1944 年生产成绩不小，合作社方面创造了一些好的典型。”[①] 应该说这个总结是全面的，也是实事求是的，比较准确地反映了邓小平主持北方局工作以来所取得的成绩。

邓小平在立马太行 8 年的艰苦岁月中，和刘伯承一道，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依靠太行区全体军民，经历过无数次战斗，克服种种艰难困苦，取得敌后抗战的重大胜利，开辟了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并进行了根据地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根据地不断得到发展和壮大。到 1945 年 8 月日本投降时，他们率部开创的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四块根据地已基本上连成一片，成为拥有 2400 万人口、30 万军队的全国最大的解放区。[②]

正是由于邓小平在上述各个革命历史时期所取得的卓著功绩，尤其是他在中共中央北方局独当一面过程中为敌后抗战和根据地建设作出的突出贡献及表现出的领导能力，中共七大才选举他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是邓小平政治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起点。

---

①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550 页。

② 转引自《邓小平画传》，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60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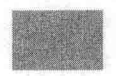
‖第二章

DI ER ZHANG 南征北战‖

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之后，邓小平的主要任务仍然是带兵打仗，一直到解放战争胜利。尽管南征北战，历尽艰辛，但邓小平却认为在他一生中“最高兴的是解放战争的三年”。他说：“那时我们的装备很差，却都在打胜仗，这些胜利是在以弱对强、以少对多的情况下取得的。”对于邓小平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建立的卓著功勋，毛泽东给予充分肯定。他在新中国成立后多次提到邓小平协助刘伯承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这是对邓小平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所作贡献的公正评价。

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之后，邓小平的主要任务仍然是带兵打仗，一直到解放战争胜利。

1945 年 8 月 15 日，也就是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停战诏书”形式宣布日本政府无条件投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结束的当天，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决定组建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邓小平、刘伯承等 8 人为常委，邓小平任书记。还决定成立晋冀鲁豫军区，邓小平任政治委员，刘伯承任司令员。8 月 20 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撤销中共中央北方局，正式



成立晋冀鲁豫中央局，并通报上述任职决定。

邓小平在担任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和晋冀鲁豫军区政委的两年间，和刘伯承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取得上党、平汉等一系列战役的胜利，有力地遏制了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的进攻。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在与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的同时，不断挑起局部战争。由刘邓领导的晋冀鲁豫解放区，横亘中原，正堵住国民党军队向华北、东北解放区进攻的通道，是军事上的战略要地，因此，国民党军队的进攻矛头首先就指向这个地区。1945 年 8 月 16 日，按照蒋介石密令，阎锡山命令国民党军第 8 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 19 军军长史泽波率领第 19、第 61 军主力 4 个步兵师及 1 个纵队（相当于师），从山西临汾、浮山、翼城进犯晋冀鲁豫解放区腹地上党地区。

1945 年 8 月 25 日，邓小平和刘伯承等致电中共中央军委，报告将发起上党战役。电报说：鉴于阎锡山共约一万五六千人进至上党地区，现已占领长治、壶关、长子、屯留、襄垣、潞城等 6 个县城。我为消灭该部，完全控制上党地区并声援当前的国共谈判，巩固抗战果实，决集结太行、太岳和冀南主力进行上党战役。[①] 9 月 10 日，邓小平和刘伯承指挥太行、太岳、冀南军区部队共 3.1 万人发起上党战役。12 日攻克屯留。17 日攻克潞城。19 日攻克长子、壶关。其间，长治守敌曾出动 6000 余人救援未果。9 月 20 日，部队激战 10 天，逐个夺取长治外围各城，使长治守军孤立无援，实现了上党战役第一阶段目标。10 月 2 日，部队在屯留西北王家渠等地合围阎锡山援军。经过数昼夜激战，至 6 日，阎锡山 2 万余援军仅 2000 余人逃回沁州，其余被歼。上党

①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563 页。

战役第二阶段攻城打援结束。10月8日，长治之敌突围西逃，解放长治城战役转入第三阶段追歼逃敌。10月12日，在沁河以东的将军岭、桃川地区全歼逃敌，史泽波被俘，上党战役结束。此役共歼灭阎锡山11个师及1个挺进纵队共3.5万余人，缴获山炮24门、轻重机枪2000余挺、长短枪1.6万余支。[①] 10月13日，邓小平和刘伯承致电中共中央军委，报告上党战役战果。报告说：上党作战即告完满的胜利结束。战役中党政军民一致协同，各地、县委书记，专员、县长亲赴前线组织后方工作，民兵等5万余人和野战军、地方军密切协作；军队各后勤部门在一切为了前线胜利的鼓励下，工作日以继夜，极为努力。部队给养颇好，伤员救护及时，军需运输很快。参战部队始终保持极旺盛的攻击精神，终能克服敌人旺盛火力，取得胜利。[②]

上党战役是抗日战争胜利后，晋冀鲁豫军区部队对国民党军队进行的第一个大战役，也是军区部队由分散的游击战向集中的运动战转变的第一个大战役。此役全歼侵入解放区腹地的国民党军队，不仅巩固了晋冀鲁豫解放区，而且大大加强了中国共产党在重庆谈判中的地位，对停战协定的达成起了重要作用。

上党战役尚未完全结束，邓小平和刘伯承即从前线返回晋冀鲁豫军区驻地涉县赤岸村，部署平汉战役。

平汉战役又称邯郸战役。邯郸是华北的战略要地，处于全国解放区中央，扼华北解放区大门，平汉铁路贯穿其中。1945年10月中旬，国民党军队自新乡一带沿平汉铁路侵入晋冀鲁豫解放区。10月下旬，其先头部队第40军、第30军、新八军到达磁县、邯郸以南地区。晋冀鲁豫军区部队在邓小平、刘伯承指挥下

①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573页。

②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575—576页。

奋力自卫，经一周激战，取得平汉战役胜利。

为消灭来犯之敌，1945年10月17日，中共中央致电晋冀鲁豫中央局："即将到来的新的平汉战役，是为着反对国民党主要力量的进攻，为着争取和平局面的实现。这个战役的胜负，关系全局极为重大。"希望"由刘邓亲临指挥"，利用上党战役经验和上党战役精神，动员太行、冀鲁豫两区主力，团结一致，不失时机，精密地组织各个战斗，准备一个半月以上的时间，在连续多次的战斗中，争取歼灭八万顽军的一半左右或较多的力量。[①] 10月22日，平汉战役打响。邓小平和刘伯承遵照中央指示亲临前线指挥。他们一面指挥部队加紧攻击和围困来犯之敌，一面加紧分化瓦解敌军。10月28日，鉴于后续部队已到达预定位置、各项准备就绪，参战各部对被围的第40军、第30军、新八军发起总攻。以第1纵队、第2纵队及冀南、冀鲁豫军区部队和太行军区一部的北集团作为总攻突击队，主攻第40军，特别是着重割歼其已遭受打击、突出于北端的第106师；以第3纵队等部的南集团，钳制第30军，佯攻新八军。10月30日，国民党军新八军军长高树勋率部近万人在马头镇宣布起义，加快了战局发展。国民党军兵力骤减，部署出现缺口，军心动摇，加以连日受击，其第30军、第40军向南撤退。10月31日，鉴于第40军军长马法五率主力开始向南突围，邓小平和刘伯承指挥所部于当晚突袭马法五长官部，实施多路出击、兜击，将其包围在后旗杆、中漳、前旗杆、辛庄、马营一带，随后发起攻击。11月2日战役结束。此役除争取高树勋率新八军等万余人起义外，共毙伤敌3000余人，俘获马法五等高级军官以下1.7万余人，缴获大量武器、弹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59—360页。

药等。[①]

对于上党、平汉两个战役，邓小平1989年11月20日在会见编写第二野战军战史的老同志时做过详细的回顾。关于上党战役，邓小平回忆说："整个解放战争，从头到尾，二野都处在同敌人针锋相对斗争的最前面。开始在晋冀鲁豫，用刘伯承同志的话说，这里是华北解放区的大门，敌人要进攻首先就从这个口子来。果然，毛主席到重庆谈判的时候，敌人从两路来。一路是阎锡山，我们就手打了个上党战役。接着对马法五、高树勋一路，又打了个平汉战役。抗战胜利后，他们进攻解放区首先攻的就是这个大门，而我们守这个大门的力量并不强。阎锡山进攻上党区有三万八千多人，我们比他们还少一点，也就是三万出头，从编制上讲，一个完整的、编制充实的团都没有，而且装备很差，弹药很少，可以说是一群游击队的集合。还有就是临战前没有指挥作战的将军，那时只有李达在前线，好多将军都不在，在延安开会。我们是乘坐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的运输机回太行的，同机飞回的有伯承和我，还有陈锡联、陈再道、陈赓等。那时宋任穷留在冀南。仗已经打得热火朝天了，我们才到，一下飞机就上前线。在那样的情况下，把阎锡山的进攻部队完全消灭可不容易啊，应该说是超额完成了任务。"[②]

关于平汉战役，邓小平回忆说："随后就是平汉战役，国民党第十一战区两个副司令长官马法五、高树勋带的三个军，还有一个乔明礼的河北民军纵队，几个部队打过来。马法五的第四十军、三十军都是强的。高树勋的新八军也有战斗力呀！锡联在马头镇拼了一次，一拼就是几百人伤亡。我们打平汉战役比打上党

①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581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6—337页。

战役还困难。打了上党战役，虽然弹药有点补充，装备有点改善，但还是一个游击队的集合体。在疲惫不堪的情况下，又打平汉战役。队伍没有到齐，敌人进攻。我跟苏振华通电话，叫他坚持五天，等后续部队到达指定地点。那次他们那个一纵队的阻击战是打得不错的，完成了阻击任务。这样，后面的队伍才赶上。平汉战役应该说主要是政治仗打得好，争取了高树勋起义。如果硬斗硬，我们伤亡会很大。我一直遗憾的是，后来我们对高树勋处理不公道。他的功劳很大。没有他起义，敌人虽然不会胜利，但是也不会失败得那么干脆，退走的能力还是有的，至少可以跑出主力。他一起义，马法五的两个军就被我们消灭了，只跑掉三千人。这个政治仗，我们下的本钱也不小。高树勋在受汤恩伯指挥的时候，就同我们有联系。由于关系比较久，所以我们是派参谋长李达亲自到马头镇他的司令部去做工作的。这件事你们好多人可能不知道。同李达一起去的还有王定南，当时是我们的联络，我见过多次。我们确实知道高树勋倾向起义，但在犹豫当中。那时国民党要吃掉西北军，有这个矛盾。李达、王定南一到那里，看见所有的汽车、马车都是头向南，准备撤退的。他们见面后，一谈就合拍了，高树勋决定起义，并且第二天就实行起义，把部队开向西北面的解放区。起义的第二天，伯承就到马头镇去看望高树勋。这样，马法五就惊慌了，命令他的两个军南撤。结果，我们在南面，在漳河北岸，把敌人截住了，又打了一个胜仗。”[①]

1946年6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邓小平和刘伯承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在陇海铁路南北开展运动战，大踏步进退，连续

---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7—338页。

进行了陇海、定陶、巨野等一系列较大规模的战役，歼灭大量国民党军队的有生力量。

1946年8月10日，邓小平和刘伯承指挥发起陇海战役。各参战部队在150公里的宽正面，突然向陇海路兰封、黄口段沿线之敌发起攻击。战斗到11日拂晓，第6纵队攻克兰封城，第7纵队攻克砀山县城和车站。至12日，各参战部队又先后攻克李庄集、杨集、刘堤圈、柳河集、李坝、野鸡岗、兰封、罗王诸车站，歼灭守敌5000余人，控制与破坏铁路150余公里。15日，第6纵队主力攻克杞县，水东军分区部队攻克通许，第3纵队围歼国民党军整编第55师第188旅。8月22日，陇海战役结束。此役共歼敌正规军约2个旅，连同保安队共1.6万人，攻克县城5座，车站10余处，破坏铁路150余公里，截断了敌东西交通干线，打乱敌南线作战计划，减轻了中原野战军负担。[①] 陇海战役是奇袭制胜的典范，在邓小平和刘伯承精心大胆的运筹下，采取出敌不意、长驱纵深、突然袭击的战术，有力而迅速地取得战果，并达到了吸引进攻其他解放区的国民党军回援的目的。

陇海战役后，国民党军在郑州、徐州两个方向集中30余万人向冀鲁豫和豫北地区展开大规模进攻，企图以优势兵力合击晋冀鲁豫野战军于定陶、曹县地区，并引黄河水入故道，从而分割解放区，控制鲁西南，然后以主力进击漳河地区，打通平汉路。面对来势凶猛的国民党军，邓小平和刘伯承分析敌情，认为东西两路来敌中，以由郑州方面东进的西路较弱，西路中又以整编第3师、第47师为主力，如能歼灭其一或两个师的大部，即可粉碎西路之敌进攻，破坏国民党军郑州、徐州的钳形攻势。为此，他

①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626页。

们决定进行定陶战役。9月2日，定陶战役开始。6日晨，国民党军整编第3师第20旅被全歼。战至下午，整编第3师师部率第3旅向南突围，企图向整编第47师靠拢。参战各部乘敌脱离工事，混乱退却时机，全线出击。整编第3师残部大部被歼灭，俘获师长赵锡田等高级军官。7日，野战军主力向整编第47师侧背实施猛烈袭击。至8日，定陶战役胜利结束，共歼敌4个旅1.7万人，毙伤敌5000人，粉碎敌军钳击歼灭我军的计划。① 此役扭转了整个解放区南线的严重局势。

定陶战役刚结束，国民党军以其主力新五军和整编第11师进犯巨野地区。为阻止国民党军继续前进，1946年10月1日，邓小平和刘伯承等决定发起巨野战役。具体部署为：以冀鲁豫军区部队钳制菏泽、金乡地区之国民党军，以第2纵遏制国民党军第5军于龙固集以西地区，集中第3纵、第6纵、第7纵，歼灭突出于张凤集地区的敌整编第11师第11旅。10月3日，根据既定战役部署，野战军主力于当夜发起巨野战役。此役激战至7日上午，整编第11师第11旅第32团和附属该团的特种兵共3000余人被歼。连同龙固集运动防御战，巨野战役共歼敌5000余人。②

国民党军不让晋冀鲁豫野战军有丝毫喘息。1946年10月中旬，国民党军整编第27军军长王敬久又率部向晋冀鲁豫野战军袭来。10月29日夜，邓小平和刘伯承指挥部队发起鄄城战役。采用以优势兵力先包围，后分割歼灭战法，指挥第2纵队、第3纵队主力分别由西南、北面向南兜击，第6纵队从东南攻击，继续以第7纵队牵制王敬久部。31日，鄄城战役结束。歼敌9000

---

①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629页。

②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634页。

余人，俘虏整编第 68 师第 119 旅旅长刘广信，缴获一批美造榴弹炮、山炮、迫击炮、小炮及甚多军用品。[①] 此役不仅歼灭了国民党军有生力量，阻止了国民党军的进攻势头，而且在武器装备上大有收获。

接连的胜利使晋冀鲁豫野战军人员得到补充，装备得到改善，进行大规模运动战的经验更加丰富，全军士气高涨。在这样的情况下，邓小平于 1946 年 11 月 4 日向全区部队发出号召，再打几个大胜仗。11 月 10 日，根据国民党军孙震集团整编第 41 师、第 47 师等部在滑县地区的部署情况，邓小平和刘伯承等下达关于滑县战役基本命令，决定采用“猛虎掏心”战法，对其实施远距离奔袭。15 日夜，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在各钳制部队和游击队积极活动的掩护下，由濮县附近及鄄城以北地区西移，秘密向预定目标开进。18 日夜，滑县战役发起。参加攻击的部队从国民党军第 104、第 125 旅及河北保安第 12 总队三部分敌人的接合部，突然透入其防御纵深 40 余公里，割裂国民党军相互间的联系。19 日拂晓，各纵队分别向当面之敌发起猛攻，至 20 日中午，第 104 旅等部被歼灭。各纵队又向北卷击，扩张战果，攻歼国民党军第 125 旅。至 22 日夜，全歼黄庄守敌，滑县战役结束。此役历时四天五夜，共歼国民党军第 104 旅全部（俘虏其正副旅长）、第 125 旅大部（该旅长仅率数十人逃跑）及河北保安第 12 总队全部，共约 1.2 万人。缴获大批枪支、弹药。[②]

为继续实现打通平汉铁路的计划，国民党军 5 万余人从滑县北犯晋冀鲁豫解放区腹地。1946 年 12 月 30 日夜，邓小平和刘伯承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突然向巨野、金乡、鱼台地区国民党

---

①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638 页。

②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641 页。

军发起攻击，巨金鱼战役开始。次日，第7纵队攻占聊城，歼守敌一部；第3纵队攻克巨野、嘉祥，全歼守敌；第6纵队进军城武途中转取金乡，歼敌一部。1947年1月8日，第3、第6纵队等将由鱼台增援金乡的国民党军整编第88师第62旅和刚由台湾调来的第70师第140旅包围在鱼台西北地区，于夜晚冒雪发起攻击。1月14日，第1、第2、第7纵队，对在飞机掩护下突围逃跑的刘汝珍部实施猛烈追击，将其包围于定陶以东西台集地区，经15、16两日围攻，除刘汝珍逃脱外，全歼该敌。同时，第3纵队追歼张岚峰部另一个团，并于16日乘势收复成武。至此，巨金鱼战役胜利结束。此役，晋冀鲁豫野战军挺进国民党区，连续行军20余天，辗转300余公里，共歼国民党正规军3个半旅，缴获大量武器装备，收复县城9座。①

1947年1月19日，中央军委指示晋冀鲁豫野战军：当前形势极为有利，望乘胜展开攻势，向你们附近广大地区敌占据点中一切薄弱可攻取者扩大攻取，收复大批失地。并指出：陇海路北、路南均可视隙往返机动，寻歼好打之敌。1月24日，为实现中央军委指示，邓小平和刘伯承分别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陇海路南北两个集团发起豫皖边战役。至2月4日，刘伯承率北集团连续攻克定陶、单县、曹县等城。邓小平率南集团于1月27日转到路南，连克柘城、太康、鹿邑、杞县及皖北重镇亳县等5城。2月6日，邓小平电转中央军委，报告指挥第6、第7纵队南下陇海路五天战果：占领4个县城及定襄城等据点多处。共歼第75师第16旅两个团及炮兵营、张岚峰两个团及1个营、省县保安团3个团等，毙伤约1500人，俘虏约7000余人，缴获大小炮三

---

①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651—652页。

四十门，轻重机枪三四百挺，步枪约五六千支。[1] 2月11日，南北作战集团向民权以西郑庄砦地区的国民党军整编第85师发起进攻。两作战集团以运动防御吸引王敬久集团主力于冀鲁豫地区，打破其东进参加“鲁南会战”计划。至此，豫皖边战役胜利结束。此役共歼敌1.6万余人，收复了陇海路南北广大地区。

为配合陕北、山东两解放区粉碎国民党军的重点进攻，1947年3月23日，邓小平和刘伯承指挥发起豫北反攻战役。4月1日，野战军主力围攻驻守汲县的国民党整编第32师。至2日夜，攻占汲县城东关与外围据点多处。鉴于第32师主力固守城内，不便攻歼，新乡地区国民党军准备向汲县增援，邓小平和刘伯承决定结束汲县战役（豫北反攻战役第一阶段结束），挥师北上，进行第二步作战。4月3日，野战军各集团分路急速北进，至10日，攻克淇县县城及回隆等据点数十处，并围攻汤阴，逼进安阳。豫北反攻战役第二阶段结束。4月16日至18日，野战军主力进行围攻汤阴打援战役。经两昼夜激战，全歼国民党军第2快速纵队，并乘胜追击，扩大战果。此役共歼国民党军1.3万余人。5月1日，野战军第3集团向汤阴守军发起总攻。2日，攻克汤阴，全歼孙殿英以下7000余人。7日，攻克崔桥，歼国民党军2000余人。5月25日，野战军攻克安阳外围据点多处，歼国民党军共6000余人。鉴于安阳敌情和城防情况，邓小平和刘伯承决定停止进攻安阳，以太行、冀南军区独立旅围困该敌，野战军则转入休整。豫北反攻作战即告结束。此役历时近两个月，共歼灭国民党军4万余人，解放9座县城和南北长150余公里、东西宽100余公里地区，控制平汉铁路150余公里，缴获大批粮食

①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656页。



和其他军用物资；配合了西北、山东野战军作战，为发起战略进攻创造了有利条件。[①]

至此，邓小平和刘伯承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在陇海路南北先后八次与国民党军队较量，取得八战八捷的胜利，给国民党军队有生力量以有力打击，打出了刘邓大军的赫赫威名。

对于内战开始后一年来的作战情况，邓小平后来回忆说："在解放战争第一年，我们完成了中央军委规定的歼敌指标。战争开始三个月后，毛主席就说，全国战场只要每个月消灭国民党八个旅，这个仗就肯定能打胜。果然，第一年就歼敌九十七个半旅，略超过一点。就二野所在地区来说，完成了分配给自己的份额，也许还超过一点。"[②]

根据战局变化，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定由战略防御提前转入战略进攻，指示邓小平和刘伯承准备突破黄河防线，出击中原，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对此，邓小平后来回忆道："由于圆满地完成了任务，战略反攻的时间提前了，比预定的不止提前一年两年。解放战争开始时没有提出反攻的问题，那时反攻时间还捉摸不定。从一九四六年七月开始，到一九四七年六七月，打了一年就很有把握地确定反攻。要说原因，一个是第一年歼灭了近百个旅的敌人，相应地我们的装备也有所改善。另一个原因是客观形势迫使我们要早反攻。那时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和延安，这好比是扁担的两头。我们晋冀鲁豫在中间，虽然不是敌人重点进攻的地区，但是是一个挑扁担的地区，伯承同志讲的是'扁担战略'。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两头的敌人吸引到中间来，而我们的

---

①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668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38 页。

战略反攻，实现了中央军委、毛主席的战略意图。”[①]

1947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以邓小平、刘伯承、李先念等组成中原局，邓小平任书记，领导中原地区党政军工作。6月21日，邓小平以中原局书记身份在晋冀鲁豫野战军直属队股长营级以上干部会议上作战略反攻动员报告。他指出：由于蒋介石反动集团面临着严重的军事危机，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了。蒋介石“线”不能保持住，“点”也不能保持住，所以，不能不来一个重点防御。我们歼灭蒋军90个旅以上，战局没有理由不发生变化，事实上已经发生变化了。既然起了基本的变化，为什么不能反攻呢？今天我们不是怕什么冒险主义，而是怕对形势估计不足，怕我们的认识赶不上客观形势发展的需要。从军事上看，敌人采取重点防御。我们就占“面”，有机会就占地方。地方占多了，人口增加了，兵员解决了，财政也解决了。反过来敌人就困难了，敌我力量对比又要起新的变化，道理就在这里。反攻出去很好。[②]这次讲话为晋冀鲁豫野战军实施战略进攻做好了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准备。

6月30日晚，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战略部署，邓小平和刘伯承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第1、第2、第3、第6纵队共13个旅12万余人，在冀鲁豫军区第1旅、第2旅接应下，从山东阳谷以东张秋镇至菏泽以北临濮集间150公里的8个地段上强渡黄河天险，突破国民党军黄河防御线，转入外线作战。

为配合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强渡黄河，7月1日至28日，邓小平和刘伯承指挥发起鲁西南战役。4日，太行军区、豫皖苏军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8—339页。

② 参见《邓小平军事文集》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0—26页。

区部队相继发起攻势作战，攻克博爱、沁阳两县城，歼敌近 2000 人。9 日，收复亳县县城。7 月 7 日晚，第 1 纵队和独立第 1 旅对郓城守军发起攻击，经 9 小时激战，至 8 日拂晓，全歼整编第 55 师两个旅共 1.5 万余人，取得大反攻中第一个重大胜利。7 月 10 日晚，第 6 纵队攻克定陶，歼灭国民党军第 63 师第 153 旅，俘敌 3130 人，毙伤 200 余人。7 月 12 日夜，第 1、第 2、第 3、第 6 纵队完成割裂和包围国民党军第 66 师、第 32 师、第 70 师。13 日夜开始攻击。至 14 日夜，全歼国民党军第 32 师和第 70 师。7 月 15 日，野战军主力将国民党军整编第 66 师 1 个半旅包围在羊山集，准备发起攻击。27 日，向羊山集守军发起总攻。28 日，全歼整编第 66 师，俘虏师长宋瑞珂以下 9000 余人，毙伤 5000 余人。鲁西南战役胜利结束。此役历时 28 天，歼灭国民党军 9 个半旅、4 个整编师师部共 5.6 万余人，[①] 有力地配合了西北和山东解放军粉碎国民党军的重点进攻，为挺进大别山开辟了通路。

7 月 23 日，鲁西南战役尚未结束，邓小平和刘伯承收到中央电报，要他们“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占领大别山为中心的数十县，肃清民团，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吸引敌人向我进攻打运动战”[②]。7 月 29 日，邓小平又接到中央军委电报，说“现陕北情况甚为困难”，[③] 希望他们尽快挺进大别山。邓小平和刘伯承当机立断，决心提前结束休整。8 月 7 日晚，他们率领野战军主力 4 个纵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越过陇海铁路，向大别山挺进。8 月 27 日，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历经

---

①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672 页。

② 转引自《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673 页。

③ 转引自《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675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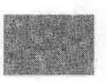
20 天连续急行军千余里，冲破国民党军围追堵截，先敌进入大别山区，胜利完成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战略任务，由此揭开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战略进攻的序幕。

对于当年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困难情景，邓小平后来回忆说："毛主席打了个极秘密的电报给刘邓，写的是陕北'甚为困难'。当时我们二话没说，立即复电，半个月后行动，跃进到敌人后方去，直出大别山。实际上不到十天，就开始行动。那时搞无后方作战，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啊。""往南一下就走一千里，下这个决心，真了不起，从这一点也可看出毛主席战略思想的光辉。而这个担子落在二野身上，整个解放战争最困难的是挑这个担子，是挑的重担啊。不是说消灭敌人九个半旅是挑了重担，主要的是撇开一切困难，坚决地挺进一千里，挑的就是这个重担。过黄泛区，真困难啊，重装备带不走了，只能丢了，所以打淮海战役的时候，二野的炮兵就很少。过淮河，天老爷帮了一个大忙，能够徒涉。过去没有人知道淮河是能够徒涉的，那一次刚涨起来的河水又落下去了，伯承亲自去踩踏，恰好就是那个时候能徒涉，这就非常顺利了。不然，我们过淮河还是能过，但会有伤亡，以后的斗争会更困难一些。当时形势相当严峻，相当险恶，但是整个地看应该说是很顺利地实现了战略反攻的任务，跃进到大别山。"①

跃进到大别山不易，在大别山站稳脚跟更难。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地区后，对国民党在长江以南的广大统治区形成直接威胁，迫使国民党军队调动主力回援，围困大别山地区的国民党军增加到约 20 万人。邓小平和刘伯承领导大别山军民积极灵活地

---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39、340 页。



打击敌人，不断粉碎国民党军队对大别山地区的重兵轮番“进剿”。与此同时，他们采取正确的军事政策，准确判断形势，充分发动群众。经过几个月的艰苦斗争，站稳了脚跟，完成了战略展开，建立了大别山根据地。1948年1月15日，邓小平和刘伯承致电毛泽东：“现在看来我们业已站住，不管情况如何严重，敌人是撵不走我们的。”①

对于这段艰难的历程，邓小平后来在回顾二野历史时作过详细的讲述。他说：“大别山这场斗争，主要是我们政策对头，包括军事政策。军事政策就是坚决地拿出三分之一的野战部队地方化，搞军区、军分区。因为大别山的斗争不决定于消灭好多敌人，而决定于能不能站住脚。这是毛主席的战略决策。什么叫胜利？胜利不在当时消灭多少敌人。要不要消灭敌人？要消灭，要争取打几个歼灭仗。从这一点来看，我们完成得并不好，消灭的敌人不多，除地方保安部队外，一共只消灭了几个旅。但关键是能不能站得住，站得住就是胜利，结果，我们站稳了。我们前进了一千里，直达长江，面对着武汉、南京、上海，扩大了四千五百万人口的新解放区。这是个真正的胜利，前进一千里的意义就在这里。”

又说：“大别山战略机动范围不大，容不下更多的部队，特别是我们习惯于在平原地区搞大开大合的作战，到这里感到很拘束。所以，把部队分开建立军区、军分区以后，主力就逐步向北面转移。中间还有些插曲，就是部队的同志着急，总想打个把歼灭战。我们开了个会，我讲的话，提出要避战。因为那时打不得败仗，一败就不可收拾。后来刘邓分开了。伯承率领一纵和野战

①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710页。

军的司令部、直属队到淮河以北，指挥全局。南下大别山的两个后续部队王宏坤、张才千的十纵和十二纵，也不在大别山，向桐柏、江汉两区展开。就是我一个，先念一个，李达一个，带着几百人不到一千人的前方指挥所留在大别山，指挥其他几个纵队，方针就是避战，一切为了站稳脚。那时六纵担负的任务最多，在大别山那个丘陵地带来回穿梭，一会儿由西向东，一会儿由东向西，今天跑一趟，明天跑一趟，不知来回跑了多少趟，调动敌人，迷惑敌人。别的部队基本上不大动，适当分散，避免同敌人碰面。这样搞了两个月，我们向中央军委、毛主席报告，大别山站稳了，实现了战略任务。主力撤回北面，准备大的战斗，大的战斗还是到北面去打。大别山斗争的胜利，主要是对几个问题的判断比较准确，处置也比较正确，我们伤亡不算很大，费的劲也不算很大，但是完成了战略任务，种种艰难都克服了，站稳了脚，把战线从黄河延伸到长江。”①

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同相继南下的另外两支野战大军在中原地区布成“品”字形阵势，牵制和吸引了国民党军南线 160 多个旅中的 90 个旅的兵力，把战线由黄河南北推进到长江北岸，使中原地区由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的重要后方变成了人民解放军夺取全国胜利的前进阵地。

为加强中原局的领导，1948 年 5 月 9 日，中共中央军委致电各战略区，通报关于改变中原解放区组织及其辖境与人事安排的决定。决定指出，除华中解放区现辖境地外，凡陇海以南长江以北直至川陕边区均属中原解放区。中原中央局以邓小平为第一书记。晋冀鲁豫野战军改为中原野战军，邓小平为中原军区暨中原

---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40—341 页。



野战军政治委员。

在开辟中原新解放区的过程中，邓小平根据中共中央的方针，从中原新解放区实际情况出发，对大别山的土地改革问题提出重要意见。1948 年 1 月 22 日，他在给毛泽东的电报中提出，大别山可分为巩固区和游击区两种区域。在巩固区应实行充分的贫农路线，满足贫农的土改要求。为达到此点，富农的粮食、耕牛、农具、土地、埋藏现金，必须拿出分配。对弱小地主的衣物、家具在分配时，留出自用的部分。对中农一般采取不动的政策为好，不是强制地打乱平分，使中农不满。在游击区一时期内还谈不上平分土地。[①] 同年 2 月 8 日，邓小平在给毛泽东的电报中再次提出新区土改工作应分阶段分地区地逐步深入。这些意见受到毛泽东的肯定和称赞。他在转发邓小平电报的批语中说："（一）小平所述大别山经验极可宝贵，望各地各军采纳应用。（二）分阶段分地区极为必要。"[②]

1948 年秋，解放战争进入夺取全国胜利的战略决战阶段。11 月 6 日至 1949 年 1 月 10 日，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联合举行淮海战役。战役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至商丘、北起临城、南达淮河。为统筹战役作战和地方支前事宜，中共中央军委决定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总前敌委员会，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为常委，临机处置一切。邓小平为总前委书记。战役分为三个阶段：11 月 6 日至 22 日为第一阶段。华东野战军在碾庄圩地区歼灭黄百韬兵团约 10 万人，击毙兵团司令官黄百韬。中原野战军 11 月 15 日攻克宿县，会同华东野战军一部，切断徐蚌线，完成了对徐州的包围。11 月 23 日至 12 月

① 参见《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712 页。

②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716 页。

15 日为第二阶段。中原野战军及华东野战军一部在宿县双堆集包围并歼灭自确山东援的黄维兵团约 12 万人，俘虏兵团司令官黄维。徐州 30 万国民党军突围时，被华东野战军在陈官庄地区歼灭约 4 万人。12 月 16 日至 1949 年 1 月 10 日为第三阶段。遵照中央军委指示，淮海前线解放军各部暂停对杜聿明集团的攻击。1949 年 1 月 6 日，华东野战军等发起对杜聿明部的总攻，于 10 日全歼邱清泉、李弥两个兵团约 20 万人，俘虏杜聿明，击毙邱清泉，仅李弥等少数人逃脱。此役歼国民党军 55.5 万人。这一胜利基本解放了长江以北地区，使蒋介石的精锐部队丧失殆尽，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上海直接暴露在人民解放军面前，为渡江作战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对于淮海战役，邓小平后来回忆说："迎接淮海战役的时候，总的形势很好。东北战场取得了胜利，这对全国鼓舞很大，西北也稳住脚，中原三足鼎立。淮海战役是二野、三野联合作战，用毛主席的话说，二野三野联合作战，不只是增加一倍两倍的力量，数量变，质量变，这是一个质的变化。淮海战役成立了总前委，由五个人组成，其中三个人是常委，我当书记。毛主席对我说：'我把指挥交给你。'这是毛主席亲自交代给我的。淮海战役的部署决策是我根据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指示主持决定的。"①

1949 年 3 月，邓小平出席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受命兼任华东局第一书记。这距他 1945 年 6 月当选为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已过去 4 年时间。会议讨论了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问题，决定人民解放军应争取解放长江以南的华中、华南各省，完成渡江后，有步骤地、稳健地向南方进军。与此同时，中央军委决定，淮海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41—342 页。



战役总前委改为渡江战役总前委，仍由邓小平任总前委书记。由总前委率第二野战军（由中原野战军1949年2月5日改称）、第三野战军（由华东野战军1949年2月5日改称）于4月中旬进行渡江战役。

3月31日，邓小平主持起草《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并以总前委名义报告中央军委。《纲要》提出：蒋军集结于上海至安庆段的兵力，计有24个军72个师，共约44万人左右。其中直接担任江防者，计18个军49个师。我第二、第三两野战军全部，以歼灭上述全部或大部蒋军，占领苏南、皖南及浙江全省，夺取京、沪、杭，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治经济中心为目的，决于4月15日18时，以全线渡江作战，开始进行本战役。《纲要》分析了人民解放军渡江后国民党军可能作出的几种抵抗部署，指出：只要我军渡江成功，无论敌人采取何种处置，战局的发展均将发生于我有利的变化，并有可能演成敌人全部混乱的局面。《纲要》提出战役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达成渡江任务，并依据下一阶段的要求，实行战役的展开；第二阶段，达成割裂和包围敌人的任务，并确实控制浙赣线一段，断敌退路；第三阶段，分别歼灭包围之敌，完成全战役。《纲要》具体明确了二野、三野各兵团的作战方向、任务及指挥联络等。[①] 4月3日，中央军委复电同意《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

4月20日，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统率第二、第三野战军发起京沪杭战役。在西起湖口、东至江阴的长江防线上全线出击，强渡长江，一举突破国民党军队的长江防线，浩浩荡荡渡过长江。4月23日人民解放军攻占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随后，相

---

①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0—133页。

继解放上海及苏、皖、浙、赣等省广大地区。南京的解放，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

关于渡江作战的经过，邓小平于 1949 年 8 月 4 日在向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代表所作的报告中，进行过详细讲述。他说："渡江作战是从四月二十日夜里发起的。因为反动的南京政府拒绝了人民的八项和平条件，人民解放军一部，即由刘伯承同志领导的第二野战军和由陈毅同志领导的第三野战军，奉命渡江作战。在漫长的一千多里的战线上，所有部队都无例外地顺利地完成了渡江任务。我们发动战斗以前，曾经给过反动的南京国民党政府最后考虑的时间。当他们不愿接受人民的极其宽大的和平条件的时候，我们只有给他们再一次的教训和打击。我们发起渡江作战后遇到的抵抗可以说很小。在一千多里的战线上，国民党军队摆在湖口至上海段的有四十五万人（包括宜昌至湖口段的共有七十万人）。四十五万人不能阻挡人民解放军渡江。我们在任何地方都没有遭遇到大的抵抗。我们采取宽正面的渡江方法，分了几十个点渡江，绝大部分都没有遭遇到强大的抵抗。假若有人问，你们渡江花了多少时间？我们肯定地回答，先头船只最快的一刻钟。我们从四月二十日夜里开始，二十四小时内大体上三十万人全部过了江。队伍一过江，敌人就混乱了，他们的想法只有一个，就是如何逃出我们的包围。他们一齐向南溃退，人民解放军立即实行宽正面的追击。在这过程中，南京在四月二十三日占领。到五月初，半个月的时间完成了追击。从渡江到追击最远的地方，即福建的北部、江西的东北部，前进一千五百里。在这么短的时间要走这么多里路，并且还遇到小的战斗和下雨，能有这种惊人成绩，是靠指战员奋不顾身的英勇精神，这种英勇精神过去表现在战场上，这次主要表现在脚上。敌人在这样的追击下，

没有可能整理队伍。甚至我们的第一梯队已过去五六百里，第二第三梯队还要消灭被第一梯队甩在后面的敌人。五月初完成追击，占领杭州、温州、蒋介石的故乡奉化、宁波，一直到闽北、赣东北这条线。此后，部队就准备进攻上海。上海有二十万敌人，并且由蒋介石亲自指挥。经过一个星期的战斗，我们在五月二十七日占领了上海。这次作战中央命名为'京沪杭战役'。从渡江到占领上海，总计用了一个月零七天，消灭敌人四十余万。我方伤亡二万五千人，其中在占领上海时伤亡一万七千人，在渡江时遭敌机轰炸等共伤亡八千人。我们曾有一个兵团俘虏了敌人六万，自己损失一千一百人，比较起来我们的代价花得很少。"①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作为新中国的开国元勋，邓小平参加了开国大典。新中国成立前夕，邓小平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10 月 19 日，任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此时，人民解放军的战线正以迅猛之势向中华大地的南部和西部推进。为打破蒋介石构筑的西南防线，邓小平和刘伯承又踏上了进军大西南的战斗征程。

根据进军大西南的需要，1949 年 7 月 16 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西南局，邓小平任第一书记，刘伯承任第二书记，贺龙任第三书记。他们根据中共中央提出的"大迂回、大包围"的战略方针，制定了解放大西南的作战计划，决定出敌不意，从川东和贵州插入国民党军西南防线的右侧，切断胡宗南集团及川境诸敌逃往滇缅边境的退路，在四川境内歼敌主力。

1949 年 11 月 1 日，邓小平和刘伯承、贺龙指挥二野第 3、

---

① 《邓小平文选》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35—136 页。

第4、第5兵团及一野、四野各一部，兵分三路，向西南地区进军。第3、第5兵团从南线迂回贵州，11月15日解放贵阳，11月下旬向川南迂回，切断了国民党军胡宗南集团的退路。11月26日，邓小平和刘伯承等致电中央军委，提出速歼长江南岸国民党军、相机占领重庆的作战部署。11月27日，毛泽东在复电中提出："我向重庆方面攻击之各军是否有必要稍为迟缓其行为，以利吸引较多之敌军据守重庆而后聚歼之。因为蒋介石自己在重庆，可能打一个聚歼汤恩伯于上海那样的好仗。"邓小平和刘伯承根据战场实际情况，认为如能在江南歼敌罗广文部，则重庆较易夺取。早点夺取重庆使工业不受大破坏，则我可早日依托重庆供给大军经营全川。重庆城地形险要，如敌多兵固守，攻取费时。在敌薄弱时，至少在一段早点争取渡过长江，跨江南北机动较为有利。[1] 基于以上考虑，他们当即给毛泽东回电，提出尽可能提前渡江夺取重庆。11月28日，毛泽东复电同意。邓小平和刘伯承随即下达攻占重庆的命令。11月30日，重庆解放。

1949年12月上旬，二野第3、5兵团从西、南、东三面切断胡宗南集团企图撤向云南的退路。一野第18兵团（划归二野指挥）由川北南进，迅速进至四川绵阳东西地区。二野第4兵团迅速向云南迂回。至此，胡宗南集团及川内国民党军数十万人，全部被包围在成都地区。12月27日成都解放，蒋介石在大陆上最后一支主力——胡宗南集团全部覆灭。

1949年11月21日，邓小平和刘伯承发布文告，向西南地区国民党军政人员提出四项忠告：（一）国民党军队应即停止抵抗，停止破坏，听候改编。（二）国民党政府机关政治、经济、文化、

---

① 参见《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862、863页。

教育工作等人员，应即保护原有机关学校财产、用具、档案，听候接收，无论其属高级、中级或下级职员，本军均一本宽大政策，分别录用或适当安置。（三）国民党特务人员，应即痛改前非，停止作恶。（四）乡保人员，应即在解放军指示下，维持地方秩序，为人民解放军办差事。[①] 在解放军强大的军事包围和政治感召下，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文辉、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等分别通电起义。云南、西康两省和平解放。

仅仅两个月，西南战役就取得决定性胜利，消灭了盘踞在云、贵、川、康四省的 90 多万国民党反动武装，解放了除西藏之外的西南全境，把国民党反动统治势力最后逐出中国大陆。

在解放战争的三年中，邓小平和刘伯承率刘邓大军从晋冀鲁豫战场突破黄河防线，出击中原，千里跃进大别山，经过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一直打到大西南。尽管南征北战，历尽艰辛，但邓小平却认为在他一生中“最高兴的是解放战争的三年”。他说：“那时我们的装备很差，却都在打胜仗，这些胜利是在以弱对强、以少对多的情况下取得的。”[②] 对于邓小平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建立的卓著功勋，毛泽东给予充分肯定。他在新中国成立后多次提到邓小平协助刘伯承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这是对邓小平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所作贡献的公正评价。

---

①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858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54 页。

第三章 主政西南

DI SAN ZHANG

主政西南期间，邓小平和刘伯承在指挥部队清剿土匪顽敌的同时，注意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分化争取国民党军营垒中一切可能争取的人，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谨慎稳妥地消除历史遗留的民族隔阂，促成各民族的团结；发动和依靠群众，顺利完成土地改革和其他社会改革，加强各级政权建设；迅速恢复工农业生产，兴修成渝铁路以及和平解放西藏等，开创了西南地区稳定、发展的新局面。在此过程中，邓小平治党治政治军能力得到充分发挥，并有了新的全面提高，为他走上中央领导岗位创造了条件。

在西南期间，邓小平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政治委员，主持西南局党政军全面工作，直到1952年7月奉调进京。其间，在邓小平和刘伯承、贺龙等的领导下，西南局各项工作全面有序地展开。

在军事斗争方面，西南局把剿匪作为1950年全面工作的中心任务。由于国民党在西南作了较其他各地更为周密的部署，西南解放两个月来，国民党匪特和封建阶级展开全面反抗革命的斗

争，其形势是到处土匪蜂起。所以剿匪成为西南全面的中心任务，不剿灭土匪，一切无从着手。西南局在剿匪斗争中主要采取以下措施：（一）组织一元化的剿匪斗争。（二）集中兵力进剿。（三）组织军事进剿，政治攻势，发动群众三者之间密切协同。（四）开展捕捉匪首运动与镇压匪首工作。（五）争取少数民族参加剿匪。经过一年的艰苦作战，剿匪斗争取得重大胜利。到1950年底为止歼匪已近85万人，重要匪首基本上都已落网，并在剿匪过程中建立10余万地方武装、80余万人民武装自卫队，社会秩序日臻稳固。1951年1月28日，毛泽东复电西南局，对其剿匪斗争予以充分肯定："路线正确，方法适当，剿灭匪众八十五万，缴枪四十余万支，成绩极大，甚为欣慰，望即通令所属，予以嘉奖。"①

对于西南局1950年包括剿匪在内的工作任务的完成情况，邓小平后来回忆说："到西南后，西南局规定的一九五〇年的任务概括为几个数字：九十万，九十万，六千万，六十万。什么叫九十万、九十万呀？头一个九十万，就是起义、投诚、俘虏的国民党官兵有九十万，怎么消化，怎么安置，怎么教育改造，这是个大难题，需要解决。还有一个九十万，就是土匪，要把他们消灭。这个完成得很顺利。打土匪本来是很困难的事情，我们声威雄壮啊，把他们打怕了，费劲也不大。六千万就是西南地区人口中百分之九十的基本群众，要把他们发动起来，搞土改闹翻身。还有一个是要提高我们部队六十万干部战士的质量，以担当起新的繁重的工作任务。这四项任务都完成得不错。"②

在政权建设方面，邓小平主持筹建了西南军政委员会，在西

---

①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962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3页。

南全区充分发挥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作用，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区域自治制度，对西南政权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西南解放后，考虑到该地区封建势力依然强大、匪特活动猖獗、基本群众尚未充分组织和发动等情况，邓小平等西南局领导人没有迅速成立军政委员会，而是先实行军事管制，完成城市接管、剿匪、安定社会秩序等任务，同时开始财经、文教、监察、民委等内部组织机构的筹建工作，为建立西南人民民主政权进行充分的准备。

在筹备西南军政委员会的过程中，邓小平“深深感到政府机构人选的困难”。他在1950年1月2日关于西南工作情况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西南军政委员会的名单，必须在成都、昆明情形了解后，才能向中央提出。可能是起义将领、开明士绅（如熊克武），加二三流工商学界民主人士，加我们组成。”[①] 同月13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西南局常委办公会议，初步确定西南军政委员会人员名单。[②] 经过半年多的筹备，1950年7月4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批准任命西南军政委员会组成人员。刘伯承任主席，贺龙、邓小平、王维舟、熊克武、刘文辉、龙云任副主席。会议还批准任命了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87人，任命了秘书长和各部委主要负责人。邓小平兼西南军政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27日，西南军政委员会在重庆市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正式成立。[③]

建政之初，西南局主要通过召开各级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来团结各界人民，动员群众完成剿匪反霸，肃清特务，减租减息，征

① 《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第46页。

②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889页。

③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926页。

税征粮，恢复与发展生产，恢复与发展文化教育直至完成土地改革等各项任务。为此，邓小平十分重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这种团结大多数人的组织形式，并对如何发挥这种形式的作用给予具体指导。

首先，邓小平强调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要有代表性。1950年3月5日，他在中共中央西南局《关于川北遂宁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存在关门主义问题给各地党委的指示》中强调："必须广泛地吸收各界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参加，并且要有意识地吸收一些开明士绅，甚至少数具有代表性的右派分子参加。只有具备了这样广泛代表性，而又能真正发挥民主的会议，才能称之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①] 他还说："我们可以有意识地安排两个哥老会的人，以开明士绅身份来参加代表会议。否则，有些事也不好办。"他批评某县代表会议一共196名代表，其中农民就占了133人。他说："这就叫农民代表大会了，实在不能叫各界人民代表会，这样做肯定不能团结大多数。除了农民外，其他代表只是成了花瓶为了好看而已，这肯定不能分化敌人。"[②]

其次，邓小平主张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要充分发扬民主。他说："有的同志听到人家批评我们便面红耳赤，甚至作为会议主席要制止人家讲话，这是不民主，不能团结大多数。我们要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能够使他们把所有的话都说出来，即使反动的只要说出来也好，因为这样才可以有斗争。你有发表反动言论的自由，我也有发表反对反动言论的自由。如果不注意民主的实质，光去讲究民主的形式，农民就永远当不了主人。总之，要

---

①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903页。

② 《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第118、116页。

让各界、各阶层代表把话说完。”[1]

再次，邓小平提出在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各种问题都可以讨论。他说：“不管遇到什么问题，都可以开代表会议。譬如学校可以开学生代表会议、教员代表会议，县里可以开各界代表会议，区乡可以开农民代表会议。有土匪就讨论剿匪问题，春天就讨论春耕问题，当然要有准备、有方针、有领导，这样才能收到实效。”[2]

最后，邓小平要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要经常召开。他说：“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不仅要认真地开，而且要经常地开。各县三个月一定要开一次，甚至两个月开一次，内容如征粮剿匪等都可以，这样才能团结更多的人士。”[3]

这些正确思想和主张对西南全区各级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成功召开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向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过渡作了充分准备。

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建政工作是西南局政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等西南局领导人按照党中央慎重稳进处理民族问题的总方针，从西南少数民族实际情况出发制定了切实可行的建政方针。通过精心充分的准备，先试点，后推广，由点及面，稳步推进全面建政工作，在西南民族地区迅速建立起各级人民民主政权。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建立民族民主区域自治政府，杂居区建立民族民主联合政府，使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西南建立起来，从而保障了西南少数民族人民政治权利的实现，为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奠定了坚实基础。

① 《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重庆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16—117 页。
② 《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重庆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17 页。
③ 《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重庆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16 页。



在经济恢复方面，进城之初，邓小平即思考执政后的经济建设问题。他在 1950 年 1 月 2 日关于西南工作情况向中央的报告中提出“西南——主要是四川、重庆工业规模很大，过去主要造军火，原料主要来自外国。这些工业今后干什么，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①] 同年 2 月 6 日，他在中共中央西南局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鲜明地提出“学会管理城市，是西南党的一个重要任务”。[②] 邓小平把“主要注意力放在财经”上[③]，抽调有丰富地方工作经验和部队后勤工作经验的干部组建了西南财经工作领导班子，并亲自担任主任，全面运筹西南财经工作。

1950 年 7 月 31 日，邓小平在西南财经委员会正式成立会议上，提出了西南财经工作的任务及方针，主要是：（一）争取财政收支平衡。要按中央规定进行调整，不准多征，也不准少征，开辟税源，减少逃漏。（二）继续稳定物价。制止物价波动的方针是：大力完成财政收入任务，特别要加强税收；紧缩通货，减少开支；增设国营贸易机构，立即着手经营目前投机商人进行投机的主要部门；向工商业者和全体人民说清税收和打击投机分子的道理，发动群众起来打击投机，保护正当工商业。（三）组织城乡内外交流。工业方面特别是百货工业，应该注意研究农村需要，生产适合于农村水平的货物，组织工业品下乡。（四）重点恢复工业生产、举办交通建设，继续调整公私工商业关系。工业生产的方针必须改变。今后要面向农村，为农村服务，面对最广大的消费者，才有发展前途。应鼓励私人资本到中小城市去，国家银行予以必要的帮助。（五）继续巩固人民币，推行人民币下

① 《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重庆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44 页。
② 《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重庆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93 页。
③ 《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重庆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46 页。

乡。（六）恢复和发展农村水利建设。重点在发展农田水利，增加水田面积。[1] 这就为西南财经工作的全面开展，从总体上制定了思路，明确了方向。

在此方针指导下，邓小平于 1950 年 12 月 25日在西南区第二次财经会议上，对 1951 年的工作任务提出了明确要求：（一）保障税收。（二）搞好贸易。贸易工作有两个原则：一是加大国营贸易力量，加大专业公司的分支机构。二是大量组织私商下乡，让他们获得适当的利润和发展，不要害怕这样会发展了私人资本主义。（三）努力发展适合于本区需要的各种生产，如菜籽、棉花、烤烟、盐等。（四）发展小型工业和手工业。地方工业的经营方针，首先是要研究能在本区内解决原料与销路，然后由近及远；其次是必须有利可图、吹糠见米。各地应鼓励私人投资小型资本工业，地主的资金也可以引导到这方面去。（五）解决交通问题。运输工作应当研究如何经济实用，减低成本，降低运价。（六）研究农村经济。[2]

从邓小平关于西南财经工作的方针和任务中可以看出，他较早地注意到要推动国营经济与私营经济的共同发展，并在实践中较好地处理了这个问题。1950 年 5 月 16 日，他在西南区新闻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党和政府调整工商业的政策是“调节劳资，两利兼顾”，同时“扶助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营工商业，鼓励私人生产的积极性”。[3] 他在重庆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再次指出：“人民政府在考虑国营经济事业的时候，必须兼顾到私营经济事业，但所鼓励和扶助的只能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事

① 参见《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933 页。

② 参见《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重庆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302—306 页。

③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48、149 页。



业。”中国将来要实行社会主义，但是“并不因为将来要实行社会主义，现在就不扶持正当的私营资本的发展，这是因为我们认为正当的私营经济不但为今天国计民生所必需，而且私营经济的发展，在客观上也是为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作了准备”。到了实行社会主义的时候，“私人资本是要收归国有，用什么方法收归国有，则要看那个时候的各种条件而决定。至于资本家个人，那时也不会打倒。因为他们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作了一定的贡献，其中有能力的人，更不愁没有事情做”。[①]

在国营经济逐步得到恢复后，为改善国营企业的管理，促进国营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邓小平又提出了厂矿企业进行民主改革的指导原则：（一）一切改革工作必须围绕在生产任务之下去进行。（二）一切改革工作必须依靠群众去进行。（三）群众起来之后，要注意防“左”。（四）发动群众与教育群众相结合，对群众进行爱国主义共产主义教育，保证运动的正确方向。[②]

在邓小平等西南局领导人的正确指挥下，西南经济迅速得到恢复。农业丰收，工业增产，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城镇人口购买力增加，物价稳定，城乡人民生活必需品基本保证供应，国营贸易机构遍布全区，工农业生产、公私营经济迎来发展的新阶段。西南呈现政通人和、百业俱兴的新局面。

在土地改革方面，邓小平等领导西南局，在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的基础上，从1951年2月到1952年5月分三期胜利完成了土地改革的伟大历史任务，在西南大地实现了一场极其深刻的社会变革。

西南的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1950年7月着手准备，11

① 《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第80、81页。

② 参见《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第472—473页。

月全面展开，到 1951 年 4 月中旬为止，已在 208 个县、7 个市郊，6660 余万人口，即占全区人口 83%的地区，宣告胜利结束。在运动中，全区农民协会会员发展到 2000 万余人，占人口 28%；人民武装发展到 224 万余人，占人口 3%。在运动后期，明确了发动贫雇农方针，从退押和惩治不法地主中适当满足贫雇农的经济要求，并随着运动的深入，在贫雇农积极动员起来的基础上，一步一步地改造了农会领导成分和农村政权。所有这些都为分配土地奠定了可靠基础。①

西南第一期土改是在 1951 年 2、3、4 月进行并完成的。这一期土改范围为 18 个县又 12 个区和 158 个乡及重庆、万县、南充 3 个市郊区，共 1351 万余人口的地区。各地土改都是结合复查反霸退押，惩治不法地主，发动贫雇农，进一步改造农会领导和镇压反革命等内容进行的。毛泽东对此十分赞赏，批注“所有这些都很好，都值得庆贺，一切尚未做到这一步的地方，都应这样做”。②

西南第二期土改于 1951 年 6 月开始，9 月份结束。两期土改后，西南完成分配土地的地区，包括 172 个县（其中 71 个整县）、8 个市，共计 4412 个乡、3700 余万人。由于不断积累经验，这期土改总的来说比第一期做得仔细一些。根据川北的估计，好的和较好的乡村约占 80%，坏的约占 20%。③

西南第三期土改于 1951 年 11 月开始，1952 年 5 月份结束，其中四川是 4 月份完成的，云南、贵州是 5 月份完成的。三期共完成 4500 多万农业人口地区的土地改革工作，还剩下 1600 多万

① 《邓小平文选》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89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90 页。

③ 《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重庆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434、453 页。



农业人口地区没有完成土地改革，其中600万是少数民族地区。至此，西南土地改革基本上完成了。[1]

西南土地改革彻底摧毁了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结束了几千年来的封建剥削制度，无地少地的农民获得了土地和其他生活资料，农民的政治觉悟和生产积极性空前提高，为促进生产大发展确立了稳固的基础。

在党的建设方面，邓小平领导西南局进行了党的思想作风建设和组织建设，并取得显著成效，为西南地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大规模经济建设奠定了思想基础，提供了组织保障。

在思想作风建设方面，针对当时西南党内存在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关门主义以及蜕化腐朽思想等不良倾向，邓小平领导了西南地区的整风运动。1950年6月6日，他在中共重庆市第二次代表会议上所做的关于整风问题的报告中，对西南地区整风运动的紧迫性、目的和意义都作了精辟论述，对西南地区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产生和发展的根源进行了分析，指出了克服这些不良倾向的方法和路径。他指出："目前我们党内主要的错误倾向是什么呢？中央指出，主要是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其中更主要的是命令主义。在西南来说，这个问题比之其他地区有过之而无不及。"又指出，在西南"还有两个错误倾向，一个是统一战线中的关门主义，一个是正在发展的蜕化、腐朽思想，也是要在整风中加以克服的"。[2]

针对西南党内存在的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他说："检查我们党和党员的工作，不能只以'努力'二字来衡量。努力，表示想把事情办好，这是共产党员必须具备的起码的品质，但是最主

① 参见《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第544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2、155页。

要的还是看努力的结果。有两种努力，一种是执行了政策，联系了群众，做好了工作，完成了任务；另一种是工作看起来忙得很，但是实行的是命令主义，违反了政策，脱离了群众，完成不了任务，损害了党的信誉。我们要区别这两种努力，提倡正确的努力，不赞成那种不正确的努力。党内犯官僚主义错误的同志，有些也是很努力的，所以有个新名词叫'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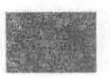
针对西南党内统一战线中存在的关门主义，他强调，"过去需要统一战线，今后同样需要，不仅需要，而且还要进一步巩固。""统一战线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如果在共产党员中不弄清楚这个问题，我们的工作将受到很大的损失。道理很简单，在西南，除军队外，约有十五万到二十万的地方工作干部，其中只有三万人是党员，还有少数团员，其他百分之八十左右是非党团员。党与非党干部的合作问题，就是百分之二十与百分之八十的合作问题。试问：不把百分之八十的人团结好，能够做好工作吗？小圈子主义的危险性，难道还不明显吗？"②

针对西南党内存在的蜕化腐朽思想，邓小平批评道："这个倾向正在发展，特别是经济方面的问题很多。无论城市农村，贪污腐化现象都很严重。还有一个干部婚姻上的问题，现在到处在闹'改组'。这种人往往引婚姻法作根据，说婚姻法上规定有婚姻自由，于是不管政治条件，不管儿女幸福，不管道德不道德。有的闹得影响很坏，工作也受损失。有的甚至使出流氓威胁欺骗的手段。这种现象如不纠正，不但影响工作，损害党的声誉，而

---

①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2—153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5、156页。



且要垮掉一些同志。”[①]

邓小平在西南整风中狠抓党员干部的思想作风建设，使西南党内存在的不良倾向得到了遏制和纠正，加深了广大党员对党的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的认识，树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加强了党内党外、干部群众之间的团结合作，加强了统一战线，克服了党内部分同志中产生的蜕化腐朽思想，有力地促进了西南地区经济建设等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在组织建设方面，邓小平主要抓了两项工作：第一，在产业工人中大量发展党员，增加党内的无产阶级比重。解放初期，西南地区厂矿企业中党的组织较弱，许多厂矿企业没有党支部，有的甚至没有一个党员。在工人党员数量远远不够的情况下，又出现了谨慎有余，发展不足的关门主义倾向。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批评道：“现在各地的普遍倾向，是忽略了城市的建党工作，把谨慎发展党的组织，变成了不注意发展党的组织。城市发展党员主要在工人中，而我们党内有不少人是看不起工人的（这与他们出身于农民、小资产阶级有关）。重庆前一时期请求入党的工人百余，经过两三个月的审查，只批准了六个，以后由市委组织部直接进行，才发展了一部分工人党员。”他提出：“在今后半年内，在重要厂矿的三十万工人中，吸收百分之七即约两万工人入党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②] 在邓小平的直接推动下，西南各厂矿加快了在工人中建党的步伐，党内无产阶级比重显著增加，党对厂矿企业的领导明显增强。

第二，在干部使用问题上坚持德才兼备原则。进入西南后，干部缺乏是当时面临的一个大问题。在培养和选拔干部中，邓小

---

①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8—159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9页。

平始终坚持德才兼备原则，反对把资格摆在第一位的错误做法。1950 年 9 月 26 日，他在中共中央西南局组织工作会议上指出："把资格作为提拔干部的原则就错了，马列主义和党中央的文件中只有德、才二字。如果讲资格，就会阻碍我们提拔干部。不冲破这一点就不能前进。"[①] 1951 年 1 月 3 日，他在西南军区组织工作会议上进一步指出，对于党员干部的标准，毛主席从来都是提德才兼备。现在我们要造成一种环境，破除靠"资"吃饭的旧意识。德、才两个字实际上包括了"资"。"德"就是政治品德，"才"就是从事革命事业的才能。这种品德和才能，都是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和培养出来的。如果从党的建设、从革命事业发展来看，任何新生的事业都是在前进中发展的。我们的事业也要我们的后代来继续完成。如果我们把资格摆在第一位，阻碍了年轻的和前进的事物发展，那我们的事业就不能继续下去，甚至要失败。[②] 在邓小平的大力倡导下，大批德才兼备的年轻干部被提拔起来，加速了西南地区干部培养的进程。

在宣传工作方面，邓小平要求各级党委都要重视这项工作，领导同志都要学会拿笔杆这项领导方法。他提出"宣传工作就是一切革命工作的粮草，革命工作没有宣传是不行的。一切工作都离不开宣传"。[③] 他还说："拿笔杆是实行领导的主要方法。领导同志要学会拿笔杆。""实现领导最广泛的方法是用笔杆子。用笔写出来传播就广，而且经过写，思想就提炼了，比较周密。所以用笔领导是领导的主要方法"，"凡不会写的要学会写，能写而不精的要慢慢地精。"[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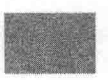
---

①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943 页。

② 参见《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重庆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310—311 页。

③ 《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重庆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319 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45 页。



邓小平十分重视发挥报纸和广播在宣传工作中的作用。他亲自领导创办了中共中央西南局机关报《新华日报》，并对如何办好该报提出明确要求。他指出："办好报纸有三个条件：结合实际、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三条离开了领导也搞不好，报纸就没有力量，容易变成'有闻必录'。所以办好报纸的前提在领导。"又说："报纸要结合实际，结合当时当地的中心任务。""报社要时时和领导取得联系，根据本地当前任务的变化，随时调整自己的报道方针。"[①] 对于广播，他提出"人民的广播事业，是传播政策、教育人民和同敌人斗争的最重要的武器之一"。[②]

邓小平不仅为《新华日报》确立办报方针，还要求各级党政军领导干部都应加强与党报的联系，为《新华日报》写稿，并身体力行。1950 年 10 月 1 日，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邓小平为《新华日报》写了《开国一年在西南》的文章。该文简述了一年来在军事、剿匪、接管城市、调整工商业、税收、减租减息、整风运动等方面取得的成绩，分析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最后指出："我们九个月来的若干工作成绩，只是获得一个前进的基础"，"如果我们发生错觉，如果我们对于封建势力仍然强大、匪特活动仍然猖獗、基本群众尚未充分组织和发动这些基本情况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如果我们因为有了一些小小的成绩就骄傲疏忽起来，这将是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③]

1951 年 7 月 1 日，为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 30 周年，邓小平又为《新华日报》撰写了《紧密地联系群众是我党的光荣传统》一文。文章指出，我党从开创之日起，就具有高度的纪律性、战

---

① 《邓小平文选》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46 页。

② 《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重庆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313 页。

③ 参见《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重庆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53—256 页。

斗性以及和中国人民血肉不可分离的联系。我们党的历史证明，只要我们不脱离群众，和群众始终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我们就会无往而不胜利。党在思想上和组织上更进一步的布尔什维克化，和党与群众永远保持着最密切的联系，是中国人民事业胜利的保证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革命生命的源泉。[①]

在邓小平的政治领导和具体指导下，西南局的宣传工作进行得有声有色，有力地促进和配合了西南地区各项工作的开展。

在民族工作方面，邓小平从西南地区少数民族成分多、民族关系复杂的实际情况出发，创造性地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提出一系列做好西南少数民族工作的正确思想和主张，并通过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使西南地区民族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首先，邓小平认为少数民族问题在西南工作中占有重要地位。他指出："西南的国境线从西藏到云南、广西，有几千公里，在这么长的边境上，居住的绝大多数是少数民族。少数民族问题解决得不好，国防问题就不可能解决好。因此从西南的情况来说，单就国防问题考虑，也应该把少数民族工作摆在很高的位置。"[②] 他还指出，西南是全国民族问题最大的地区，西南国防与各个民族间团结是不能分开的，有了民族团结，就有了国防；没有民族团结，就没有国防。[③]

其次，邓小平提出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是搞好团结，消除隔阂。他说："要把西南建设好，就要依靠各民族的共同努力，首要的问题就是要团结。有了团结就能解决一切问题，没有团结什么问题都不能解决。"[④] 他还说："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多

---

① 参见《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重庆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412—417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61 页。

③ 《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重庆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74、275 页。

④ 《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重庆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76 页。

民族的国家，只有在消除民族隔阂的基础上，经过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才能真正形成中华民族美好的大家庭。”但在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与汉族的隔阂是很深的，要达到消除这种隔阂的目的，须做长期的工作。少数民族也要经过一个长时间，通过事实，才能解除历史上大汉族主义造成的他们同汉族的隔阂。邓小平认为，“我们是有条件消除民族隔阂的。历史上的反动统治实行的是大民族主义的政策，只能加深民族隔阂，而今天我们政协共同纲领所规定的民族政策，一定能够消除这种隔阂，实现各民族的大团结。”“只要我们真正按照共同纲领去做，只要我们从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诚心诚意地帮助他们，就会把事情办好。”“要使他们相信，在政治上，中国境内各民族是真正平等的；在经济上，他们的生活会得到改善；在文化上，也会得到提高。所谓文化，主要是指他们本民族的文化。如果我们不在这三方面取得成效，这种历史的隔阂、历史的裂痕就不可能消除。”“只要一抛弃大民族主义，就可以换得少数民族抛弃狭隘的民族主义。”“两个主义一取消，团结就出现了。”①

再次，邓小平强调做好西南少数民族工作一定要坚持谨慎稳重的方针，来不得急躁轻率。他指出，西南的民族问题复杂，西南民族问题必须解决好。这牵涉到各方面的工作，但我们对情况又了解得很少，因此强调要采取非常稳当的态度，从一开始就把民族关系搞好。对少数民族的许多事宜，不盲动，不要轻率地跑去进行改革，不要轻率地提出主张，宣传民族政策也不要轻率。②他还指出，在西南的民族问题上，不能患急性病，来一点“慢性病”没有关系。“慢性病”不会犯错误，急性病就要犯错误，别

①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2、163页。

②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3—164页。

的事情既不能患急性病又不能患慢性病，这件事情不要怕患“慢性病”。当然我们还是要做工作，不能因为怕患急性病就睡起觉来，要稳步地做，摸准情况前进。团结的基础巩固一步，工作也就前进一步。当前在少数民族地区做工作，一个重要原则就是不准出乱子，不能把事情搞坏。一百个干部有九十九个做得好，有一个干部出乱子，也可以把事情搞坏。①

最后，邓小平主张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开展一切工作，都要掌握一个原则，就是要同少数民族商量。他们赞成就做，赞成一部分就做一部分，赞成大部分就做大部分，全部赞成就全部做。一定要他们赞成，要大多数人赞成，特别是上层分子赞成，上层分子不赞成就不做，上层分子赞成才算数。在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的特点，上层分子作用特别大。为此，邓小平强调一切事情都要经过他们上层，要对上层分子多做工作，多商量问题，搞好团结，一步一步引导和帮助他们前进。他说：“如果上层这一关过不好，一切都要落空。我们有些同志往往采取激进的办法，以为不通过上层分子能搞得更好。事实上不是搞得更好，而是搞得更坏，不是搞得更快，而是搞得更慢，因为阻力大。对上层分子的工作做好了，推动他们进步了，同我们的合作搞好了，这样，在他们的帮助下来推进工作，就要顺当得多。”②

基于上述方针，邓小平在领导西南地区减租退押、土地改革运动中特别提出：“所有少数民族内部的改革，都要由少数民族内部的力量来进行。改革是需要的，不搞改革，少数民族的贫困就不能消灭，不消灭贫困，就不能消灭落后，但是这个改革必须

①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4、165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8、169页。

等到少数民族内部的条件具备了以后才能进行。”[①] 他针对少数民族地区顾虑较多的社会改革问题明确指出：“少数民族地区的所有改革包括经济的政治的改革事宜，一定要在少数民族人民自己要求的基础上与各少数民族人民商量解决，急了就要脱离群众。”[②] 这些思想和主张对做好西南民族工作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邓小平在领导西南民族工作中，还十分重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1950 年 7 月 21 日，他在同赴西南地区的中央民族访问团会谈时特别提出：“西南人才缺乏，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迅速创办民族学院，吸收一些青年进民族学院深造。”[③] 第二天，即 7 月 22 日，他在中共中央西南局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再次提出，“少数民族学校应迅速筹办”。[④] 11 月 28 日，他在欢迎赴京参加国庆活动后归来的西南民族代表团会议上提出“在西南办三所民族学院来培养干部”。[⑤] 12 月 29 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西南局常委办公会议，研究决定三个民族学院分别定名为西南民族学院、云南民族学院、贵州民族学院。1951 年 6 月 1 日，西南民族学院成立暨第一期开学典礼举行。邓小平为典礼题词：“各兄弟民族团结在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的周围，建设一个独立强盛繁荣幸福的新中国。”[⑥] 1952 年 7 月 10 日，邓小平出席西南民族学院第二期开学典礼并讲话。他指出：民族工作是全国范围的根本工作之一，有了民族团结，才可以谈到国家强盛、国防巩固、经济繁荣、人民生活改善。为了达到各民族团结，必须有

---

① 《邓小平文选》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64 页。
② 《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重庆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81 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68 页。
④ 《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重庆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09 页。
⑤ 《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重庆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80 页。
⑥ 《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重庆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378 页。

正确的民族政策和各民族间互相尊重，互相帮助，互相学习的风气；并且要有一批热爱祖国、联系群众、懂得政策的各民族干部。希望同学们努力学习，充分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器。回到本民族地区后，更好地发挥作用。[①] 民族学院创办后培养了大批少数民族干部，为西南建设的顺利进行提供了重要的组织保证。

在"三反""五反"方面，自1951年底至1952年初中共中央部署开展这两项运动以来，邓小平领导西南局积极响应中央号召，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广泛深入地开展运动。经过半年时间，"三反""五反"运动先后完成，并推动了工矿企业、工商业界及学校民主改革等其他重要工作的进行。

西南局参加"三反"的党、政、企业系统的工作人员约45万人，其中参加"三反"运动的党政机关一共有四五万人，县以上及少数区级干部都参加了这个运动。[②] 运动一开始，西南局即制定了处理贪污问题的具体方针政策。1952年1月3日，邓小平批准发出中共中央西南局《关于处理贪污问题方针政策的指示》，提出在号召坦白的同时，宣布并宣传如下几点方针和政策：(一)坦白者从轻处分，拒绝坦白被人检举出来者从重。(二)对中小贪污及一般浪费行为者教育改造，部分按其情节轻重给以适当纪律处分。(三)检查贪污时间除个别特殊者外，一般的要从解放后起计算，过去已作结论的不再追究。(四)贪污与公私不分的行为在处理时应加区别。(五)奖励和支持艰苦朴素的同志。[③] 1

①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064—1065页。

② 据邓小平1952年6月20日在西南党政军机关党员干部大会上所作的《三反五反运动的总结》及同年8月8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18次会议上关于西南地区工作情况的报告，参见《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第530、543页。下文中关于西南局"三反""五反"运动开展情况的资料，未另注明出处者，均引自这两个报告。

③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027页。

月12日，中共中央西南局又发出《关于大贪污犯逮捕权和判决权问题的指示》，指出：对一般大贪污犯的逮捕批准权交地委及各直属市委（对外以专员、市长名义执行），但对影响较大的人士需要逮捕的，应经省区党委批准（对外以主席、行署名义），重要者应报西南局和中共中央批准。对贪污犯判决徒刑和死刑，要经过司法机关，并按照惩治贪污分子条例的程序和规定处理。[①]这些方针政策对于保证西南局“三反”运动正常有序地进行发挥了重要作用。

西南局在“三反”运动中清查出一批贪污分子，打击一批“老虎”，同时打击一批经济坐探、“双皮老虎”（即反革命分子），暴露出严重的浪费现象，揭露出许多不可容忍的官僚主义现象，从领导到群众都受到深刻教育。经过“三反”，纠正了许多官僚主义，这些官僚主义分子在运动中受到教训，改善了领导与群众的关系。同时，经过“三反”，浪费大大减少，挽救了一批小贪污分子，包括一部分大、中贪污分子，清算了资产阶级思想，进而交代了与资产阶级的关系及社会关系，党和政府对干部的面貌看得更清楚了。在运动中还提拔了大批积极分子，工作效率提高了，到处出现新的气象。

西南局进行“五反”的城市和重要集镇约300个，一切大中小城市无例外地开展了这个运动。在西南局看来，这个运动的本质是对资产阶级两三年来对我党疯狂进攻的一个猛烈反击，是迫使资产阶级服服帖帖地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去经营工商业，遵守《共同纲领》，不敢再胡作非为。此外，这个运动本身还对各民主党派起到思想改造的作用。资产阶级的进攻不仅在大中城市，而

①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030页。

且在小城市也是疯狂的，我们各级干部对此都是警惕不够的。不把资产阶级的丑恶方面，如投机倒把、行贿引诱国家工作人员、偷税漏税、偷工减料、窃取国家经济情报等事实暴露出来，就不可能使我们一些共产党员的头脑清醒起来。同时没有工商界的“五反”，就很难把内部的大贪污犯搞出来。所以，在任何地方都不应该丧失这个机会，而应聚精会神地进行这个斗争。

西南局“五反”运动的主要收获是使党和国家工作人员、干部、党员认识了资产阶级，清算了资产阶级思想。经过“五反”，消除了资本家的“五毒”行为，查出一批“派进来”“拉出去”的经济坐探，发动和教育了工人阶级，整理了工会组织。“五反”运动打退了资产阶级进攻，巩固了工人阶级领导，同时也巩固了对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无论“三反”和“五反”，更大的收获是划清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界限。

在建设大西南中，邓小平屡建殊功，功勋卓著，显示了卓越的政治才能。主持修建新中国第一条铁路——成渝铁路，就是其中光辉的一页。1949 年 12 月 31 日，当时西南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邓小平在主持西南局常委办公会议上即决定“兴建成渝铁路，造船修建码头”。1950 年 1 月 2 日，邓小平在向中共中央报告重庆解放一个月后西南的情况和建设新西南的计划时，特别提出“着重于修成渝铁路”。[①] 这一决策，反映了西南 7000 万人民的愿望，很快得到中央人民政府的批准。1950 年 6 月 15 日，在西南军区大操场举行成渝铁路开工典礼，邓小平莅临致词。他指出：“我们今天建设成渝铁路，是在经济与设备困难的条件下开始的。人民对建设的希望是花钱少，事情办得好。我们调出一部

① 参见《成渝铁路 新中国第一条铁路》，《人民日报》2009 年 8 月 12 日。

分部队参加建筑，也是为着替人民少花一些钱，把铁路建设起来。许多困难问题，必须要以为人民服务的精神，逐步地求得解决和克服，并防止官僚主义的倾向发生。要求修路部队要遵守劳动纪律，要学会掌握修路技术，尊重技术人员的指导，要紧密团结起来进行工作。”[①] 邓小平的致词对建设成渝铁路提出了明确要求，为工程的顺利进展提供了重要的指导思想。

在邓小平和西南局的领导下，成渝铁路的建设进程十分顺利，经过两年的紧张施工通车在即。1952 年 6 月 7 日，邓小平在主持召开西南军政委员会第 73 次行政会议，听取西南军政委员会铁路工程局关于成渝铁路全线通车情况报告时，决定成立庆祝成渝铁路全线通车筹备委员会。他在会上说：成渝铁路通车是一件大事，不但是西南，在全国来说也是一件大事。西南的铁路是全国建设中的一个重点，恐怕今后要争取每年有一条铁路开工。往后的任务是很多的，西南是交通第一，有了铁路就好办事。[②] 同年 7 月 1 日，成渝铁路正式通车，西南人民盼了近半个世纪的铁路梦想终于成为现实。当天，邓小平出席重庆市人民庆祝成渝铁路全线通车大会，并题词“庆祝成渝铁路全线通车”。[③] 7 月 30 日，成渝铁路正式交付运营。作为西南地区第一条铁路干线，成渝铁路在中国铁路发展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是中国自行设计施工，完全采用国产材料修建的第一条铁路，是中国铁路史上的一个创举。它横穿四川盆地，有力地促进了西南地区物资流通，对发展生产和繁荣地方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

邓小平主政西南期间，参加领导了进军西藏和西藏和平解放

①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921 页。

②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060 页。

③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063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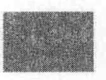
工作，实现了祖国大陆的完全解放。1949年底，当云、贵、川、康相继解放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开始考虑解放西藏问题。1950年1月2日，毛泽东在莫斯科致电中共中央、彭德怀并转邓小平、刘伯承、贺龙，确定由西南局担负进军和经营西藏的任务。根据毛泽东莫斯科来电，邓小平和刘伯承1月8日复电中共中央并转毛泽东和贺龙，提出西南局"拟定以二野之十八军担任入藏任务，以张国华为统一领导的核心，已指令该军集结整训，并召张及各师干部速来重庆受领任务，解决进军西藏中的运输诸问题"。[①] 1月10日，毛泽东复电中共中央并请转刘伯承、邓小平、贺龙及西北局，表示完全同意刘邓关于进军西藏的计划。

1950年2月，中共中央提出争取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根据这一方针，邓小平于同年5月11日致电中央军委，建议除继续加强进军西藏的军事准备外，拟特别加强政治争取工作，并拟定四条作为同西藏地方当局谈判的基础：（一）驱逐英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的大家庭来。（二）实行西藏民族区域自治。（三）西藏现行各种制度暂维持原状，有关西藏改革问题，将来根据西藏人民的意志协商解决。（四）实行宗教自由，保护喇嘛寺庙，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②]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此给予充分肯定，并委托西南局起草一个同西藏地方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的条款。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邓小平主持起草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十大政策，并于1950年5月27日上报中央。5月29日，中央复电同意向西藏当局提出下列十项条件作为和平进军的谈判基础：（一）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英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

---

① 《邓小平军事文集》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76页。
②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912页。



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的大家庭来。（二）实行西藏民族区域自治。（三）西藏现行各种政治制度，维持原状，概不变更。达赖活佛之地位及职权，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四）实行宗教自由，保护喇嘛寺庙，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五）维持西藏现行军事制度，不予变更。西藏现有军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武装之一部分。（六）发展西藏民族的语言、文字和学校教育。（七）发展西藏的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八）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完全根据西藏人民的意志，由西藏人民及西藏领导人员采取协商方式解决。（九）对于过去亲英美和亲国民党的官员，只要他们脱离与英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关系，不进行破坏和反抗，一律继续任职，不究既往。（十）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人民解放军遵守上列各项政策。人民解放军的经费，完全由中央人民政府供给。人民解放军买卖公平。[①] 这十项条件成为后来制定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基本框架和基础。

1950 年 7 月 21 日，邓小平在欢迎赴西南地区中央民族访问团大会上的讲话中曾指出："对于我们提出的十条，有的西藏的代表人士觉得太宽了点。就是要宽一点，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不是骗他们的。所以这个政策的影响很大，其力量不可低估。"[②] 然而在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势力的怂恿下，以达扎为首的西藏噶厦当局非但不接受和平谈判条件，还调集大批藏军封锁昌都，把进藏部队挡在金沙江以东。根据中央决定，1950 年 8 月 26 日，邓小平和贺龙下达发动昌都战役基本命令："十八军主力应于九

①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247—248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63 页。

月上旬在甘孜、玉隆、邓柯之线集结完毕，九月中旬由该线发起进攻，争取于十月十日前后占领昌都。另以该军五十三师一个团，同时由巴安出动，歼灭宁静之藏军，而后向昌都攻击前进，配合五十二师钳击昌都。以十四军一部，同时歼灭盐井和竹瓦根之敌。西北军区之玉树部队归五十二师指挥，加强昌都作战。”[①] 1950 年 10 月 6 日，进藏部队分多路渡过金沙江、怒江、澜沧江，打响昌都战役。经过近 20 天的战斗，消灭藏军主力，解放昌都，打开了和平解放西藏的第一道大门。

昌都战役的胜利，加快了西藏和平解放的进程。1951 年 4 月，由阿沛·阿旺晋美率领的西藏地方政府和谈代表团前往北京。当他们到达重庆后，邓小平于 4 月 19 日宴请阿沛·阿旺晋美率领的代表团全体成员，并向他们讲解和平解放西藏的十项政策，指出西藏人民接受和平解放西藏是正确的历史性选择。1951 年 5 月 23 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经过多次谈判，就一切重要问题做了详细讨论后，在北京签订《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宣告西藏和平解放。6 月 8 日，邓小平在西南各界庆祝《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字大会上的讲话中，阐述了协议签订的重大意义。他说：“这一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是全国民族大团结的胜利。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给予西藏人民的历史以及西藏人民与祖国关系的历史，带来了划时代的变化。西藏人民即将永远脱离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奴役，永远回到祖国大家庭中来，和国内其他兄弟民族一样充分享受民族平等和区域自治的权利。西藏人民即将从黑暗境遇转到光明，人口将逐渐增多，经济将逐步发展，人民

①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937 页。



生活与文化将逐步得到改善与提高。”[①]

1951 年 10 月 26 日，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在司令员张国华、政治委员谭冠三率领下进抵拉萨。中国大西南全境解放。

主政西南期间，邓小平治党治政治军能力得到充分发挥，并有了新的全面提高，为他走上中央领导岗位创造了条件。

①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988 页。

第四章 奉调进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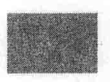
DI SI ZHANG

1952 年下半年，中共中央决定将各中央局书记和大区主要负责人调到北京，并调整和增设中央及国家机关的部分机构。这年 7 月下旬，邓小平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离开工作了近三年的大西南，到北京担任政务院副总理。到中央工作后，邓小平受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器重。毛泽东批示："凡政府方面要经中央批准的事件，请小平多管一些。"

邓小平在主政西南期间善于把握大局、善于在复杂情况下抓住主要矛盾做好各方面工作并开创工作新局面的卓越领导才能深得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赞赏。1952 年 7 月下旬，他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离开工作了近三年的大西南，到北京担任政务院副总理，开始了他革命生涯中又一个重要时期。

作为政务院副总理，邓小平负责分管监察、民族、人事等方面的工作，后又兼任政务院交通办公室主任，分管铁路、交通、邮电等方面的工作，成为周恩来总理的得力助手。他上任后不久，即在周恩来赴苏联访问期间代理总理职务。

在"一五"计划基本设想有了初步眉目后，为同斯大林和苏



共中央交换意见并商谈有关问题，1952年8月15日，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前往苏联访问。临行前的8月13日，周恩来同刚在6天前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政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谈政务院工作，并在政务院第148次政务会议上宣布：在他奉毛泽东主席之命赴苏联访问期间，由邓小平代理总理职务。①

在代理总理职务期间，邓小平三次主持召开政务院政务会议。9月5日，主持召开政务院第149次政务会议，批准教育部部长马叙伦作的《教育部1952年工作计划要点的报告》，通过《关于设置文史研究馆的决定》。9月12日，主持召开政务院第150次政务会议，讨论批准《中国科学院1952年工作计划要点》《北京科学研究人员的思想改造情况的报告》。在作会议结论时，邓小平表示同意科学院三点工作计划，即：加强领导即进行改造，加强组织建设，培养人才，并指出保证科学研究工作广泛开展的三个条件：一是我国各方面建设包括文化建设的发展。工业、文化、教育事业发展了，必然推动科学研究的发展，人民文化水平高了，也要求学习科学。二是科学院本身进行了思想改造运动。思想方法的正确必然推及到工作方法的正确。三是党和政府包括毛主席，都很重视这项叫基本建设的工作。在这方面投资就叫做基本建设投资。他还指出：人民要求科学发展，各部门也给科学院出题目。过去科学在封建社会里受各种反动势力和资产阶级思想的束缚，不能得到发展。现在是新社会，可以大发展了。当然，科学研究方面很快就取得成就也是不容易的。假如指导思想不对，研究方法不对，是不行的。如果这方面对了，就不能性急，要一步一步地来。我们中国人的智慧并不低，将来一定

①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255页。

会取得很大成就的。[1] 9月19日，主持召开政务院第151次政务会议，听取并批准卫生部部长李德全关于该部1952年工作计划要点的报告。

9月22日，周恩来在圆满完成有关中苏两国重要政治问题与经济问题的商谈后，和陈云、粟裕等代表团成员一行17人离开莫斯科回国。24日返抵北京，并于当天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汇报就中国"一五"计划轮廓问题同苏联商谈情况。至此，邓小平代理总理职务结束。在此期间，他通过主持召开政务会议等形式，有效履行了代理总理的职能，圆满完成周恩来总理交付的各项政务工作。

邓小平到中央工作后，受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器重。1953年3月3日，毛泽东批示："凡政府方面要经中央批准的事件，请小平多管一些。"[2] 9月1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8次会议正式任命邓小平为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第一副主任、财政部部长。[3] 他与中财委主任陈云密切配合，通盘协调和指导全国各省、区财政、税收、金融、贸易、工商管理等方面的工作，并参与有关政策的制定和对外贸易、农副产品经营等一些具体问题的处理。

在兼任财政部部长的9个月间[4]，邓小平提出要把国家财政放在经常的、稳固的、可靠的基础上，财政工作要有全面观念等正确的指导原则，为全面有效地开展财政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础。1954年1月13日，他在全国财政厅局长会议上的报告中提出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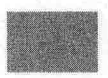
---

①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069—1070页。

②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099页。

③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128、1134页。

④ 1954年6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32次会议决定免去邓小平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及财政部部长职务。参见《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179页。



后财政工作的6条方针：一是归口。预算要归口，不能有不归口的预算项目。预算不能由各部门自行决定，但必须以各部门为主，共同商量。二是包干。包干的目的主要是控制预算。包干分两种：一是中央各口的包干，主要是归大口。二是地方的包干，主要是大区包干。包干之后，由地方去调剂。收入也要包干。总收入不应减少，并争取超过；总支出不应突破，并力求节约。三是自留预备费，结余留用不上缴。四是精减行政人员，严格控制人员编制。五是动用总预备费须经中央批准，批准权应在中央政治局。六是加强财政监察。6条方针有一个重大的政治目的，就是要把国家财政放在经常的、稳固的、可靠的基础上。有了后备力量，国家财政才能集中力量保证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需要。[①]

1月25日，他在全国财政厅局长会议总结讲话中又强调要处理好中央与地方、全体和局部的关系。他指出，过去遇到一些问题，常常没有从大的方面出发，没有把战略问题交代清楚，这是过去财政部工作出了一些问题的原因。全体和局部缺一不可。在中央工作的同志要经常照顾局部和地方，要因地制宜，注意到地方工作有什么困难。凡是地方提出的困难问题，只要是可能解决的，应热心帮助解决；如是不能解决的，也要讲清道理。在地方来讲，则应照顾全体、中央和集中统一，以中央为主体。如果两者之间发生矛盾，地方应服从中央，局部应服从全体，因地制宜应服从集中统一。不如此，就会发生地方主义、本位主义和山头主义。财政部门是集中体现国家政策的一个综合部门。财政工作的全局观点就是必须服从总路线，即必须保证党在过渡时期总路

①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3—197页。

线、总任务的实现。[①]

邓小平在主持制定1954年国家预算草案时，同样坚持国家预算要建立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并有相当的后备力量。1954年6月16日，他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31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1954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中指出，1954年国家预算的任务，就是要从增加生产、扩大物资交流、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厉行节约和正确执行税收计划和税收政策等一系列的措施中增加收入、积累资金，以保证“一五”计划第二年度的国家建设需要。为此，必须将国家预算建立在可靠的、稳妥的基础上，坚持收支平衡的原则，并且力求在执行的结果上，达到收多于支和有相当的后备力量。[②]

邓小平在担任政务院副总理期间，参与领导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1953年5月到1954年6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首次基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他在这项工作的各个环节都起了重要作用，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民主政治建设作出了历史贡献。

首先，作为选举法起草委员会重要成员，邓小平参与制定《选举法》，为基层选举提供法律依据和基本原则。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少数地区仍未解放，加之群众发动还不够充分，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条件还不够成熟，故根据《共同纲领》的规定，当时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代行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职权。随着国内政治局势的稳定和国民经济的恢复，以及人民组织程度与觉悟程度的提高，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议题，开始列入中共中央的议事日程。

1953年1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0次会议正式作

①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8—200页。

②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179页。

出《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会议还决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选举法起草委员会，周恩来为主席，邓小平等 23 人为委员。[①]

选举法起草委员会一成立，即投入紧张的工作。在研究我国民主政治的实际情况，借鉴苏联选举经验的基础上，选举法起草委员会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很快拿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草案）》。1 月 28 日，受中央选举法起草委员会主席周恩来委托，邓小平在全国政协会议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草案）》（以下简称《选举法（草案）》）的说明报告。报告指出：中国的情况极端复杂，要照顾到每一个情况是很困难的。因此，确定的这个选举法不可能过于具体，只能写得概括一点。报告对《选举法（草案）》的主要内容作了说明。[②] 2 月 3 日，邓小平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选举法（草案）》。[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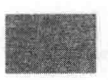
2 月 11 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 22 次会议，审议选举法起草委员会拟定的《选举法（草案）》。邓小平在会上作关于《选举法（草案）》的说明报告，着重阐述选举法草案体现的几个基本原则。

一是《选举法（草案）》体现的选举权的普遍性和平等性。邓小平指出：选举权的普遍性，表现在《选举法（草案）》中以下的规定，即：凡年满 18 周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不分民族和种族、性别、职业、社会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

① 参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4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6—17 页。
②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094 页。
③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095 页。

状况和居住期限，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只是那些依法尚未改变成分的地主阶级分子、依法被剥夺政治权利的反革命分子、其他依法被剥夺政治权利者和精神病患者，无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这几种情形所占人口总数的比例是很小的。因此，我国的选民占全国人口很高的比例。我们的选举是名副其实的普选。在这样普选的基础上产生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具有最广泛的人民代表性的。选举权的平等性，表现在《选举法（草案）》中以下的规定，即：所有男女选民都在平等的基础上参加选举，每一选民只有一个投票权。《选举法（草案）》还规定，全国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及产生，均以一定人口比例为基础，同时适当照顾一定的地区和单位。在此思想指导下，《选举法（草案）》对城市和乡村、汉族和少数民族间的代表人数，作了不同比例的规定。对此，邓小平在报告中解释说，虽然这些在选举上不同比例的规定，在某种方面来说是不完全平等的，但是只有这样规定才能真实地反映我国的现实生活，才能使全国各民族、各阶层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中有与其地位相当的代表，所以它不但是很合理的，而且是我们过渡到更为平等和完全平等的选举所完全必需的。

二是明确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及产生办法的原则。邓小平指出：对于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依据两个原则来拟定，即：（一）它必须使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具有工作能力的国家政权机关，既便于召集会议，又便于讨论问题和解决问题；（二）它必须使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与人民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在人民代表大会中，既须有相当于社会各民主阶级地位和有相当于各民族或种族地位的代表，又须注意到代表的地区性，以便于随时反映各民族各阶级各地区的情况，并能随时将代表大会的决



议迅速传达到各民族各阶级各地区的人民中去，把每个决议都变成为全体人民的实际行动。[①]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在听取邓小平的说明后，对《选举法（草案）》进行了认真的讨论，一致通过了《选举法（草案）》，并于3月1日公布施行。《选举法》的制定和颁行为在全国范围内顺利开展首次基层选举提供了法律依据。随后，大规模的全民基层选举在中国大地上展开。

其次，作为中央选举委员会秘书长，[②] 邓小平具体指导基层选举，对各地选举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及时提出有针对性的指导意见，把握正确的政策方向，推动这项基础性工作顺利进行。

1953年《选举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代表，省、县和设区的市人民代表大会之代表、由其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之。乡、镇、市辖区和不设区的市人民代表大会之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之。"[③] 因此，要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首先必须进行基层选举，然后逐级召开由人民用普选方法产生的乡、县、省（市）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并在此基础上选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可见，基层选举至关重要。为保证这项基础性工作的顺利进行，作为中央选举委员会秘书长的邓小平为此倾注了大量精力。

为搞好基层选举工作，继中央选举委员会成立之后，全国各地也开始成立乡、县、省（市）各级选举委员会及其办事机构，

①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草案的说明》，《人民日报》1953年3月3日。

② 1953年2月11日召开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2次会议决定成立中央选举委员会，负责指导全国的选举工作，刘少奇为主席，邓小平为委员之一，并在3月8日中央选举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被任命为中央选举委员会秘书长。参见《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096、1100页。

③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4页。

在同级人民政府的领导和上级选举委员会的指导下，负责办理选举事宜。在此过程中，邓小平予以具体指导。1953年2月28日，邓小平就县以上选举委员会主席、委员如何产生问题，为中共中央起草给各中央局、分局并转各省市区党委的电报。电报指出：选举委员会主席，可由各该级党委一个未任政府主席或市长、县长职务的负责同志担任，任政府副主席、副市长、副县长均可以担任。选举委员会的委员，可在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人民武装部队中选择，并由共产党出面约集各党派、团体负责人商定名单，而后由上一级人民政府任命。凡属担任选举委员会委员的人，一般地应是可能当选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人。邓小平在电报中特别强调：基层选举委员会不应马上普遍成立，而是采取哪里开始进行选举才在哪里成立的办法。凡有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其选举委员会中应有少数民族的代表人物参加。[①] 3月22日，邓小平又就选举委员会主席设置问题，为中共中央起草批复西北局的电报。电报指出："选举法的规定不可变更。青海等少数民族区域的选举委员会仍只设主席一人，勿须加设副主席，但如有必要，可由一少数民族代表人物担任主席，而由一个较强的党员担任选举委员会的秘书长。"[②] 这些意见和批复，对于如何成立基层选举委员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选举法》规定："乡、镇、市辖区和不设区的市选举委员会，应在选举前办理选民登记并发给选民证。"[③] 因此，对选民资格进行必要的审查，并对通过资格审查的公民进行选民登记，是开展基层选举工作的前提。鉴于选民登记工作的重要性和复杂

---

①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098—1099页。

②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107页。

③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3页。

性，邓小平主持制定有关文件，并对有关选举权问题作出批示，对这项工作予以有力的政策指导。

邓小平主持制定的选举工作文件，主要是中央选举委员会《关于基层选举工作的指示》《关于选民资格若干问题的解答》以及政务院《关于人口调查工作的指示》。1953年3月25日，邓小平在审改《关于选民资格若干问题的解答（草稿）》时，在"被管制的反革命罪犯在撤销管制后"一句后加写："得视其所犯罪恶的大小、改造程度的好坏，并根据人民群众的意见，而由选举委员会或人民法庭确定其有无选举权利。"在第12条末尾加写："凡是本来不应管制而被错误地管制了的分子，应即撤销管制，恢复其选举权利。"[①] 经过反复讨论和修改，4月3日召开的中央选举委员会、政务院联席会议一次通过了这3个文件。邓小平出席会议并对这3个文件作了说明。[②] 上述文件的制定和发布，为基层选举中的选民登记工作提供了重要的政策依据。

此外，邓小平还通过对有关选举权问题的批示，对选民登记工作进行指导。如1953年9月25日，邓小平为中共中央起草批转西北局《关于"五反"中宣告缓刑的完全违法户有无选举权问题的意见》的电报。电报指出："西北局关于'五反'中判处徒刑宣告缓刑的完全违法户，凡未经正式判决剥夺选举权利者，仍应给以选举权利的意见，中央认为是妥当的，并将该电转发各地，望参照仿行。"[③] 这就为全国各地在选民登记中处理此类问题确立了指导性原则。

选民登记结束后，各地开始进入代表选举阶段。在此过程

---

①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107—1108页。

②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109页。

③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135页。

中，邓小平对候选人的提名方式，以及选举工作的组织形式等提出了具体意见和要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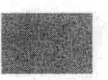
对于候选人的提名方式，邓小平在1953年3月8日中央选举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基层选举工作的报告中提出了明确要求。即：由乡选举委员会找农村中的共产党、青年团、合作社、农会、妇女会等组织的代表，共同协商后，由这些团体联合提出候选人名单。选民也可以单独提名。选多少代表，就提多少候选人。一个乡所选出来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一定要能够代表各阶层，有广泛的代表性。妇女代表要占一定的比例。共产党员的名额不能太大，最多不能超过三分之一。干部的名额不能过大，不能把人民代表大会变成干部会。[①] 这种提名方式，体现了选举的民主性和广泛代表性。

对于选举工作的组织形式，邓小平强调既要与生产相结合，又必须以选举工作为主。[②] 1953年4月21日，邓小平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批转中南局《关于开展基层选举工作的意见》的电报中指出："各地在选举运动中，必须注意讲求便利人民、不误生产的方法，同时也必须是以选举为主，在选民登记和候选人提名这些环节上去适当地结合新三反，而不应在选举期间内以新三反为主，以免影响选举的如期完成和农业生产的进行。"[③] 这些意见和要求，对指导各地的代表选举工作产生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此外，邓小平对部分地区在选举中所遇到的一些特殊问题，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指导。例如，1953年8月17日，邓小平对有关部门提出的关于基层选举中满族问题的请示，提出下列几点意

---

①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100—1101页。
②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100—1101页。
③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112页。



见：（一）满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重要民族之一。（二）凡自认为是满族的，自应确定其为少数民族；凡不愿承认为满族的，则听其自便。（三）在满族较多的地方，应有适当数目的满族的代表人物参加政府及民委等组织。但是，由于这个问题在东北牵扯很大，故在做法上似应采取哪里碰到这个问题就在哪里解决，哪里没有这个问题就不要勉强提起。[①] 又如 1954 年 4 月 28 日，邓小平对关于港澳的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如何进行选举的问题作出批示："在那里，不要去搞什么选举，但应在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有适当的代表名额（可按人口比例略多几个），这些代表必须是与港澳群众有一定联系的人物。其产生办法，不必开什么港澳代表会议，而采取将这些名额及人选分配到内地去选出的办法。在港澳进行一般的选举宣传是必要的，但不要谈港澳归属问题，不要谈港澳人民的选举问题。"[②] 上述意见和批示，对于相关地区和部门在代表选举中把握正确的政策方向，从而保证选举工作的顺利进行，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全国范围的基层选举工作原定从 1953 年 5 月开始，计划用 3 个月时间完成。后因若干省份水、旱灾害严重，以及高饶事件等因素，选举时间发生变动，最终于 1954 年 6 月结束。在此过程中，邓小平多次就选举时间的安排为中共中央起草电文或作说明报告，对基层选举工作的实际进程予以及时而又具体的督促和指导。

1953 年 3 月 7 日，邓小平主持各大行政区负责人会议，研究如何做好基层选举工作。会议确定：全国基层选举工作，将原来设想的 3 个月改为半年时间，即在本年 5 月到 10 月内进行，以

①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127—1128 页。

②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169 页。

利更好地实现选举的预期目标。[1] 后来，一些省份根据实际工作情况，请求推迟选举完成时间。6月初，邓小平为中共中央起草给各中央局、分局、各省市委关于推迟全国基层选举时间的电报，指出："全国基层选举一般地推迟于1953年12月底以前完成，有些省市亦可根据自己的工作情况，推迟到1954年1月份、2月份甚至3月份去完成。县（市）人民代表大会一般地推迟至1954年1月以前举行完毕，有些省市亦可推迟到2月份、3月份甚至4月份去完成。省（市）人民代表大会时间，以后另行规定。"[2] 9月18日，邓小平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8次会议上作《关于目前基层选举问题及推迟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问题的说明》。会议一致通过《关于推迟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决定全国基层选举工作，一般推迟到1954年1月底以前完成；有些省市如有困难，尚可根据当地工作情况，推迟到1954年3月底以前完成。

从后来的实际情况看，全国基层选举最后完成的时间是1954年6月。1954年6月19日，邓小平出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32次会议，并作《关于基层选举工作完成情况的报告》，对基层选举工作完成情况进行全面总结。在报告中，邓小平对全国基层选举工作予以高度评价。他说：这次普选是一个规模巨大的民主运动，它在我国人民政治生活中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全国基层选举的胜利完成，大大推动了我国人民民主制度的发展，并为县以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奠定了基础。在此基础上，我国的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将能够集中全国人民的意志，实现其庄严的

---

①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100页。
②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121页。

使命。[①]

最后，作为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协助中央确定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候选人名单，参与筹备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为确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出了贡献。

1954年6月各地基层选举工作完成后，7、8月间，各省、市、自治区先后召开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与此同时，确定由中共中央提名的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候选人名单、筹备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工作开始提上日程。在此过程中，作为党中央秘书长的邓小平自始至终参与其中，并发挥了重要作用。

早在1953年，邓小平即开始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分配及产生办法进行指导。4月23日，他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西南局并中共西藏工委的电报中指出：西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产生办法应是先经过上层协商，然后开一由上层人物组成的代表会议通过。但由于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还有一段时间，因此，邓小平特别强调，此项工作目前只能在内部考虑，还有充分时间，不必急于解决这个问题。[②]

随着基层选举工作即将结束，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工作开始进入酝酿和协商阶段，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对民主人士的安排。1954年3月21日举行的全国省、市委以上统战部长会议，讨论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民主人士的安排方案。会后，中央统战部将方案及有关说明先期报送中央审查。[③] 4月11日，邓小平将中央统战部报送的《对全国人民代表中民主人士安排的

① 《关于基层选举工作完成情况的报告》，《人民日报》1954年6月20日。

②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113—1114页。

③ 参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17页。

意见》批请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人审阅。[①] 7月5日，邓小平出席第一届全国政协常委会第56次扩大会议，协商并通过由中共中央提名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一部分候选人名单。[②] 经过反复酝酿和充分协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候选人名单最终确定下来。7月12日，邓小平将最后确定的名单批报毛泽东。[③]

经过各方面周密筹备，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召开在即。1954年9月3日，邓小平出席中央选举委员会第5次会议，在会上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工作完成情况的报告》。他指出：1954年6、7月间，全国150个省辖市、2064个县、自治县及县一级的单位和170个中央直辖市的区，全部召开了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有些暂时不进行基层选举的少数民族地区的专区级、县级单位也召开了人民代表会议。在这次会议中，各地均以无记名投票的方法，分别选举了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共16680人。7月底到8月中旬，各省、直辖市和内蒙古自治区先后召开了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在这次会议中，除了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审查政府工作报告等议程之外，都分别选举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西藏地方和昌都地区采取了代表会议的形式选出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25个省、内蒙古自治区、西藏地方、昌都地区和14个直辖市共选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136人。军队召开了军人代表大会，选出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60人。华侨事务委员会在所召开的有国外华侨代表参加的侨务扩大会议上，选出了全

---

①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165页。

②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182页。

③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184页。



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30人。总计各地区和各单位所产生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共1226人。此外，台湾省应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因该省尚待解放，名额暂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中有妇女代表147人，占代表总数的11.99%；少数民族代表除选举法规定的150人外，各省、市还选出27人，共占代表总数的14.44%。在全部代表名额中，各民族、各阶层都有与其地位相当的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工作已全部完成。[①]

这次基层选举，是中国人民第一次自主地行使神圣的民主权利，极大地激发了全国人民当家做主、管理国家的热情，增进了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把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1954年9月15日至28日，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邓小平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出席了会议。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选举产生了新的国家机构及其领导人。邓小平任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全国范围内的确立，开创了我国人民民主建设发展的新阶段。在这一过程中，邓小平为我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根本政治制度的确立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① 邓小平：《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工作完成情况的报告》，《人民日报》1954年9月4日。

第五章

DI WU ZHANG 揭批高饶

对于揭批和处理高饶，邓小平始终予以肯定。时隔25年后，他在回忆当年揭批高饶的情形时说：“揭露高饶的问题没有错。”“高岗想把少奇同志推倒，采取搞交易、搞阴谋诡计的办法，是很不正常的。所以反对高岗的斗争还要肯定。高饶问题的处理比较宽。当时没有伤害什么人，还有意识地保护了一批干部。总之，高饶问题不揭露、不处理是不行的。现在看，处理得也是正确的。”

邓小平到中央工作后不久，即经受了新中国成立后党内第一次重大斗争的考验。

就在邓小平由西南局来京担任政务院副总理之后不久，高岗、饶漱石也相继从东北局、华东局调京任职。高岗以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身份兼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饶漱石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应该说中央对他们二人是器重的，特别是高岗，他担任主席的国家计委有“经济内阁”之称。因此，当时有“五马进京，一马当先”之说。但高岗、饶漱石权欲熏心，对这样的安排仍不满足。尤其是高岗，对其职位处于刘少奇之下，一直耿耿

于怀。进京不久，他就把刘少奇在工作中的一些缺点错误搜集起来，并整理成系统材料进行传播。当他发觉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发展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等具体问题上有不同看法，并对刘少奇有所批评后，便以为刘少奇今后将不再受中央信任，其威信和地位将发生动摇，于是就借机向刘少奇发动攻击。

1953 年底，毛泽东为减轻自己担负的繁重日常工作，加强集体领导，曾考虑将中央的领导班子分为一线、二线，他自己退居二线，相应地对党和国家领导机构及人事安排进行调整。高岗和饶漱石认为实现他们权力野心的机会到了，于是积极进行活动。邓小平后来回忆说："毛主席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就在考虑一线二线问题。高岗就是在这件事上出了问题，他要抢这个一线。"[1]

高岗的阴谋活动从 1953 年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开始。这年 6 月 13 日至 8 月 13 日，中共中央召开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会议由周恩来主持。原定议程主要有三项：五年计划问题、财政问题和民族资产阶级问题。但由于高岗、饶漱石在会上的串联和干扰，会议后期走偏了方向，讨论和批评新税制实际上成为会议的中心问题，而且批评集中在当时主持中财委工作的薄一波身上。会议期间，高岗、饶漱石利用中央纠正财经工作中缺点错误的机会，施展阴谋活动，散布这次会议的方针"就是要重重地整一下薄一波"，并把薄一波在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上纲为两条路线斗争。他这样做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批薄"是为了"射刘"。[2]高岗还在会内会外散布流言蜚语破坏中央威信，攻击刘少奇、周恩

①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603—604 页。

② 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8 年，第 170 页。

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时鼓吹他自己。在这种情况下，主持会议的周恩来作结论时很为难。“最后还是毛主席出了个主意，他对周总理说：结论作不下来，可以‘搬兵’嘛！把陈云、邓小平同志请回来，让他们参加会议嘛！”①

陈云和邓小平回京后，分别在会议上发了言。邓小平说：“大家批评薄一波同志的错误，我赞成。每个人都会犯错误，我自己就有不少错误，在座的其他同志也不能说没有错误。薄一波同志的错误是很多的，可能不是一斤两斤，而是一吨两吨。但是，他犯的错误再多，也不能说成是路线错误。把他这几年在工作中的这样那样过错说成是路线错误是不对的，我不赞成。”② 邓小平和陈云的发言改变了会议气氛，同毛泽东和周恩来一起扭转了会议方向。

饶漱石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积极配合高岗的阴谋活动。1953 年 9 月 16 日至 10 月 27 日，中共中央召开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期间，饶漱石积极支持和参加高岗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夸大中央组织部工作中的某些缺点错误，借批判负责常务工作的安子文，把攻击矛头指向刘少奇。中共中央察觉到他们的阴谋，暂停会议，先举行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领导小组会议，解决中央组织部内部团结问题。饶漱石被迫在领导小组会议上作了检讨，从而打破了他企图利用这次会议分裂党的阴谋。邓小平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在 10 月 27 日会议结束时讲话，十分突出地强调了党的团结的重要性。他指出：“总路线问题和团结问题，是摆在我们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最基本的问题。我们党在 32 年中能够克服困难，走向胜利，就是因为路线正确

① 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8 年，第 171 页。
② 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8 年，第 172 页。



和团结一致。今天在实现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过程中，虽然会碰到各种问题，但只要全党团结，并经过党的团结去团结全国人民，就一定能够实现党的总路线。”①

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和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后，高岗更变本加厉地在党内秘密从事分裂活动。1953 年 10 月初至 11 月初，他以休假为名，南下华东、中南进行游说，并得到了林彪的支持。高岗从外地回到北京后，企图拉拢陈云、邓小平一起拱倒刘少奇。对这件事，邓小平于 1980 年 3 月 19 日在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作了如下回忆：“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三年底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活动得非常积极。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才敢于放手这么搞。那时东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华东是饶漱石。对西南，他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我谈判，说刘少奇同志不成熟，要争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刘少奇同志。我明确表示态度，说刘少奇同志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从总的方面讲，刘少奇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适当。高岗也找陈云同志谈判，他说：搞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这样一来，陈云同志和我才觉得问题严重，立即向毛泽东同志反映，引起他的注意。”②

1953 年 12 月 15 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议决定毛泽东外出期间中央书记处会议由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高岗、彭德怀参加，集体讨论解决问题。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提议在他外出休假期间，由刘少奇临时主持中央工作。刘少奇表示由书记处同志轮流主持为好。书记处其他同志都同意由刘少奇主持，不赞成轮流主持，唯独高岗一

①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133—1134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93 页。

再坚持说：轮流吧，搞轮流好。会后，高岗又分别找陈云、邓小平，动员他们也赞成轮流主持。[1] 高岗的用意就是要使刘少奇降格，其反对刘少奇的面目进一步暴露。

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高饶问题已非解决不可了。1953 年 12 月中旬以来，毛泽东多次与邓小平等人谈话。12 月 16 日，与邓小平谈话。12 月 17 日，与邓小平和陈云谈话（后加周恩来）。12 月 18 日，与周恩来、陈云、彭德怀、邓小平谈话。12 月 19 日，与邓小平和陈云谈话。12 月 23 日，召集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邓小平开会。[2] 这一系列谈话，都是专门谈高、饶问题。[3]

经过充分准备后，1953 年 12 月 24 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并在讲话中指出了高饶反党阴谋活动的性质及其严重性，对高岗提出了严厉警告和批评。会议一致同意毛泽东的建议，决定起草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12 月 29 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并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定（草案）》。《决定（草案）》是针对高岗、饶漱石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和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及其前后暴露出来的反党分裂活动起草的。邓小平出席了上述会议。[4]

毛泽东在杭州审改《决定（草案）》后，于 1954 年 1 月 7 日致信刘少奇并中央书记处全体成员，提议《决定（草案）》“似宜召开一次中央全会通过，以示慎重”，并对全会的召开时间、主要议程、报告内容等作出具体部署。[5] 毛泽东关于召开全会的提

①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150 页。
②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150、1151 页。
③ 《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80 页。
④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151、1152 页。
⑤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4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432 页。

议得到中央领导人的一致同意。

毛泽东的警告和七届四中全会的即将召开，使高岗、饶漱石慌了手脚。高岗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表示他犯了错误，拟在七届四中全会上作自我批评，并提出想到杭州去和毛泽东面谈。1954年1月19日，邓小平和周恩来、陈云、彭真、李富春出席刘少奇召集的会议，讨论高岗给毛泽东的信。会议提议：由毛泽东指定刘少奇、周恩来同高岗谈话，邓小平可参加。并请毛泽东回复高岗，不必去杭州，可委托他人找其谈话。[①] 1月22日，毛泽东就高岗来信事致信刘少奇：高岗不宜来此，他所要商量的问题，请和刘少奇、周恩来或再加上邓小平商量即可；全会上对任何同志的自我批评均表欢迎，但应尽可能避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以便等候犯错误同志的觉悟。[②]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1月25日、2月5日，刘少奇和周恩来两次同高岗谈话，邓小平均参加。2月3日，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同饶漱石谈话，邓小平亦参加。[③]

1954年2月6日至10日，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揭露和批判高岗、饶漱石阴谋活动。2月6日，邓小平在会上作了题为《骄傲自满是团结的大敌》的讲话，严肃批评高饶破坏党的团结和统一，篡党夺权，阴谋分裂党的活动，批评党内滋长的骄傲自满情绪。他指出：由于我们各方面的工作都获得了巨大的胜利，于是在我们党内，尤其是在我们党的高级干部中，滋长了骄傲自满的情绪。这种骄傲自满情绪如果不及时提醒，必然要使我们丧失敌情观念，

①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156页。
②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156—1157页。
③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156、1157页。

必然要破坏我们党的团结，那我们就要丧失斗志，经不住敌人的任何袭击，从而使我们的伟大事业遭到失败。他强调：骄傲会对自己在革命中的作用和贡献做出不正确的估价，例如有的人把某些人或者把他自己夸大到与实际情况极不相称的地步，不愿意受检查，不愿意受批评，自以为是，听不进别人的意见，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空气稀薄，不注意集体领导，不注意团结，对犯错误的同志不是采取治病救人的态度，不大照顾别的部门、别的地区等等。尤其严重的是，有些同志不注意维护中央的威信，对中央领导同志的批评有些已经发展到党组织所不能允许的程度。四中全会和全会的决议，对某些犯有严重错误的同志是很重要的，是给了这些同志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是对这些同志最直接的帮助，也是对我们全党同志，主要是对我们高级干部的最大的帮助。它是一副消毒剂，它启发了我们的阶级觉悟，提高了我们的警惕性，使我们党更加巩固，战斗力更加强大。[①]

七届四中全会结束后，根据中央书记处的决定，分别举行关于高岗和饶漱石问题的两个座谈会，对证和揭发他们搞阴谋活动的事实。

高岗问题座谈会由周恩来主持。饶漱石问题座谈会由邓小平、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书记陈毅和第三书记谭震林主持。会议于1954年2月17日至23日进行，共开了七次，前四次着重对证饶漱石所犯错误的事实，第五、六次是到会同志对饶漱石的错误进行揭发，第七次是饶漱石进行自我批评，最后由邓小平和陈毅发言。[②] 邓小平在23日的总结发言中说，希望饶漱石本着四中全会的方针，抱着抛弃错误的态度，在座谈会后向中央作彻底的交

①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01—208页。

② 《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49页注释［2］。



代，以便改正错误。[1]

3月1日，邓小平、陈毅和谭震林就座谈会情况报告中央，对饶漱石的问题归纳出四项结论：（一）饶漱石是一个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的野心家。他个人野心的欲望是日益上升的，而最尖锐的罪恶，是1953年他和高岗共同进行分裂党的活动。（二）饶漱石的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不是一般性的，有其特殊之点。他善于伪装，多年来以守法克己的伪装，在党内施展阴谋，争夺权位，不到重要关节不伸手，在伸手时亦常以伪善面目出现，以各种方法利用别人为其火中取栗。饶漱石的基本思想是不承认共产党是马列主义的统一的革命政党，而是把党看成派系林立的集团，认为投机取巧，运用手段，就可以凌驾一切。（三）饶漱石在党内进行争夺权位的斗争中采用了与党的作风完全相反的一套办法，把这些丑恶的所谓权术搬到党内来施展。（四）饶漱石对自己所犯的错误，直到现在，还不是采取彻底承认的态度。报告还总结了党在揭露饶漱石的错误时应当吸取的教训，这就是：党的统一领导和集体领导的原则必须坚持；党内民主必须提倡和发扬；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特别是高级干部间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必须发展；党的无产阶级嗅觉必须提高；党的团结必须加强，不让敌人有隙可乘；每个干部的共产主义人生观必须确立；全党的马列主义的教育必须加强。[2]

3月12日，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在第四页上'毛主席'改为'毛泽东同志'。其余均同意。"[3] 3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准了邓小平等关于饶漱石问题座谈会的报告。次日，中

①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159页。

② 《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49页注释［2］。

③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467页。

共中央将报告转发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书记，党中央各部委部长和主要负责人，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书记，军委各部门首长和军以上党委书记，指示他们亲自收存，准备向地委书记和军党委以上干部作口头传达之用。①

可以看出，中共中央在开始时对高饶事件的传达是相当审慎的。邓小平等关于饶漱石问题座谈会给中央的报告只转发到省（市）委书记及相当级别的党内高级干部，并且指示他们亲自收存，向地委书记和军党委以上干部只能作口头传达。鉴于高岗、饶漱石原来在党内地位的特殊性以及他们所犯错误的严重性，中央在初始阶段对高饶事件的传达限定在一定范围内是必要的。这可以尽量减小由此在党内引起的政治震荡。后来根据形势发展，中央又适时扩大了高饶事件传达范围。

1954 年 8 月 31 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将《关于传达中央宣布高岗、饶漱石反党罪行的报告提纲》及转发该报告提纲的通知送刘少奇和邓小平审阅。该报告提纲共四部分：（一）高岗、饶漱石的反党、反中央、阴谋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罪恶行为。（二）高岗、饶漱石反党、反中央的阴谋活动，反映了在过渡时期资产阶级破坏党、分裂党和瓦解党的要求。（三）揭穿高岗、饶漱石反党阴谋是我们党的胜利。（四）全党同志必须从高岗、饶漱石事件中吸取政治教训。转发通知的主要内容是：“根据中共中央 1954 年 8 月 17 日关于传达高、饶问题的指示，现在发给你们《关于传达中央宣布高岗、饶漱石反党罪行的报告提纲》，以供应用和参考。”② 9 月 2 日，邓小平在审改通知稿时加写：“这个提纲只印发给作报告的同志，不要登党刊，并且要告诉作

① 《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 6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48 页。

② 《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 6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346—347 页注释［1］。

报告的同志，在对党团员作报告时，除了提纲中所举的事实外，不要另举其他不适当的事实。”并批示：“尚昆阅送少奇同志速阅发（此件宜快发，因下面传达已有些混乱。我看内容虽不完全，但无重大毛病）。”[①]

邓小平在反对高岗、饶漱石的斗争中充分表现了对党高度忠诚负责的优秀品格和出色的组织能力，深得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器重与信任。1954年4月27日，邓小平被任命为党中央秘书长，并接替饶漱石兼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②]主管党中央的日常工作和组织事务。这是他第三次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职务。

1955年3月21日至31日，中国共产党召开全国代表会议。此前，3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周恩来准备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作的《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并通过邓小平提出的于次日上午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预备会议的建议。后因周恩来做阑尾炎手术，改为邓小平作报告。[③]

3月21日，邓小平在会上代表中共中央作《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报告讲了五个方面的问题：（一）全党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已经彻底粉碎了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阴谋活动。（二）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阴谋活动是怎样暴露的？党中央对他们的阴谋活动采取了怎样的措施？（三）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最大罪恶，就是在党内施用阴谋方法来夺取权力，而这是同党的生命不能并存的。（四）高岗、饶漱石这样的阴谋家为什么会在我们党内出现？（五）中央政治局认为，

---

①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193页。

②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168页。

③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219页。

为严肃党纪，应当开除高岗的党籍，撤销饶漱石的中央委员资格。[①]

邓小平在报告中对高岗在财经会议上的所作所为作了结论。他说：高岗利用财经会议“大大施展他的阴谋活动。他和他的追随者不但在会议上为了有意制造党内纠纷而发表种种无原则的言论，并且在会外大肆散播各种流言蜚语破坏中央的威信，特别攻击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少奇和周恩来同志，同时鼓吹他自己。他是想经过这些阴谋活动把这次会议转变为对党中央的进攻”。[②]

邓小平在报告中全面论述了党同他们进行这场斗争的重要意义和经验教训。他指出：对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斗争使我们看到骄傲自满情绪和个人崇拜思想的危害性。他们所以走上反党的道路，同他们长期间在工作中骄傲自满、不愿意看到自己的缺点错误、不愿意受人批评监督的恶劣倾向是分不开的。这场斗争，再一次向我们指明了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的严重意义。加强党的思想工作，不断地同腐蚀我们党的各种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是我们党的一项基本任务，在这方面工作的任何减弱都是对党有害的。[③] 又指出：我们的党必须经过一定的组织对任何一个党员（哪怕是最负责的党员）的工作实行严格的有系统的监督。必须接受高饶事件的严重教训，切实健全各种必要的制度，首先是建立和加强中央对全国各地方和上级对下级的巡视检查制度、一定的党的工作部门监督一定的国家工作部门的制度、管理干部的部门同时负责检查干部的实际工作情形的制度，同时必须迅速建立党的中央和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以防止

---

① 《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92页注释［1］。

② 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第171页。

③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222页。

像高饶事件这一类严重危害党的利益的事件重复发生。[①]

会议正式通过《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决定开除高岗、饶漱石的党籍，撤销他们所担任的一切职务。高饶事件以高岗、饶漱石的阴谋活动彻底失败而告终。随后在4月4日召开的中共七届五中全会批准了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通过的《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在这次全会上，邓小平被增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②]

1956年9月16日，邓小平在中共八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再次向全党指出："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基本特点，就在于进行毫无原则的广泛的阴谋活动，企图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这一联盟企图把持某些地区和某些工作部门，作为反对中央和进行篡夺活动的'资本'，并且为着同一目的，在各个地区中和人民解放军中，进行反对中央的煽动。他们的阴谋活动，完全违反党和人民的利益，而仅仅有利于中国人民的敌人。正因为这样，一九五五年三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对于一九五四年二月七届四中全会和中央政治局在四中全会以后所采取的有关措施，表示了完全一致的同意。"又说："党中央决定开除高岗和饶漱石的党籍，因为他们的行为，对于党和人民的利益，有极端严重的危害，并且他们在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前后的长时期中，在党再三向他们敲了警钟以后，他们仍然没有悔改的表示。党中央在一九五三年夏季召集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和同年九十月间召集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都着重地要求全党加强团结，反对破坏团结的行为，但是，这些醉心于分裂党和夺取权力的阴

①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1949—1978）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294页。

②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224页。

谋家完全置若罔闻。”①

对于揭批和处理高饶，邓小平始终予以肯定。时隔25年后，他在同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回忆起当年揭批高饶的情形，仍然说：“揭露高饶的问题没有错。”“高岗想把少奇同志推倒，采取搞交易、搞阴谋诡计的办法，是很不正常的。所以反对高岗的斗争还要肯定。高饶问题的处理比较宽。当时没有伤害什么人，还有意识地保护了一批干部。总之，高饶问题不揭露、不处理是不行的。现在看，处理得也是正确的。”②

在反对高岗、饶漱石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重大斗争中，邓小平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为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发挥了重要作用，作出了重要贡献。

①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8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3—294页。

第六章 筹备八大

DI LIU ZHANG

中共八大是党和国家历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作为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承担了具体负责筹备八大的重任，并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从确定八大报告起草人到处理各种文件，从起草大会的报告到安排大会的具体日程，从讨论八大代表选举问题到提名八届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候选人，从审改大会发言稿到安排大会发言，其间有关八大的大小事宜，邓小平几乎都参与决策和讨论，为会议的成功召开作出了历史贡献。

1955年3月31日，毛泽东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代表中共中央宣布了1956年下半年召开八大的决定，要求1956年7月前完成代表的选举及文件的准备工作。[1] 会议结束后，邓小平随即投入到八大的各项准备工作中去。从确定八大报告起草人到处理各种文件，从起草大会的报告到安排大会的具体日程，从讨论八大代表选举问题到提名八届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候

① 参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04页。

选人，从审改大会发言稿到安排大会发言，其间有关八大的大小事宜，邓小平几乎都参与决策和讨论。

筹备八大最重要的工作是准备大会报告。1955 年 4 月 21 日，邓小平将草拟的八大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名单和修改党章、修改党章报告起草委员会名单报送毛泽东。毛泽东很快批示，要求提交政治局会议讨论。5 月 12 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这两个名单。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由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王稼祥、陆定一、胡乔木、陈伯达 7 人组成。修改党章和修改党章报告起草委员会由邓小平、杨尚昆、安子文、刘澜涛、宋任穷、李雪峰、马明方、谭震林、胡乔木 9 人组成。[①] 邓小平同时参加了这两个起草委员会的工作。

作为八大的主要筹备人，邓小平担负着对大会及会议文件的说明解释工作。根据毛泽东"由邓小平同志报告第八次党（代）大会问题决议的意义和内容"[②] 的提议，邓小平数次在中央全会上对八大相关文件作解释和说明。他的说明深入浅出，言简意赅，完整准确地表达了中央的意图，深受与会人员的欢迎，也得到毛泽东的赞赏。1955 年 9 月 18 日，毛泽东在邓小平起草的《关于召开第八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草案的说明》上满意地批道："我认为可以照这样去讲，只改了几个字。"[③] 按照这一批示，10 月 4 日，邓小平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上作了该说明，着重对八大与七大间隔时间较长的原因及八大的酝酿过程等作了解释，收到很好的效果。

邓小平指出：从一九四五年召开党的七大到一九五六年召开

---

① 《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509 页。

②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5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56 页。

③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5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87 页。

八大，相距十一年，时间是很长的。原因是：一九四五到一九四九这四年，我们正处在急风暴雨的革命战争中；一九五〇到一九五二这三年，我们全力贯注地进行了完成民主改革、恢复国民经济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这些极为繁重的巨大的工作，并且进行了紧张的抗美援朝斗争。因此，在这七年中间没有召开党代表大会，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一九五三年我们国家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在一九五二年底，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在考虑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同时，就曾经考虑到召开党的八大的问题，当时并且决定了先召开一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接着在一九五三年下半年，经过全国财经会议和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之后，党中央察觉了高饶反党联盟的问题。从那时起，党经过了一九五四年二月的四中全会和今年三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对于这个事件做了严肃的处理。显然地，在解决了高饶反党联盟这件重大事件之后，再来考虑召开八大问题，无疑是更为适当的。还应当指出，在这两年多中，党规定了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并公布了国家的宪法，国家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进行了一半多的时间，在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工作中，都有了更多更宝贵的经验。同时，党在这几年，经过老区的整党以及城市和新区的建党，经过审查干部的工作，经过总路线的宣传，经过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一系列的实际斗争的教育，特别是经过了对高饶反党联盟的斗争，党的组织比过去更为团结和巩固，党员的政治觉悟水平比过去也有所提高。所有这些，就实际上对党的八次大会作了更为充分的政治准备和组织准备。这样看来，八大的召开迟了几年固然是一个缺陷，但是，无论从政治上或组织上说，一九五六年召开八次大会，将会开得更为完满一些，这是可以肯定的。《说明》还对

《关于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选举办法的规定》作了解释。[①]

1956 年 8 月 22 日，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上，邓小平代表中央政治局对提交会议讨论的《八大日程草案》《八大会议规则草案》《七届七中全会关于第八届中央委员会选举工作的建议草案》《八大各代表团正副团长名单草案》《八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名单草案》和《八大预备会议的工作安排草案》等 6 个文件作了说明。[②]

8 月 30 日，在八大预备会议第一次会议上，邓小平又就七届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讨论通过的这 6 个文件向大会作了说明。他在介绍八大的选举问题时指出：七届中央委员会的委员是不是全体列到候选人名单里面，并全部选出。这里面比较大的问题，就是两条路线的问题：一个是李立三同志的问题；一个是王明同志的问题。中央过去曾经多次考虑过这个问题，也跟很多同志谈过，觉得七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包括李立三、王明两位同志）全部当选比较有利。因为这个问题在我们党的生活里面，在党内斗争和党的团结问题上，是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这个问题不但在国内，在国际上也是有影响的。[③] 又说：我们党从遵义会议以后，采取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对待犯错误的同志。我们这一套，使到中国访问的外国同志听后都很感动，他们觉得我们这个法子好，觉得对他们帮助最大。真正能够代表我们党的作风的，最能说服人的，是对待两条路线斗争中犯错误的同志的态度问题。[④]

---

①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258—1259 页。

②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304 页。

③ 《中共八大文献连载》，《党的文献》2006 年第 5 期。

④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306 页。

在筹备过程中，邓小平还承担了大量起草和审改各种文件的工作。1956 年 7 月 31 日，他起草了中共中央给在莫斯科的王明的电报，通知王明：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已经定于 9 月 15 日召开。你将由北京市党代表大会选举为出席八大的代表，如果健康条件许可，中央盼你能出席这次大会。希望得到你的答复。8 月 6 日，因没有得到王明的答复，邓小平又起草中共中央给正在苏联进行工作访问的李富春的电报，委托李富春去看望王明，面告八大的会期，询问他的身体状况及可否回国参加八大；如果他因健康关系不能出席八大，则请问他是否准备对大会提出书面意见。[①]

王明于 1956 年 9 月 8 日从莫斯科回电刘少奇并转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电文说："少奇同志并请转中央和主席：自 8 月 7 日接到中央盼我在健康条件许可下能出席八大电示后，我个人及医疗、护理方面曾作了更多的努力，但至今身体病况仍不许可我有回国参加八大学习的可能，乃不得不以深沉的愧歉心情向中央和八大主席团专电请假。七大至八大期间我国人民及其武装力量在我党正确领导下经过了极其复杂而艰巨的革命斗争，在新的有利的国际形势和国内阶级力量对比变化条件下，取得了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胜利。继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之后既取得了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主义革命的完全胜利，建立起执行无产阶级专政历史任务的人民民主国家，又取得了建设社会主义和维护世界和平的辉煌成果。我谨祝我党八大工作完满成功。我深信，我党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央领导下，一定能动员和组织全体党员及全国人民为实现八大决议而英勇奋斗，在与苏联共产党及

①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301 页。

各国兄弟党密切合作和互相支援下，在建设社会主义和争取持久和平的伟大事业中，获得更进一步的胜利。”[①] 9月11日，邓小平按照毛泽东10日“此件可以印发各代表”[②] 的批示，批示杨尚昆将王明复电印发出席中共八大的代表。[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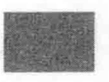
1956年8月15日，邓小平又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的通知》。《通知》说：（一）八次大会定于9月15日开幕。（二）现决定于9月1日到9月14日，举行八次大会的预备会议。（三）请你们通知各代表务于8月31日以前到达北京，向中央办公厅报到。（四）中央决定各地区和各单位所选出的候补代表，一律列席八次大会，请通知他们同时到达北京。[④]

同年8月23日，他在审改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宣传报道工作的通知》时加写：各国代表团到达和离开我国时，“一律不发个别的消息，只在代表团到齐的时候和他们大都离开的时候，发两次简要的综合消息”。同时就对外国代表团的宣传报道批示：“不能专对少数人扩大宣传，这样容易得罪多数人。而且这次来的头头很多，也很难突出某些个人。”这些都显示出邓小平十分注重宣传的政策和策略。

召开八大，首先要选举会议代表。八大的一项重要议程是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因此在筹备阶段要产生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这两项选举工作都是在邓小平的组织下进行的。

1956年1月18日至5月18日，邓小平多次主持召开会议，讨论八大代表问题。1月18日，主持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书

① 《中共八大文献连载》，《党的文献》2006年第5期。
②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98页。
③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309页。
④ 《共和国五十年珍贵档案》（上册），中国档案出版社1999年版，第495页。



记会议，讨论八大代表名额的安排等问题。3月23日，主持召开中共中央秘书长会议，讨论中共八大代表选举问题。4月24日，再次主持召开中共中央秘书长会议，讨论中共八大代表名单。5月11日、12日、18日，又连续主持召开中共中央秘书长会议，讨论中央机关出席八大的代表候选人问题。[1] 5月13日，在审改中共中央《关于八大代表候选人名单问题》给各地的电报时，加写“代表大会必须对所有候选人加以郑重的审查，对于不适当的候选人，应加以变动”，[2] 对代表资格审查提出严格要求。

八大筹备最早的工作是拟定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候选人名单。这是大会筹备的重要工作，中央高度重视。据李雪峰回忆，这项工作“就是由小平同志和一些老同志负责，先从6个大区和军队的领导同志中选，大家可以随便提，提了约400人，比较全面”。[3] 1956年7月30日，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负责研究八大的选举问题和中央领导机构设置方案，并指定陈云和邓小平为委员会的召集人。8月4日、6日和10日，邓小平召集专门委员会会议，讨论八大选举等问题。[4] 在集思广益并深入讨论的基础上，邓小平于8月22日的七届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对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选举工作的建议：第一步，由各代表团提出一个名单，中央不先提名，大会主席团也不先提名单。第二步，各代表团提出名单后，由中央政治局和各代表团正副团长负责把各代表团提出的名单加以整理、研究，确定包括正式委员与候补委员在内的选举名额和预选名单，然后各代

①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269—1289页。

②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289页。

③ 李雪峰：《我在小平同志领导下工作的二十四年》，见《回忆邓小平》（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20页。

④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300、1302页。

表团讨论酝酿，进行预选。第三步，各代表团预选的结果交政治局，由政治局和代表团正副团长共同研究，确定正式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具体名额及其提名。[①] 邓小平的设想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后，随即付诸实施，得到与会代表的高度认同，也使整个会议充满民主精神。受此启发，9 月 28 日，八届一中全会选举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时，也借鉴了这一方式，表明中央对邓小平工作的充分肯定。

代表发言不是八大的主要议程，却是大会的重要内容。作为八大筹备工作具体负责人，邓小平精心组织代表准备大会发言，亲自审改代表发言稿，并提出具体意见。

据《邓小平年谱（1904—1974）》记载，罗瑞卿、谭震林、徐向前、彭真、邓颖超、刘澜涛等人的发言稿都曾由邓小平审阅或修改。1956 年 9 月 3 日，在审阅罗瑞卿的发言稿《关于我国肃反斗争的主要情况和执行党在肃反斗争中的正确路线的若干经验》时，批示：对反革命活动，帝国主义、国民党还不断派特务进来，须举一二例子（每个例一两句话）。并建议他把发言稿直接送毛泽东看看。9 月 12 日，审改谭震林发言稿时，建议他最好对有关段落改写一下，并于 16 日再次审改谭震林修改后的发言稿。彭真准备的发言稿《关于革命胜利后的群众路线问题》，前半部分强调执政党需要高度注意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的作风，后半部分针对苏共二十大揭露斯大林晚年的错误问题，阐述了正确对待革命领袖和反对个人崇拜问题。9 月 17 日，邓小平阅彭真发言稿时，在肯定“这是一个好的发言”的同时，指出后一部分“分寸是否恰当，就要多找几个人斟酌才行”。建议他先请陈伯达

① 石仲泉等：《中共八大史》，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26 页。

看，后送刘少奇审定，“可能的话，请主席看看”；并提出这一部分“可以概括一点说，文字上也可得到缩短”。[①] 这些意见对于提高他们发言稿的质量和水平，保证正确的政治方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七届七中全会和八大预备会议上，邓小平对大会发言提出了具体要求，指出：八大大会发言要精彩、生动、多样性，还要短。要有人讲一讲主观主义，有人讲一讲宗派主义。[②] 关于发言内容，邓小平提出要表现会议是在讨论建设这个重点；关于发言时间，一般不超过 20 分钟；关于发言人数，他提出要争取比较多的人发言，准备 120 篇以上的发言稿，选百把篇，准备讲 80 篇以上，在报上登一二十篇。[③]

在邓小平的精心组织下，整个会议期间有 68 人作了大会发言，45 人作了书面发言。这些发言者既有中央领导，也有各地区、各部门的负责人，还有来自基层的党组织负责人或普通党员。发言人数之多、代表面之广，在党的历次代表大会上都是少见的，体现出代表们高度的政治热情和会议空前的民主气氛。

修改党章和起草修改党章的报告是八大筹备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这项工作是在邓小平亲自主持下进行的。

党章的修改工作，邓小平一直抓得很紧。据李雪峰回忆：“党章初稿于 1955 年 10 月 20 日完成后，小平同志就批示分发给我们再进行修改。1956 年 2 月，他赴莫斯科参加苏共二十大前夕，还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会议讨论修改党章报告问题。4 月初，他又多次主持会议，讨论修改党章问题。当各种意

①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306、1309、1314 页。
②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310 页。
③ 石仲泉等：《中共八大史》，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37 页。

见讨论得差不多时，毛泽东同志于4月下旬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党章。”①

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总结讲话里，专门谈到修改党章问题。他说：“中央究竟是设一个副主席还是设几个副主席，也请你们讨论。少奇同志提出设几个副主席，现在的这个党章草案上是说设一个副主席。还有，是否可以仿照人民代表大会的办法，设党的常任代表。”“是不是可以考虑采用这个办法，比如五年一任。这还没有写到党章草案上去，提出来请大家考虑，看是否可以。”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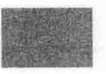
毛泽东的这些意见，很快被吸收到党章修改稿里。5月28日，邓小平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印发党章修改稿交各地方、各单位讨论的通知》，将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实行常任制和增设几个中央副主席、设立另外性质的书记处等问题，提请各地党委主要负责人讨论。《通知》指出：“在党章修改稿中，有两个问题请你们特别注意：（一）修改稿中规定全国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代表大会采用常任制度，并且规定各级代表大会每年开会一次。这是一个重大的改变，请你们考虑这种制度是否适当。（二）第三章第九条中关于中央机构问题，曾考虑到两种形式。一种是保持原来性质的书记处，增设一个副主席或者不设副主席；一种是不设原来性质的书记处，增设几个副主席，并且设立另外性质的书记处或者其他名义的组织。请你们考虑哪一种形式较好。”③

两个多月后，党章起草小组在收集各省、市、区党委和中央各部委党组、党委的意见后，形成新的党章修改稿。8月5日，

① 李雪峰：《我在小平同志领导下工作的二十四年》，见《回忆邓小平》（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20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54页。

③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290—1291页。



邓小平向毛泽东报送中央领导机构设置方案即党章第37条草案，该条为："党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的常务委员会和中央书记处，并且选举中央委员会主席一人、副主席若干人。"毛泽东审阅该条时，在"副主席若干人"后加写了"和总书记一人"6个字。[①] 邓小平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对党章修改稿作了修改，准备提交八大讨论通过。

修改党章和起草修改党章的报告这两项工作是穿插进行的。邓小平在主持修改党章的同时，对起草修改党章的报告也十分重视。

1956年7月23日，胡乔木完成《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初草）》前四部分，邓小平收到后作了不少修改，改动较多的是第一部分。在这一部分，邓小平加写了"现在国家的情况和党的组织情况都同七大的时候有了显著的不同"，"从七次大会到现在的十一年中，我们国家经历了天翻地覆的伟大变革"，"七年来，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方面，都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党员的数目比第七次大会的时候差不多增加了十倍，比一九四九年全国胜利的时候也差不多增加了三倍，而且绝大多数党员都在各级国家机关、经济组织和人民团体中担负了一定的工作。这些情况，要求我们十分注意加强党的组织工作和对于党员的教育工作"等内容。此外，对第三部分，邓小平也作了不少修改。在这部分中加写了"我们党内时常出现这样的干部，他们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十分爱好自成系统，自成局面，政治上自由行动，不喜欢党的领导和监督，不尊重中央和上级的决定"等内容。[②]

8月11日，胡乔木起草出后两部分，续完全稿，共六部分。

---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65页。

②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299—1300页。

邓小平又对报告第一部分补写了重要内容，指出了党所处历史环境的变化，以及由此引发的党组织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党的建设的总任务等问题。这一部分虽然只有约1700字，但可以说是整个报告的纲。[①]

在报告的第二部分，邓小平还列举了在党的组织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存在的形形色色的官僚主义倾向。

一是“不少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高高在上，不接近群众，不重视调查研究，不了解工作中的真实情况。他们往往不是从客观的实际条件和人民群众的具体实践出发，来考虑和决定他们的工作，而是从不确切的情况出发，从想象和愿望出发，主观主义地来考虑和决定他们的工作。因此，他们作出的决议、指示虽然很多，但有的不完全正确，有的甚至完全错误。他们在执行中央和上级的指示的时候，往往不采取同下级同志和群众商量的办法，不结合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而只是机械地盲目地搬运。他们往往满足于表面上的成绩，而不注意工作的实际效果，或者只看到工作中好的方面，看不到工作中坏的方面，或者只追求数量，不讲究质量。他们对自己的工作心中无数，常常‘左’右摇摆，有时表现为右倾保守，思想落后于实际，有时又表现为急躁冒进，贪多求快，超过实际的可能”。

二是“不少机关的负责同志，把自己的绝大部分时间，用在处理文电和不必要的过多的开会上面，很少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了解他们的要求和研究他们的经验，这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事务主义和文牍主义的泥坑。不少领导同志，喜欢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建立庞大的机关，由于机构臃肿，层次重叠，不能使群众

---

① 石仲泉等：《中共八大史》，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96页。

的意见和要求正确地及时地反映上来，也不能把自己的决议和指示正确地迅速地贯彻下去，在自己和群众之间，设置了许多人为的障碍。不少负责同志，对于工作中需要立即解决的问题，不是亲自动手来处理，而是层层下放，然后又层层上报，结果不是处理有错误，就是处理不及时，使工作受到许多损失。更严重的是有些领导同志，不愿意接近群众，不关心群众的痛痒，对于群众要求迫切解决的问题，不是积极地去解决，而是抱着一种无动于衷的冷淡态度”。

三是“有一些干部有严重的骄傲自满情绪。他们夸大个人的作用，强调个人的威信，只能听人奉承赞扬，不能受人批评监督，甚至有些品质恶劣的人，还对批评者实行压制和报复。我们党内还有一种人，他们把党和人民的关系颠倒过来，完全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在人民中间滥用权力，做种种违法乱纪的坏事”。

四是“官僚主义倾向还有一种比较大量的表现，就是命令主义。不少党的组织和干部，在作出决议、指示以前，既不同群众商量，在执行决议、指示的时候，对群众又不是采取说服教育的方法，而是企图一切依靠命令行事”。①

修改之后，8 月 27 日，邓小平把《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修改稿）提交起草委员会集体修改。当日，邓小平嘱杨尚昆将该稿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连夜进行了修改，并批示：“此件看了一遍，觉得大体可用。作了一些小的修改，请你们酌定。第 23 页上批了一点建议修改的意见，请考虑。”②

毛泽东所作的修改主要有两处：一处是在报告的第一部分第一段，“这个草案，同第七次大会所通过的党章比较起来，并没

---

① 《邓小平文选》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21—223 页。

②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6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87 页。

有根本原则上的不同，但是，在具体内容上却有了很多的改变”之后，加写了“其中包含一些带有原则性的改变”14个字；另一处是在报告倒数第四段分析党胜利的原因时，在“要归功于人民群众对于我们的信任和支持，要归功于全体党员的艰苦奋斗”前面，加写了“首先和最主要地”7个字。这两处修改意见，在邓小平1956年9月16日向八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都采纳了。

《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修改稿）第23页在论述党内民主并未因党的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开得不经常而受到严重影响的理由时，列举了一系列重要会议。毛泽东在这段文字旁批了两条意见：一条是“1955年3月的全国代表会议应在此处提出”；另一条是“没有说1953年的财经会议和粮食统购统销会议，也没有说1949年的扩大的二中会议”。邓小平据此又加写了这四次会议。①

邓小平主持起草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分析了党在执政情况下面临的种种新考验，突出地提出反对官僚主义和骄傲自满情绪的问题，认为它必然会发展成为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报告还要求坚持党的集体领导，反对个人崇拜；重视党内的思想教育，提高全党的马列主义思想水平；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发展党内民主生活，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加强对党的组织和党员的监督，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这些重要思想提出了在全面执政情况下加强党的建设工作的主要方针，奠定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的建设的理论基础。

---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88页。



八大筹备工作的重中之重是起草政治报告。邓小平参加了政治报告的起草、讨论和修改工作。据李雪峰回忆："由于大家的努力，修改党章报告完成得比较早，后来他（指邓小平——引者注）又将精力集中到起草政治报告上去了。"①

八大政治报告的起草和修改历经一年零四个月时间，各种修改稿达 80 多份，大的修改有 5 次。作为八大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成员，邓小平自始至终参加了报告的起草、讨论和修改工作。

最早的稿子是 1955 年 12 月写出的，由起草委员会成员陈伯达起草。刘少奇于 12 月 15 日批示，印送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邓小平等 26 人审阅修改。② 这个稿子到下一个修改稿，中间经过了 7 个月时间。从 1956 年 6 月底开始，八大政治报告进入具体起草阶段。6 月 30 日，刘少奇召集陈云、邓小平等开会，布置报告的起草工作。③ 7 月初，八大政治报告第一个修改稿写出。刘少奇批示杨尚昆："此件请印发。发给名单请同小平同志确定。"④

八大政治报告的起草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进行。从 7 月初到八大召开前夕，毛泽东先后主持了 19 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八大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会议和少数有关人员参加的会议，讨论八大政治报告。⑤ 邓小平参加了这些会议。

1956 年 7 月 6 日至 14 日，邓小平多次参加毛泽东召集的八大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会议，讨论报告起草问题。15 日和 19 日，

---

① 李雪峰：《我在小平同志领导下工作的二十四年》，见《回忆邓小平》（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20 页。

② 石仲泉等：《中共八大史》，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51 页。

③ 《刘少奇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793 页。

④ 石仲泉等：《中共八大史》，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53 页。

⑤ 《刘少奇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793 页。

毛泽东又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讨论，邓小平均参加。[①] 7 月 23 日，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等先后移往北戴河，继续商讨中共八大主要文件的修改。在北戴河近一个月里，毛泽东先后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两个报告的起草委员会会议等多种会议，对政治报告等文件进行仔细推敲和认真修改，还常常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交换意见。7 月 27 日，邓小平参加毛泽东召集的八大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会议，讨论八大政治报告初稿的修改问题。8 月 10 日，又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八大政治报告初稿。8 月 11 日，毛泽东约刘少奇、邓小平等 7 人谈八大政治报告修改问题。[②] 8 月 12 日，邓小平参加毛泽东召集的修改八大政治报告初稿讨论会。8 月 21 日，又和刘少奇等在毛泽东处开会，谈八大政治报告稿问题。8 月 29 日、31 日，邓小平参加毛泽东召集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八大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委员和八大各代表团团长会议，讨论八大各项报告等。9 月 7 日，又参加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央书记处书记会议，讨论八大政治报告稿的修改等问题。[③]

此外，邓小平还于 1956 年 8 月 11 日参加刘少奇召集的修改中共八大政治报告初稿讨论会，并于 8 月 13 日在北戴河召集有关人员开会，讨论八大政治报告初稿。[④]

邓小平在参加八大政治报告的起草、讨论和修改工作中提出报告要突出经济建设等重要意见。1956 年 8 月 22 日召开的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上，邓小平在谈到八大议题与发言安排

---

① 石仲泉等：《中共八大史》，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97 页。

② 石仲泉等：《中共八大史》，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500 页。

③ 本段史实凡未加注者均参见《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297—1308 页。

④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303 页。

时，建议把国家经济建设作为八大政治报告讨论的重点。他强调，八大议题和安排发言，应该突出八大讨论国家经济建设的主题。像工业方面，除了一些较有系统性的发言外，还要组织二十几篇稿子，体现会议是讨论建设这个重点。① 对此，毛泽东深表赞同，当即指出："小平同志说得对，这一次重点是建设，有国内外形势，有社会主义改造，有建设，有人民民主专政，有党，报告里面有这么几个大题目，都可以讲。但是重点是两个，一个是社会主义改造，一个是经济建设。这两个重点中，主要还是在建设，占这个报告的主要部分，三万字中有三分之一是在讲建设。"② 邓小平强调把国家经济建设作为八大讨论的主题，突出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对八大正确路线的制定起了积极作用。这对于保证会议的正确方向以及实现党的工作重点从社会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转移，具有重要意义。

经过周密筹备，中共八大于1956年9月15日至27日在北京隆重举行，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空前的盛会，开得非常成功。八大在历史转折时期宣告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完成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确立，宣告了社会主义全面建设新时期的开始，为党制定了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大会的成功召开，与邓小平为会议所作的筹备工作和付出的艰辛劳动是分不开的。1987年10月13日，邓小平在会见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总书记卡达尔·亚诺什时说，1956年八大的准备工作是我主持搞的，那时我才52岁。③ 言语之间透着自豪。

① 转引自《邓小平画传》，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18页。

② 转引自刘金田：《邓小平与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发表》，《党的文献》2007年第3期；《中共八大文献连载》，《党的文献》2006年第5期。

③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10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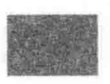
第七章 当选常委

DI QI ZHANG

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邓小平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成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从此，邓小平进入党的最高领导层。这年他刚满52岁。毛泽东两次向与会同志推荐邓小平当总书记，并评价说，邓小平“这个人比较顾全大局，比较厚道，处理问题比较公正”。中共八大选择邓小平进入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的形成准备了历史条件。

1956年9月16日，邓小平在中共八大全体会议上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15日晚，毛泽东要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主任叶子龙给邓小平打电话，嘱邓小平早点休息，明天要作修改党章的报告。[①] 显示出毛泽东对此事的重视。邓小平在报告中全面深刻地论述了执政党自身建设、党的群众路线、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党的团结和统一等问题，提出了党在执政条件下加强自身建设的任务和措施。

①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312页。



关于执政党自身建设，邓小平在报告中明确指出，执政党的地位，使我们党面临种种新的考验，主要是："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使我们同志沾染上官僚主义的习气。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对于党的组织和党员来说，不是比过去减少而是比过去增加了。而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结果，必然发展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这种错误在我们党内也不是比前几年减少而是比前几年增加了。""执政党的地位，还很容易在共产党员身上滋长着一种骄傲自满的情绪。"有些党员看不起别人，看不起群众，看不起党外人士，喜欢以领导者自居，喜欢站在群众之上发号施令，遇事不愿意同群众商量。"这实际上是一种狭隘的宗派主义倾向，也是一种最脱离群众的危险倾向。"[①] 为此，除了加强对党员的思想教育外，还要从国家制度和党的制度上作出适当的规定，以便从党的内部和来自群众与党外人士这两个方面对党的组织和党员实行严格的监督，从而巩固和加强自己的执政地位，防止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

关于党的群众路线，邓小平在报告中论述了在执政条件下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的重要意义，指出，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组织工作中的根本问题，是党章中的根本问题，是需要在党内反复进行教育的。党的群众路线包含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方面，它认为人民群众必须自己解放自己，党的全部任务就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群众服务。另一方面，它认为党的领导工作能否保持正确，决定于它能否采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一个党和它的党员，只有认真地总结群众的经验，集中群众的智慧，才能指出正确的方向，领导群众前进。

---

①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4页。

邓小平在报告中提出了贯彻群众路线、克服官僚主义的五条具体措施：第一，必须在党的教育系统中，在党员的教育材料中，在党的报刊中，着重进行党的群众路线的教育。第二，必须有系统地改善各级领导机关的工作方法，使领导工作人员有足够的时间深入群众，善于运用典型调查的方法，研究群众的情况、经验和意见，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把绝大部分时间用在坐办公室、处理文件、在领导机关内部开会上面。应该缩小领导机关，减少领导机关的层次，尽可能地把多余的工作人员腾出来派到下层去，使留在领导机关的工作人员必须亲自处理实际工作，防止领导机关官僚化的危险。第三，必须健全党的和国家的民主生活，使党的和政府的下级组织，有充分的便利和保证，可以及时地无所顾忌地批评上级机关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使党和国家的各种会议，特别是各级党的代表大会和人民代表大会，成为充分反映群众意见、开展批评和争论的讲坛。第四，必须加强党的和国家的监察工作，及时发现和纠正各种官僚主义现象，对于违法乱纪和其他严重地损害群众利益的分子，及时地给以应得的处分。第五，各地区各部门党的组织，必须运用过去整党工作的经验，采取群众性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每隔一定时期，对全体党员进行一次工作作风的整顿，特别着重检查群众路线的执行情况。[①]

关于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问题，邓小平在报告中着重指出，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根本组织原则，也是党的群众路线在党的生活中的应用。党是一个战斗的组织，没有集中统一的指挥，是不可能取得任何战斗胜利的，一切发展党内民主的措施都

①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23—224页。

不是为了削弱党的必需的集中，而是为了给它以强大的生气勃勃的基础。我们主张改进中央和地方、上级和下级之间的工作关系，是为了使中央和上级的领导更符合于实际，把注意力更集中于必须集中的工作，对于地方和下级更可以加强检查和指导。我们主张巩固集体领导，这并不是为了降低个人的作用，相反，个人的作用，只有通过集体，才能得到正确的发挥，而集体领导，也必须同个人负责相结合。没有个人分工负责，我们就不可能进行任何复杂的工作，就将陷入无人负责的灾难中。

邓小平在报告中总结中国共产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党内生活的经验，提出了反对个人崇拜，正确处理领袖和集体、个人和群众的关系问题。他指出："工人阶级政党的领袖，不是在群众之上，而是在群众之中，不是在党之上，而是在党之中。正因为这样，工人阶级政党的领袖，必须是密切联系群众的模范，必须是服从党的组织、遵守党的纪律的模范。对于领袖的爱护——本质上是表现对于党的利益、阶级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的爱护，而不是对于个人的神化。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一个重要的功绩，就是告诉我们，把个人神化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因此，"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真正巩固领导者同群众的联系，使党的民主原则和群众路线，在一切方面都得到贯彻执行。"①

关于党的团结和统一问题，邓小平在报告中指出，党的团结和统一是党的建设的最重要问题之一。我们党已经在国家工作和社会活动的各个方面，起着领导作用。巩固我们党的团结，维护我们党的统一，这不但是我们党的利益，也是全国人民的利益。

①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4—235页。

为了保持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和统一，为了及时地帮助同志克服缺点，纠正错误，必须大大发展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①]

最后，邓小平在报告中根据党执政后面临的新情况，提出了反对党员中特权思想的问题。他指出："中央认为，关于有任何功劳、任何职位的党员，都不允许例外地违反党章、违反法律、违反共产主义道德的规定，在今天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有一部分有功劳有职位的党员正是认为，他们的行为是不受约束的，这是他们的'特权'。并且有一部分党的组织，也正是默认了他们的这种想法。事实上，任何抱有这种想法或者支持这种想法的人，就是帮助党的敌人腐蚀我们的党。任何以'老爷'自居的人，都以为党是少不了他们的，事实上恰恰相反，我们党不但不需要，而且不允许有任何在遵守党员义务方面与众不同的老爷。""否则，他的骄傲和放肆，必然会把自己淹死。党决不能姑息这样的人，而脱离广大的群众。"[②]

邓小平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指出了党执政后面临的新考验，提醒全党警惕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要求全党坚持群众路线和民主集中制，健全各级党组织的集体领导，避免个人专断和个人决定重大问题。这些重要思想提出了在全面执政情况下加强党自身建设的主要方针，奠定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执政党建设的理论基础，在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至今仍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指导意义。

在中共八大上，邓小平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中

①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2—241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3—244页。



央委员会总书记，成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从此，邓小平进入党的最高领导层。这年他刚满52岁。1984年3月25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说："从一九五六年起我就当总书记。那时候我们中国挂七个人的像，我算是一个。"①

邓小平担任党的总书记，是经毛泽东推荐的。在1956年8月22日、9月8日和13日召开的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第一、第二、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两次向与会同志推荐邓小平当总书记。在8月22日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在讲话中说："为了国家的安全，为了工作的有利，中央准备设几层屏障，并设有总书记。中央政治局准备向新的中央委员会建议，推举邓小平同志当总书记。因为他已经是总书记了。秘书长是什么呢？按照英文的写法，就是总书记。但是在中国人的脑筋里头则不同，秘书长就是秘书长，总书记那是另外一回事。那好吧，我们就设一个总书记吧。"②

在9月13日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再次推荐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并对他作了高度评价。邓小平在讲话中表示："对总书记这个问题，中央讲了很久，我也多次提出，只有六个字：一不行，二不顺。当然，革命工作，决定了也没有办法，但我自己是诚惶诚恐的。"又说，"我还是比较安于担任秘书长这个职务。"③ 毛泽东接过邓小平的话说："他愿意当中国的秘书长，不愿意当外国的总书记。其实，外国的总书记就相当于中国的秘书长，中国的秘书长就相当于外国的总书记。他说不顺，

---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4页。

② 《中共八大文献连载》，《党的文献》2006年第5期。

③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310页。

我可以宣传宣传，大家如果都赞成，就顺了。我看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他跟我一样，不是没有缺点，但是比较公道。他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你说他样样事情都办得好呀？不是，他跟我一样，有许多事情办错了，也有的话说错了；但比较起来，他会办事。他比较周到，比较公道，是个厚道人，使人不那么怕。我今天给他宣传几句。他说他不行，我看行。顺不顺要看大家的舆论如何，我观察是比较顺的。不满意他的人也会有的，像有人不满意我一样。有些人是不满意我的，我是得罪过许多人的，今天这些人选我，是为了顾全大局。你说邓小平没有得罪过人？我不相信，但大体说来，这个人比较顾全大局，比较厚道，处理问题比较公正，他犯了错误对自己很严格。他说他有点诚惶诚恐，他是在党内经过斗争的。”[①]

毛泽东在考虑中央最高领导层人事安排时，就考虑到了接班人问题。他推荐邓小平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并担任总书记，本身就包含着培养接班人的意义。9 月 13 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谈到中央设副主席和总书记问题时说：“我们这些人，包括我一个，总司令一个，少奇同志半个（不包括恩来同志、陈云同志跟邓小平同志，他们是少壮派），就是做跑龙套工作的。我们不能登台演主角，没有那个资格了，只能维持维持，帮助帮助，起这么一个作用。”[②] 言语间包含着对邓小平的无限期望。

中共八大后，毛泽东赋予邓小平主持的中央书记处以重要责任。据李雪峰回忆：“小平同志做事一向谨慎，他后来告诉我们：在中央决定我做总书记时，我曾向毛主席提出，书记处还是作为

---

① 《毛泽东文集》第 7 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11—112 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 7 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11 页。

政治局的办事机构，专管党务，对军队和国务院的文件，仅负责承送。毛主席不同意，他强调书记处是中央委员会的办事机构，什么事都要管，中央的事都由你们去做，抓全面工作，发文用中央名义。”①

邓小平之所以能在中共八大成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不仅是因为他在民主革命时期建立的卓著功绩，更主要的是新中国成立后他在主政西南期间及到中央工作后所表现出的杰出的治国理政才能，是党和人民选择了邓小平，是历史选择了邓小平。中共八大选择邓小平进入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的形成准备了历史条件。

① 李雪峰：《我在小平同志领导下工作的二十四年》，见《回忆邓小平》（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21页。

第八章 初步探索

DI BA ZHANG

中共八大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辛探索。邓小平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积极、务实地参与了这一探索的全过程，并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正确认识和主张。

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领域，邓小平进行的探索及取得的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强调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搞建设。1956 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得以确立。为全面开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新时代，中共八大政治报告决议在正确分析面临的新形势、准确判断当时社会主要矛盾的基础上，作出了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的正确决策。决议指出："我们党现时的任务，就是要依靠已经获得解放和已经组织起来的几亿劳动人民，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充分利用一切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尽可能迅速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



义国家。”[①] 这就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

中共八大路线确立后，邓小平在多种场合反复强调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搞建设。1957 年 4 月 8 日，他在西安干部会上的报告中指出：“我们前一个阶段做的事情是干革命。从去年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时起，革命的任务也就基本上完成了。今后的任务是什么呢？革命的任务还有一部分，但是不多了。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搞建设。我们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任务，就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调动一切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而奋斗。这就是我们今后很长时期的任务。”[②]

二是对我们党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以及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等经济建设方针进行系统阐发和具体论述，促进了这些建设方针的贯彻和落实。

大规模经济建设开始后，党中央和毛泽东在总结我国经济建设实践，并在借鉴苏联经济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经济建设总方针，强调要正确处理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以农、轻、重为序发展国民经济，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坚持重工业和轻工业并举、工业和农业并举、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并举等“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同时强调要处理好国民经济中的重大关系，包括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等，做到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最大限度地调动各方面的建设积极性。

对于上述经济建设思想，邓小平结合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际，从多个角度进行了系统阐发和具体论述。1959 年 12 月 24

①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12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61 页。

日，邓小平在与朝鲜驻中国大使李永镐会谈时强调了发展农业的重要性。他指出，对于农业，我们有新提法，即以农业为基础。农业落后，工业就要受到拖累。农业发展，可以促进工业发展，食品、副食品、轻工业原料，都要靠农业。所以，农业是基础，始终要抓农业。[①] 1962年11月3日，他在会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尤素夫·阿齐多罗普时，又就农业对工业的基础性作用进行了论述。邓小平指出，以农业为基础并不是不要工业化，并不是不要重工业，相反，重工业要发展，但要为农业服务。重工业要有明确的方针，要发展服务于农业的重工业，同时也要发展服务于农业的轻工业。农业越过关，越发展，工业发展的基础就越雄厚、越可靠，社会主义的发展就越快，否则，各种矛盾就会产生。[②] 1963年11月22日，邓小平在会见阿尔巴尼亚新任驻中国大使奈斯蒂·纳赛时，又指出：农业稳了，工业也就稳了；农业不稳，工业就提心吊胆。[③]

关于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邓小平多次指出，中国是个大国，什么事都集中在中央是不行的，中央只要抓住关键，抓住纲，具体怎么做，下面会搞的。[④] 又说，中央和地方分权，对中央各部门来说，是一次解放运动。中央各部门可以从大量的、繁琐的事务中解放出来。只有把大量的日常事务下放到地方去，中央各部门才能够更多地接触实际、接触群众，才能够更好地从全局考虑问题，从而更多更好地指导和帮助地方。[⑤] 这些论述对于全党深刻认识农业的基础性地位，正确处理工业和农业、中央和

---

①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552页。
②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731页。
③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778—1779页。
④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422页。
⑤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421页。

地方的关系，从而在经济建设实践中自觉贯彻和落实这些方针，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在社会主义政治建设领域，邓小平进行的探索及取得的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就党的干部工作提出一系列重要观点和认识。第一，干部问题的核心是要选好干部。1961 年 1 月 5 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谈到干部选拔问题时指出，不要选只喜欢发号施令的干部。要选朴素勤恳，坚决贯彻政策，民主作风好，群众观念好，真正给群众做好事的人。1961 年 7 月 16 日，他在听取辽宁省汇报工业干部情况时又指出，选骨干，不能光看能说会道，要选踏踏实实、实事求是、老老实实工作的人。①

第二，培养选拔干部要重在表现。1961 年 7 月 16 日，邓小平在听取辽宁省汇报工业干部情况时指出，关于干部的政治条件，过去只从成分上了解是不妥当的，主要是看本人，看现在，技术干部主要看技术。1965 年 11 月 19 日，他在听取中共四川省委负责人汇报时又指出，在培养提拔青年干部问题上，讲出身，不符合党的干部路线。如果不重在表现，只讲出身，多数科室人员、技术人员都不行。现在的大学生中，有干部子弟，有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有无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干部子弟就一定比知识分子家庭的子弟好？不见得。因此，培养选拔青年干部，不重在表现不行。②

第三，对干部要全面评价。1962 年 2 月 6 日，邓小平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干部好坏长短应从他长期工作中去鉴别，而不能只从某一运动或某一短时期的表现去鉴别。同年 2 月

①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610、1650 页。
②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650、1882 页。

12日，他又在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干部问题时指出，这几年我们有一个缺点，评价干部，往往只看一段时间。对干部要全面评价。[①]

第四，干部要能上能下。1962年11月22日，邓小平在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谈到干部问题时说，基层干部，当两年，要换一下，改选一下。一个支部书记能连选连任几次，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要能上能下，能领导，也能受人领导。能当支部书记，又能当农民，参加劳动。不能让他形成一个独立的势力，很多变质的就是这个道理。抗日战争时期，我就提出过这个问题。也要相应地考虑其他的基层组织，如工矿企业的基层组织等。总之，要能上能下。同年11月29日，他在接见参加组织工作会议和全国监察工作会议与会人员的讲话中指出，多年来，我们对干部是包下来，能上不能下。现在看，副作用很大，已经成为我们工作中的障碍。唯一的出路是要能下，可以先从基层试验做起。要逐步从制度上、习惯上、风气上做到干部职务能上能下。1965年11月22日，他在一次谈话中再次指出：干部要能上能下，使多一些人取得领导经验。一个人当权久了，意识形态也会发生变化。[②]

上述论述，是邓小平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党的干部工作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在社会主义政治建设领域进行探索取得的理论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加强党的干部工作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二是就如何对待群众闹事问题提出一系列重要观点和认识。由于复杂的国内外形势，1956年下半年我国出现了一些不安定情

①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689—1690、1691页。
②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733、1735、1883页。

况。少数学生、工人和复转军人在升学、就业和安置等方面遇到不少困难，发生少数人闹事的问题，在农村也接连发生农民闹退社的风潮。中共八大后，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处在中央领导工作第一线，直接面对大量的社会矛盾和问题。他创造性地运用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对待群众闹事问题，并提出下列观点和主张：

第一，要正确对待群众闹事问题。1957 年 2 月 18 日，他在接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各省、市委书记时指出，社会生活总会有矛盾，有矛盾就要调整。人有“气”总要出。出的方法有两种：一种叫集中出，一种叫分散出。小出“气”了，就不大出“气”了；有“小闹事”，就没有“大闹事”了；有“小民主”，就不“大民主”了。这个道理全党都要想通。他还在 1957 年 2 月 26 日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援引毛泽东的话说，少数工人请愿、罢工是正常现象，要承认是合法行为，是调节社会生活，调节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①]

第二，群众闹事的原因大体是由于党员干部官僚主义严重。1957 年 3 月 18 日，他在一次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群众闹事大体上是由于党的领导薄弱，我们的党员、干部官僚主义严重，对群众正当的要求不闻不问，应该解决又可能解决的问题，也不去解决。一时不能解决的问题，也不向群众解释，使群众了解真相。因此，群众一肚子气，就闹起来了。因此，党员应该站在群众方面反对官僚主义。[②]

第三，避免群众闹事的根本办法是加强教育，扩大民主。他说，加强教育，主要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没有经常的思想政治

①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346、1347 页。

②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351—1352、1348 页。

工作，群众闹事就不可避免。扩大民主，主要是指经常的民主生活。要避免群众闹事这种“大民主”，就必须搞好经常的民主生活这种“小民主”。没有“小民主”，一定发生“大民主”。此起彼伏地做好工作，可以避免大规模的爆发。[①] 他还指出，人民内部的事情要用人民内部的解决方法来对付，不要用对敌斗争的方法。在人民内部主要是用教育的方法，特别是对青年。纠正群众的错误，也只有用群众自我教育的方法，自己讨论的方法。[②]

另外，邓小平还指出，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比阶级斗争更复杂，如果继续用阶级斗争的方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非犯错误不可。相反，用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办法来进行阶级斗争，这样有利于分化敌人、进行改造。[③]

三是提出共产党要接受监督的重要主张。任何一个政党如果不受监督，独断专行，那就非犯错误不可，中国共产党也不例外。正是从防止共产党犯错误出发，邓小平提出了共产党要接受监督，特别是要接受民主党派监督的重要主张。1957 年 3 月 18 日，他在一次报告中指出：每个共产党员、高级干部都应该了解，没有监督不得了，独断专行非犯错误不可。监督有三个方面，党内监督，人民监督，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监督、科学家的监督，这也属于人民群众监督的一部分。我们必须邀请别人监督。从各个角度考虑问题，总比从一个角度考虑问题有好处。所以“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好得很。[④] 同年 4 月 5 日，邓小平在甘肃省、兰州市干部会议上，针对党内多数同志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不理解、想不通、不大赞成的情况，指

①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352、1347—1348 页。
②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346 页。
③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354、1553 页。
④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352 页。

出，这很危险。没有民主党派的监督，没有人民的监督，共产党单独处理问题，总是要出毛病的。① 1957 年 4 月 8 日，他在西安干部会议上所作报告中，又对共产党要接受监督以避免犯错误的问题进行了着重阐述。他指出：党要受监督，党员要受监督。我们党是执政的党，威信很高。我们大量的干部居于领导地位。在中国来说，谁有资格犯大错误？就是中国共产党。犯了错误影响也最大。因此，我们应该特别警惕。他重申，所谓监督，来自三个方面。第一，是党的监督。对共产党员来说，党的监督是最直接的。第二，是群众监督。要扩大群众对党的监督，对党员的监督。第三，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监督。有了这几个方面的监督，我们就会谨慎一些，我们的消息就会灵通一些，我们的脑子就不会僵死起来，看问题就会少一些片面性。一怕党，二怕群众，三怕民主党派，总是好一些。②

这些重要讲话从防止共产党犯错误出发，提出了共产党要接受民主党派监督的正确主张，对加强党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领域，邓小平进行的探索及取得的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对我们党的文化建设方针进行了深刻阐释和创造性运用。对于“双百”方针，邓小平主要从防止思想僵死出发，深刻揭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对发展我们国家、我们党以及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政治意义。1957 年 4 月 5 日，他在甘肃省、兰州市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谈到“双百”方针时指出：世界上的事物是变化多端的，社会是越发展越复杂，没有“百花齐放、百

---

①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354 页。

②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355—1356 页。

家争鸣”，我们的思想就会简单化，就跟不上世事、社会的发展变化，我们的党就会衰退。[①] 同年4月8日，他在西安干部会上所做的报告中再次指出，各党派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和思想上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十六个字的方针对我们国家有深远的影响，对我们党有极大的好处，对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很大的好处。如果我们不注意，不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思想要僵死起来，马克思主义要衰退，只有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各种意见表达出来，进行争辩，才能真正发展马克思主义，发展辩证唯物主义。[②] 1957年7月12日，邓小平在《关于当前整风情况和今后工作的意见》的报告中，结合整风运动，就“双百”方针对于思想交锋、发展真理的政治意义作了进一步论述。他指出：运动的性质总的来说是“灭资兴无”。“灭资兴无”有两种方法。一种方法是把思想垄断起来，不允许资产阶级思想出笼，只允许无产阶级思想一花独放。这种方法只会把思想搞僵化，并在政治上带来严重的后果。另一种方法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种方法能够经过争辩做到明辨是非，使真理在与谬论的斗争中发展起来。[③]

对于“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正确方针，邓小平同样有创造性的发挥和运用。1966年2月26日，他在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谈到学习与独创时说：我们一定要有独创精神，要闯出自己的道路。有些必须由我们独创。但是，还要学习外国的成果，学习前人的成果，学习先进企业、先进人物的成果。凡是一切好的东西，能学到的都要学。在科学技术上，有好

①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354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2页。
③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380页。

多东西，帝国主义、修正主义还走在我们前面。“帝”字、“修”字不能用，但科学技术拿来还是有用的。[①]

二是提出党要信任和关心知识分子，重视科学研究工作等正确主张。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大规模展开，知识分子和科学技术的作用日显重要。为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大力发展科技文化事业，邓小平提出以下观点和认识：

第一，党要信任和关心知识分子，要为科研工作创造有利条件。邓小平在几次讲话中反复强调，科学技术叫生产力，科技人员就是劳动者！对于知识分子，一般来说，只要赞成党领导就行了。搞科学研究对国家有贡献就是红。真正有创造，有利国家，还能是白？党对科研工作的领导，就是要创造一个生动活泼、人心舒畅的局面，一个出科学成果的局面。党的领导干部要和知识分子交朋友，关心帮助他们；就是要老老实实当好勤务员，为科学家服务，替他们解决困难。要给有培养前途的科技人员创造条件，关心他们，支持他们。[②]

第二，科研要和生产相结合。1958 年 10 月，邓小平在天津大学谈到学习、生产和研究之间的关系时说：三个东西互相联系、互相促进，学习生产促进研究，研究反过来促进生产。[③] 1962 年 7 月，他在听取国防工业问题汇报时指出：生产部门要有研究力量。科研要有重点，有一定的力量搞探索性的研究，同时也要解决生产中的问题。[④] 1964 年 1 月 6 日，他在主持召开的中

①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897 页。

② 参见《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05 页；《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645、1647 页。

③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460 页。

④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716 页。

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谈到试办托拉斯问题时又指出：托拉斯一定要和科学试验结合起来，每一个联合公司都要搞科学研究。科学研究同生产相结合，才是最快的方法，资本家搞竞争，靠的就是这一手。[①]

第三，要尊重科研工作规律。1959年12月11日，邓小平在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指出：科学研究，取得成果越快越好，但要准备失败，失败多次，花点冤枉钱。不要前怕狼后怕虎。一旦成功了，就可以带动一批科学技术前进。[②] 1961年1月25日，他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谈到科学院工作时说：搞研究的人，要给他们时间。集体研究还要以个人为基础。[③] 1962年7月13日，他在听取国防工业问题汇报时又指出：科学家就是要专心钻研，宁可让他单干，带几个徒弟，主要让他在技术上点头，组织工作不要他做，不要干涉他的工作，不要浪费他的时间。[④]

以上观点是邓小平在总结党的知识分子工作和科技文化工作得出的经验升华和理论认识，对于完善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发展我国科技文化事业，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①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788页。
②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521页。
③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616页。
④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716页。

第九章 整风反右

DI JIU ZHANG

在 1957 年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中，邓小平作为党的总书记参与领导和组织了这一运动的全过程。邓小平同当时党中央主要领导人毛泽东一样，对思想政治领域和反右派斗争的形势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但另一方面，邓小平又一再强调运动不能采取简单粗暴的做法，打击面不能太宽，对应该打击的对象也要按照不同情况区别对待等。

针对党执政后部分党员干部思想作风中出现的新问题，中国共产党在 1957 年开展了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的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这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常步骤。但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扭转社会主义方向，致使运动后期由党内整风转向反击右派。在这场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中，邓小平作为党的总书记参与领导和组织了这一运动的全过程。

全党整风实际上是中共八大提出来的。1956 年 9 月 15 日，

毛泽东在中共八大开幕词中指出："在我们的许多同志中间，仍然存在着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作风，这就是：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工作上的官僚主义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这些观点和作风都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是不利于党内和党外的团结的，是阻碍我们事业进步、阻碍我们同志进步的。必须用加强党内的思想教育的方法，大力克服我们队伍中的这些严重的缺点。"[①] 这就在实际上提出了全党整风的任务。

同年 11 月 15 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郑重宣布："我们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②] 这次讲话明确了整风的时间和内容。

1957 年 3 月 12 日，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谈到整风问题时说，共产党正在准备整风。中央作出决定，准备今年就开始，先搞试验，明年比较普遍地进行。党外人士自愿参加。整风的目的，就是要批评几个东西：一个叫主观主义，主要是教条主义；第二是宗派主义；还有一个是官僚主义。现在的情况是官僚主义相当严重。整风不用大民主，用小民主，在小组会上，是小小民主。要和风细雨，治病救人，反对一棍子打死的办法。[③] 毛泽东在这次讲话中重申了整风内容，明确了整风方式和时间部署。

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传达后，引起党内党外的热烈讨论。大家在讨论中对党的作风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不少批评意见，党外人士要求共产党转变思想、转变作风的呼声日益

① 《毛泽东文集》第 7 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16 页。
② 《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612—613 页。
③ 《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637 页。

高涨。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泽东决定提前发动全党整风。对此，他在4月30日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二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作了说明。毛泽东说："几年来都想整风，但找不到机会，现在找到了。凡是涉及到许多人的事情，不搞运动，搞不起来。需要造成空气，没有一种空气是不行的。现在已造成批评的空气，这种空气应继续下去。这时提整风比较自然。"①

在整风运动的酝酿过程中，邓小平于1957年3、4月间视察了太原、兰州、西安三个城市的建设工作，就党的领导、人民内部矛盾和群众监督等问题发表一系列讲话，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

3月18日，他在山西省直机关干部和太原市机关干部、厂矿企业负责人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谈到党的领导问题时指出：党的领导的好坏，关键在于能否依靠群众，能否不断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克服我们队伍中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如果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看不起群众，遇事不同群众商量，不同非党人士商量，天天看领导的脸色，将来一定要栽大跟头。②

4月5日，他在甘肃省、兰州市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谈到党的领导时指出：近年来，在我们共产党员中，包括部分高级干部，对"群众"两字模糊了，或者看不见了，与群众的联系少了。过去我们为什么能打胜仗，就是靠不脱离群众，现在忘记这一点，是非常危险的，是致命伤。不要以为我们共产党是金字招牌，如果脱离群众，党的威信是靠不住的。脱离了群众，任何英雄也办不成事情。共产党员要与群众同甘共苦，这是我们的老章程。在谈到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时指出：去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

① 《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671页。

②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351页。

成了，阶级斗争、阶级矛盾基本解决了，人民内部矛盾变得突出了。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比阶级斗争更复杂，如果继续用阶级斗争的方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非犯错误不可。[①]

4月8日，他在西安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谈到干部的思想情况和工作作风时指出：几年来，党内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比过去是多了，不是更少了；脱离群众的现象比过去是多了，不是更少了；一些不健康的思想和作风比过去是更厉害了，不是更少了。其表现是骄傲自满、摆老资格、滥用党的威信、说假话、闹地位、闹享受等等。这些现象，值得全党严重注意。我们的党组织和党员，特别是领导同志，必须保持党的优良传统，依靠群众，相信群众，经常接近群众，了解群众的要求、思想和感情，把握群众脉搏的跳动，同群众同甘共苦。在谈到共产党要接受监督时指出：宪法上规定了党的领导，党要领导得好，就要不断地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就要受监督，就要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如果我们不受监督，不注意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就一定要脱离群众，犯大错误。因为我们如果关起门来办事，凭老资格，自以为这样就够了，对群众、对党外人士的意见不虚心去听，就很容易使自己闭塞起来，考虑问题产生片面性，这样非犯错误不可。[②] 这些重要讲话为整风运动进行了政治动员，做好了思想准备。

1957年4月25日，邓小平在审改彭真批送的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初稿）》时加写："党员个人则应检查自己的思想和作风"、"检查不从团结全国各民族出发的大民族主义"、

①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353—1354页。

②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355页；《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0页。

“并且采取积极态度去帮助犯错误的人改正错误”等内容。把“检查对于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执行情况”一句改写为：“检查对于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执行情况”,[①] 突出了监督的重要性。4月27日，邓小平出席陈云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原则通过《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4月29日，邓小平参加毛泽东召集的会议，讨论整风运动有关问题。4月30日，又出席毛泽东主持的最高国务会议（扩大），讨论整风运动问题。会上，毛泽东指定由邓小平负责找党外人士和民盟、九三学社等开座谈会，对有职有权和学校党委制的问题征求意见。[②] 5月1日，《人民日报》全文刊载《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此后，全党整风运动开始了。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是真心想通过这次整风解决党内在思想和作风上存在的突出问题，而在毛泽东看来，广泛征求党外人士的意见，对这次整风能否取得成效关系很大。他认为“没有社会压力，整风不易收效”。[③] 为此，毛泽东于5月4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指示》。这以后，全党整风进入集中征求党外人士意见阶段。党外人士积极帮助共产党整风，各种意见在不同场合都提了出来。党也衷心欢迎党外人士和党员群众的善意批评和建议。

5月16日，邓小平起草中共中央《关于报道党外人士对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的指示》。《指示》稿指出：最近各地党外人士正在开展对于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这是很好的现象，这不

---

①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358页。
②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359—1360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6页。

但会大大帮助我党的整风，消除党同党外人士的隔阂，而且可以在群众中暴露右派分子的面貌。[1] 5 月 18 日，他在审改《人民日报》社论稿《继续争鸣，结合整风》时，在“在这些日子里，党外人士对于我们的党和国家工作的批评，不管如何尖锐，基本上是诚恳的”一句后加写：“绝大多数意见是正确的、有益处的。只要各部门、各地方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同志，善于接受一切有益的批评，认真研究各方面所提的意见，切实纠正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就一定可以达到拆除党内外之间的深沟高墙、加强人民内部团结和大大改进工作的目的。近来，有的地方开始这样做了，已经发生良好的效果。”[2] 5 月 23 日、27 日，邓小平在两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中指出：目前开展的党外人士批评运动，实际上就是党内整风运动的开始，是运动的第一阶段的重要部分，凡是放得开的地方，已经产生了好的效果。首先，运动暴露了党和政府工作中大量的毛病，暴露了党的组织和党员在思想作风和工作方法上的严重的错误和缺点，就是所谓三大主义。中央估计，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意见是诚恳的，是有益处的，是好的、对的，是击中要害的。这些意见对我们整风有很大的帮助，对我们改进工作、联系群众有很大的帮助。所以，我们必须严肃地对待党外人士的批评，虚心地听取他们的批评。他们指出的凡是对的，我们应该认真地改正。[3] 这些都表明，中共中央和邓小平对待党外人士的批评意见是严肃认真的，态度是积极诚恳的。

中国共产党本来是诚心诚意地欢迎党外人士帮助我们整风，真心听取他们对我们党缺点错误的批评意见，但不料有极少数资

---

①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363 页。

②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365 页。

③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367 页。

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发动进攻，掀起了一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潮，抛出了一系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错误言论。比如，他们把共产党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领导地位攻击为“党天下”，说什么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都要安排一个党员作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党这样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他们公然反对共产党执政，鼓吹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轮流执政”（又叫“轮流坐庄”），说什么“一党执政有害处”，“如果不要共产党一党执政，而要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通过竞选来轮流执政，由各党各派提出不同的政纲来，由群众自由地选择，这就好得多”。他们肆意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说什么“现在政治黑暗，道德败坏，各机关都是官僚机构，比国民党还坏。人民生活降低，处于半饥饿状态”，“根本的办法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请共产党下台”，“中共组织退出机关、学校”。他们全盘否定我们党进行的历次政治运动，说什么“过去几个大运动，都是共产党整人”，“肃反是对人类道德的进攻，对人类心灵的摧残”。他们还把矛头直指党中央、毛主席，说什么“三害”（指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应向党中央和毛主席那里挖”，“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现在学生上街，市民跟上去”，“形势非常严重”，“已经天下大乱了，毛主席他们混不下去了，该下台了”等等。[①] 邓小平后来多次说过，

---

① 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430—431 页。

"那时候有的人确实杀气腾腾"。[1] 时隔50多年，现在回过头去再来看这些言论，仍能感受到当时那种"杀气腾腾"的气氛。

为了在全国人民中间澄清根本的大是大非，维护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教育广大党员和人民，中共中央决定对极少数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实行坚决反击。这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如果放弃这种斗争，不在问题发生的范围内鲜明地击退极少数右派分子的进攻，就会造成思想上和政治上的严重混乱。"[2]

从5月中旬到6月初，中共中央就反击右派斗争的策略接连发出指示。5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邓小平起草的《关于报道党外人士对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的指示》。《指示》要求"对于党外人士的错误的批评，特别是对右倾分子的言论，目前不要反驳，以便使他们畅所欲言。我们各地的报纸应该继续充分报道党外人士的言论，特别是对于右倾分子、反共分子的言论，必须原样地、不加粉饰地报道出来，使群众明了他们的面目，这对于教育群众、教育中间分子，有很大的好处"。《指示》还指出：近来许多党报加以删节，是不妥当的，这实际上是帮助了右倾分子，并且使人感到是我们惧怕这些言论。这种现象，请你们立即加以纠正。[3] 5月1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这个指示在肯定党外批评意见主流的同时，对如何对待右翼言论作了部署。6月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这份指示对反击右派作出进一步的分析和安排。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和部署下，"一场全国规模的群众性的急风暴雨式的反右派运动

---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4页。

②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1949—1978）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456页。

③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10—1966.5）》第25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42页；《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363页。

猛烈地开展起来了”。[①]

反右派斗争开展起来后，邓小平多次作关于整风反右问题的报告，阐述反右派斗争的必要性，对反右派斗争进行指导。7月4日，他在有在京中共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解放军各大单位和北京市及各高等学校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上作关于整风反右问题的报告。在强调反右派斗争的必要性时，邓小平指出：这次反右斗争比以往任何一次政治思想改造运动都深刻得多，是一场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资产阶级思想反映到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甚至反映到党内来，应当引起重视。右派的思想言论还有市场，特别是在青年学生中市场更大。因此，反右斗争必须继续深入。通过这个斗争，可以教育党团员和人民群众。在谈到反右派的方法时，他指出：不应采取简单口号的办法，而应说理，因为这是思想意识形态的斗争，要在这方面取得大的收获，就得花费一定的时间。[②]

7月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电话会议上作关于整风反右问题的报告。在谈到对前一阶段的整风反右运动的估计时，他指出：现在运动开始走向深入，已经收到很大效果。群众起来了，中间分子逐步向我们靠拢，右派分子逐步孤立。在谈到如何开展下一阶段整风反右运动时指出：现在要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对右派要狠，来不得温情主义；另一方面必须充分揭露事实，坚持说理原则，防止简单粗暴的方法。所谓“狠”，就是要有充分的论点和事实。用简单粗暴的方法达不到这个目的。反对温情主义同反对粗暴是一致的，“狠”同说理的原则是一致的。他还指出：前一时期，我

① 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46页。

②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376—1377页。

们集中力量对左派、中间分子做工作，现在对右派也要做工作，要向右派指明出路。对右派斗争的方式要以小型会议为主。采用群众大会的方式，容易简单化。要坚持说理，越是说理越有利。[①]

从以上报告可以看出，邓小平同当时党中央主要领导人毛泽东一样，对思想政治领域和反右派斗争的形势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但另一方面，邓小平又一再强调运动不能采取简单粗暴的做法，打击面不能太宽，对应该打击的对象也要按照不同情况区别对待等。

7月12日，邓小平在有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副部以上干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参加的会议上作《关于当前整风情况和今后工作的意见》的报告。在谈到对右派的处理问题时指出：对右派分子点名要慎重，不要忙于做组织结论，组织处理过早坏处很多。在谈到改进工作问题时指出：右派分子的很多意见虽然是错误的，但大多数人的意见是针对我们的缺点提出来的。对他们提出来的缺点，我们要认真改正，不能搪塞了事，马马虎虎。只有我们认真改正缺点，才有利于争取中间分子。以后要人家提意见，人家才敢提。[②]

8月23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反右派斗争等问题。在讲话中指出：对有些科学家，特别是有建树的真正的自然科学家，有科学水平的，只要不搞政治活动，中央确定采取不斗、讲清楚的办法。[③]

9月1日，邓小平在审改中共中央《关于严肃对待党内右派分子问题的指示》稿时加写：“在运动中，对于一个党员应否划

①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378—1379页。
②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380页。
③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386页。

为右派分子，应该同党外人士应否划为右派分子一样，采取非常慎重的态度，对于党龄较老的党员尤其应该如此”等内容。①

9 月 2 日，邓小平在审阅周恩来批送的中共中央《关于自然科学方面反右派斗争的指示》稿时，在原稿谈到对于自然科学界方面的反右派斗争“应当按照不同的情况，区别对待”句后加写：“特别是对于那些有重大成就的科学家和技术工作人员，除个别情节严重非斗不可者外，应一律采取坚决保护过关的方针。”②

9 月 19 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整风反右运动中的有关问题。在讲话中指出：右派中凡有真才实学的都继续用。我们赞成他搞科学，只反对他反社会主义。他们完全可以改变，为社会主义服务。③

9 月 23 日，邓小平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作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在谈到反右派斗争问题时指出：我们应该把反右派斗争进行到底，但是要防止打击面过宽和简单粗暴的危险；要注意严格掌握划分极右分子、右派分子和中右分子的界限，对划分不当的必须随时纠正；要十分注意团结中间派的工作，并且注意促进右派分子的分化，帮助其中已有悔改表现的人逐步改造。在谈到改进工作与反右派斗争的关系时指出：为了教育广大群众，特别是解除中间分子的顾虑，反右派斗争本身也必须特别注意坚持说理、摆事实、以理服人的原则，防止简单粗暴，竭力避免夸大和片面性；对于中间分子和工人、农民的错误观点，要采取耐心说服教育的方法；对于学术上的争论，尤其要反对轻率和武断。对

---

①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387 页。

②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388 页。

③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392 页。

于右派分子的处理也要恰当。必须使反右派斗争的结果有利于而不是不利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贯彻执行，有利于而不是不利于培养人民群众敢讲话的风气。[①]

10月9日，邓小平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闭幕会上谈到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时指出：主要精神是把右派的范围限于社会主义革命高潮以后，重点是大鸣大放时期，限于反对社会主义和反对共产党，而把一般历史上的老账、个别问题的意见和学术性问题撇开。右派分子的处理，原则上应该是严肃与宽大相结合，政治思想上要斗透，处理则不宜过分。对中右分子也应该团结、教育、改造。[②] 上述讲话，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

尽管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试图把政治打击的范围尽量缩小到极右派，加大争取中间派的力度，但由于党对当时整个阶级斗争的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反右派斗争出现了严重扩大化。7、8、9三个月，全国划成右派分子的人数迅速上升。至10月上旬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召开时，全国已划右派分子达到6万多人。至1958年整个运动结束时，共有55万人被划为右派分子。

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造成不幸的后果。一大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使他们和家属长期遭受委屈和打击，不能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全国55万余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半数以上失去了公职，相当多数被送劳动教养或监督劳动，有些人流离失所，家破人亡。少数在原单位留用的，也大多用非所长。这不仅是他们本人的不

---

①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393—1394页。

②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395—1396页。

幸，也是国家、民族的不幸。[①]

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需要具体分析；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教训是深刻的，需要认真总结。

第一，党对阶级斗争和右派进攻的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

事实证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确实没有随着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而自然结束，否定和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思潮依然存在。但怎样处理和领导好这个领域的斗争，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党和毛泽东在这方面都还缺乏经验。另一方面，当时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的敌对势力也确实存在，不过这些人在国内毕竟是极少数，同这种敌对势力的斗争本该在问题发生的范围内进行。但在整风运动的发展过程中，党对阶级斗争的形势作了过于严重的判断，对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进攻的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把本应在一定范围内进行的斗争，扩展成一场全党和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思想战争和政治战争，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在这方面，邓小平同当时党中央主要领导人毛泽东一样，对反右派斗争的形势估计过于严重了。1980 年 2 月 29 日，邓小平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中说："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我们是积极分子，反右派扩大化我就有责任，我是总书记呀。"[②]

第二，不该用群众性政治运动的方法进行反右派斗争。

对这一点，当年在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即有人提出反右派斗争是必要的，但搞群众运动没有

①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839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77 页。

必要。事实证明，用搞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方式进行政治斗争，历来是弊多利少。因为群众运动一旦起来就很难用条条框框来约束它，简单、粗暴、过火的现象也就不可避免。由于我们党长期处于群众性阶级斗争环境中，习惯于用群众运动的方式进行政治斗争。当极少数右派分子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恶毒进攻时，我们党还是走上了发动群众运动的熟路。如果当时不是发动一场全国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而是在一定范围内对右派分子的进攻进行反击，本该是可以制止事态蔓延发展的。

第三，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划分右派分子标准的通知》没有得到贯彻执行。

1957 年 10 月 15 日，为避免各单位在划分右派分子时有畸轻畸重的情况，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划分右派分子标准的通知》，规定了应划和不应划右派分子的统一标准。在中央制定的标准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错误应予批评纠正，但不应划为右派分子：（1）在根本立场上并不反对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而只是对于局部性的工作制度，局部性的不属于根本原则的政策，工作中的问题，学术性的问题，共产党的个别组织，个别工作人员表示不满，提出批评的人，即使意见错误，措词尖锐，也不应划为右派分子；同样，在根本立场上并不反对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而只是在思想意识上有某些错误的人，也不应划为右派分子。（2）有过类似右派的思想，但是并未发表过或散布过，而且已经认为错误、自动检讨出来的人，或者偶然讲过类似右派的话，现在已经承认错误，而在历史上一贯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不应划为右派分子。（3）对于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制度或共产党的领导发表了错误的言论，但是并未积极宣传，事实证明不是出于敌意，经过指正表示愿意转变的人，不应划为右派分子。（4）一度



盲目地附和了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或者一度被蒙蔽参加了右派小集团，或者一度被右派利用，在了解右派错误以后，迅速地站在正确立场，同右派决裂的人，不应划为右派分子。(5) 历史上曾经站在反动立场，现在也没有显著的转变，但是在右派进攻时期并未进行反动活动的人，不应划为右派分子。(6) 凡是界乎右派分子和中右分子之间的疑似分子，在尚未查出足以确定为右派分子的充分材料之前，一概不划为右派分子，并且不用斗争右派分子的方法来对待他们。

《通知》还指出，为了正确地划分右派分子，达到既不多划又不少划的目的，除了要有适当的标准，还要有适当的审查批准手续。凡是各单位确定为右派分子的名单，必须报告县一级或县一级以上的党的领导机关审查批准。高级知识分子、重要民主人士中的右派分子和其他有特殊情况的右派分子的名单，必须报告省一级或省一级以上的党的领导机关审查批准。上级领导机关除必须认真地审查所属单位上报的右派分子的名单外，还必须教育党员和群众十分重视对于实际情况的认真研究和具体分析，力戒浮夸和片面性。同时，还必须经常主动地细心地抽查和调阅所属单位右派分子的详细材料，及时纠正其中偏宽偏严的错误，并且对于极右分子、一般右派分子和中右分子的界限举出具体的人物和材料作为实例，切实帮助下级掌握正确划分的标准。①

从中央制定的标准及通知精神可以看出，在应划和不应划右派分子问题上，中央的标准是具体的，界限是明确的，掌握是严格的。如果按照这个标准和通知精神去执行，就不会出现扩大化的问题，至少不会那样严重。但由于反右派斗争是一场急风暴雨

①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41—545页。

式的群众运动，其总的指导思想是反对温情主义，强调深挖猛打，号召把反右派斗争进行到底。在这种形势下，中央制定的标准及发出的通知所起的作用也只能是有限的。通知虽然明确了6种不应划为右派分子的情形，但实际上很多属于这6种情形的人也都被划成了右派分子。中央通知规定此件可发至县委和相当于县级的党组织，但事实上当时并没有下发到指定的级别和范围。

对于1957年反右派斗争，邓小平后来多次强调是必要的，问题在于扩大化。这个评价是正确的，也是实事求是的。1979年9月1日，他在听取第十四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情况汇报时插话说："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在当时条件下是必要的，但有扩大化，特别是在后期。说改正百分之九十几，不准确，其中有一部分是党的宽大处理。当时有些人是杀气腾腾，包括党内有些人言论很恶劣。"[①]

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是必要的，没有错。同志们可以回想一下，一九五七年的问题是个什么问题呢？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七年，我们用八年时间基本上完成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入社会主义。这个时候出来一股思潮，它的核心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有些人是杀气腾腾的啊！当时不反击这种思潮是不行的。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是随着运动的发展，扩大化了，打击面宽了，打击的分量也太重。大批的人确实处理得不适当，太重，他们多年受了委屈，不能为人民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这不但是他们个人的损失，也是整个国家的损失。所以，给右派分子全部摘掉帽子，改正对其中

① 《邓小平论统一战线》，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161页。

大多数人的处理，并给他们分配适当的工作，就是一件很必要的、重大的政治措施。但是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一九五七年不存在反对社会主义的思潮，或者对这种思潮不应该反击。总之，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本身没有错，问题是扩大化了。”① 同年 3 月 19 日，他在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再次指出：“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还是要肯定。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确实有一股势力、一股思潮是反社会主义的，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反击这股思潮是必要的。我多次说过，那时候有的人确实杀气腾腾，想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扭转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错误在于扩大化。”②

1981 年 3 月 27 日，邓小平在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我多次讲过，那个时候确实有人杀气腾腾，但是我们处理得过了，扩大化了。当然，不能把当时所有被批判的人都说成什么问题、什么错误都没有。我看对反右派斗争，还是两句话：一句是必要的，一句是扩大化了。”③ 同年 7 月 17 日，他在同中共中央宣传部门负责同志谈话时再次指出：“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是扩大化了，扩大化是错误的，但当时反右派的确有必要。”④ 事实证明，这些论断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

①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43—244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94 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80 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90 页。

第十章 DI SHI ZHANG "大跃进"中

"大跃进"运动发动后，邓小平对运动的理解和认识经历了一个复杂渐进的变化过程。他在积极贯彻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同时，也在不断思考和探索"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具体做法，并在思考和探索的过程中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思想观点。后来，在总结"大跃进"这段历史时，邓小平对自己的责任从不讳言，更未否认。相反，他多次提到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

从 1958 年到 1960 年的三年"大跃进"，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一场以不断地、大幅度地提高和修改计划指标，片面地追求工农业生产和建设的高速度为主要特征的群众运动。在这场给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很大破坏的运动中，作为党的总书记的邓小平，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理解和认识经历了一个复杂渐进的变化过程，并在后期的纠"左"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毛泽东发动"大跃进"是从反对反冒进开始的。他在 1957 年九十月间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拉开了批评反冒

进的序幕。在这次讲话中，毛泽东批评1956年的反冒进是“右倾”，“扫掉了多、快、好、省”，“还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还扫掉了促进委员会”，提出要加快发展速度。这次讲话以及一个月后“大跃进”和“超过英国”口号的出台，拉开了“大跃进”的序幕。在1958年1月召开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再次严厉地批评1956年的反冒进泄了六亿人民的气，是方针性错误，并用带有警告的语气说：“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①] 南宁会议加速了“大跃进”的发动，有些地区和部门由于受批评反冒进氛围的影响，开始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大跃进”计划。在同年3月召开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把对反冒进的批评提到一个更高的层次，说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从而在发动“大跃进”的道路上又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1958年5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会后，“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范围内推向高潮。

邓小平在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运动时表现出很大的热情，紧密配合毛泽东的部署。1958年2月13日，他在四川省、地、县、社四级干部会上的讲话中谈到建设速度问题时指出：在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有两种方法的斗争。一种是搞得快一些，一种是搞得慢一些。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方法，就是根据客观可能的条件，加快建设。搞建设也要有革命家的态度，要积极创造条件搞快点。只要是可能的，只要不是主观主义的就应该快。这是我们的正确态度。[②] 同年3月25日，邓小平在成都会议上就反冒进问题发言说：反冒进是不好的，挫伤了群众和干部的积极性。我对

① 《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769页。
②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415页。

于这场斗争，在一个短期之内是有过模糊认识的，没有意识到党内有什么两条路线的不同，在某些问题上和一些同志有共同的看法，也曾设想过基本建设和某些事情是不是慢一点好，是不是谨慎一点好。[1] 由上可以看出，邓小平同毛泽东关于加快经济建设速度的领导方法是保持一致的。

1958 年 8 月 17 日至 30 日，邓小平出席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通称为北戴河会议）。会议通过《关于一九五九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问题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等文件。会后，全国很快形成了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浪潮。

北戴河会议后，邓小平密集地到各地视察工作，目的是宣传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号召各地为完成党中央提出的战略任务而努力奋斗。1958 年 9 月中下旬，他到东北视察；10 月上中旬，他先后到天津市、河北省视察工作；10 月下旬到 11 月初，他又到广西、云南、四川、贵州等地视察工作。在视察过程中，邓小平发表了许多讲话，对各地“大跃进”工作进行具体指导。

关于“大跃进”的指导思想，邓小平强调要解放思想、敢想敢干。9 月 24 日，他在视察鞍山钢铁厂时指出：社会主义大家都在搞，但是怎样搞，还有个方法问题，是多快好省呢，还是少慢差费。搞什么都要有个攻击目标，应该定出哪一项东西能赶上哪一国，哪一项东西哪国好就超过哪一国。要选择尖端作为攻击目标。别人没有的，我们可以有；别人不好的，我们可以好；别人办不到的，我们要能办到；别人的目标，我们可以超过。要把这一点作为主导思想，作为各级领导人的主导思想。在谈到挖掘潜

①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421 页。

力增加生产时指出：潜力有两种，一种是改革规章制度，改进作风，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一种是改进技术，产生新的推动力量，这就是技术革命。后一种潜力更大。鞍钢应大搞技术革命，大企业、现代化企业要自力更生，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但是，技术革命不容易，不是一天两天能做到的。首先得敢想，来个思想上的革命。没有思想革命就不可能有技术革命。① 10月10日，邓小平在听取石家庄地委和专署负责人汇报工作时进一步指出：农业生产要采取不断革命的精神，要敢想敢做。要善于揭示自然秘密，揭示物质的秘密。只要人的思想解放了，就能更多地掌握科学技术，充分发挥和挖掘物质的力量。②

关于大炼钢铁，9月22日，邓小平在听取中共吉林省委和长春市委负责人工作汇报时指出：搞钢铁就是搞共产主义，是战略任务，搞起来再说。炼铁的技术问题可以组织大学生下去指导。③

关于农业生产，邓小平多次强调农村发展要靠多种经营才能富裕起来。9月22日，他在听取中共吉林省委和长春市委负责人工作汇报时指出：农村只靠粮食摆脱不了贫困。要发展多种经营，坚决搞一批相信这个道理的人去试验。④ 10月25日，他在同云南省委负责人谈话时指出：在农业上一定要多种经营，搞多样性。不搞多种经营，还是不会富裕的。每个县都要有规划，都要有自己的重点。要千方百计地使农村交换的东西增多，这样人们收入就会增加，就会富起来。⑤ 10月29日，他在听取四川省温江专署所属几个县的负责人的工作汇报时指出：每个县都要给

①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455页。
②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460—1461页。
③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454页。
④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454页。
⑤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464页。

自己出题目，千方百计地提高农业产值。生产的安排必须适应社会生活发展的需要。需要有两方面：一是满足自身的需要，一是同他人交换。因此要发展多种经营，多生产一些有交换价值的农产品，这样才能不断地增加财富。竹子、果木、麻、药材等产品，交换价值大，既可以增加财富，又可以使农村园林化，大有可为。农村不搞多种经营要富裕起来是困难的。[①]

关于人民公社，邓小平提出如下观点和认识：第一，公社的巩固和发展要建立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9 月 25 日，他在辽宁盖平县视察太阳升人民公社时谈到：农村要大大增加生猪饲养数量，只有把农林牧副渔统统发展起来，才能增加生产增加收入，才能使人民公社巩固发展。公社是建立在生产大发展和人民政治觉悟提高的基础上的。公社应制定长远计划，逐步把农村居民点建成一座座漂亮的城市，有电影院、剧院、运动场，房屋都要改建，城中普遍种花果，要绿化、园林化，工农商学兵全面发展。大城市所有的一切，你们都可以有。将来无所谓农村和城市。工农差别、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城乡差别，都要消灭。[②] 9 月 27 日，邓小平在辽宁省和沈阳军区中共党员负责干部大会上的讲话中又说：农村的人民公社，辽宁的架子搭得比较早，全国最先成立人民公社的就是辽宁和河南。但是搭起架子，不等于事情就了结了，还要很好地做工作。公社一定要在一个充分的物质基础上才能搞得很好。[③]

第二，人民公社中党的领导只能加强不能削弱。10 月 10 日，邓小平在听取中共石家庄地委和专署负责人工作汇报时指出：各

①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465—1466 页。
②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455 页。
③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456 页。



级人民公社，党委都要大权独揽，不能削弱党的领导，而且要加强党的领导。应当选择有共产主义思想和风格的人领导公社，不能光讲资格。在这个总原则之下，考虑公社的组织形式。① 10月中旬，他在视察保定地区中谈到人民公社领导体制时指出：公社和党并在一起，不妥当，第一书记不能兼社长。书记搞到日常事务里，接触和反映问题的角度不同，有些问题也反映不到。人民公社党的领导很重要，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只要党存在就要大权独揽。② 10月25日，邓小平在同中共云南省委负责人谈话时进一步指出：有些地方提出党社合一的办法，是不对的，那样就会在实际上削弱党的领导、削弱思想工作。总之，必须谨记，什么时候都不能削弱党的领导。③

第三，办人民公社要不断积累经验，要体现出公社和集体化的优越性，不能搞得太死板。9月27日，邓小平在辽宁省和沈阳军区中共党员负责干部大会上讲话时说：农村公社一搞起来，逼得城市也非搞不行。大城市与农村相比有些特殊性，怎么搞法？要多多试验，积累经验，创造经验。④ 10月25日，他在同中共云南省委负责人谈话时说：现在还在积累经验。现在不能肯定徐水是成功的，但也可能是好东西。总之，要多种试验。鞋袜都穿一样的，食堂做什么就吃什么，行不行？恐怕有问题。不然，为什么叫“各取所需”呢？在任何情况下，不是一个办法可以解决问题的，把人们搞得那么死板不行。这里有个人、集体、全民的关系问题。不能由省或县搞一个办法，一律实行。⑤ 10月26日，

---

①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461页。
②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462页。
③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464页。
④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456页。
⑤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464页。

他在四川成都视察时指出：以一乡一社，县组织联社较好。搞联社，便于组织社与社之间评比，在社与社之间调剂贫富，抽肥补瘦，也可以避免经济结算不便的缺点，还可以充分发挥基层的积极性。公社的食堂要办得好一些，使农民感到比过去在自己家里还吃得好，这样才能显示出公社和集体化的优越性。显示优越性，这应该是我们经常考虑的问题。①

第四，公社要把农民的生活安排好。10月26日，邓小平在视察四川郫县德元公社和成都郊区金牛公社时指出：农民原有的自留地交给公社使用后，自己在生活上也还要有一些机动的余地，使自己增加一些食用的蔬菜。农民的房子要修建得宽大一点，周围多留空地，种些竹子、树木，既美化环境，又能增加收入。每家每户都能有一个庭院，住起来心情就更加舒畅。可以利用竹子制造一些经济、适用、美观的家具。民居和地方特色小吃，都是文化，应该保留并得到发展。组织群众生活是国家职能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一门很大的学问，各级党委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对人民群众的吃穿住和娃娃的教育问题，都应该更好地加强领导。总之要把农民生活安排得更好一些。②

在视察中，邓小平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在9月中下旬的东北视察中，邓小平深入到吉林省永吉县了解农业生产情况。当听说一块水稻试验田亩产可以达到四万斤时，邓小平十分吃惊。他说，能打十分之一，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广大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很高，精神很可贵，但是，指标要实际一些。③

视察东北期间，他还发现各地人民公社都在搞公共食堂、搞

---

①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465页。

②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464—1465页。

③ 《邓小平画传》，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22页。

供给制，但群众到食堂吃饭的却很少。邓小平在10月6日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指出这很值得注意。他说：实行供给制，要使群众自己略有调剂，粮食包了，但吃菜，要自己调剂，各家的灶能否取消，还是要研究。现在公社食堂有啥吃啥，社员穿衣也简单，将来生活好了怎么办？统统清一色好不好？南方人的生活是多样性的，吃菜的品种总要多样，三样四样。我们到哈尔滨看了一个公社，刚开始搞，到食堂吃饭的人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十几。另一个城市公社，也很少人吃食堂，其他人是来看。为什么大家不来吃食堂？就是菜搞得太单纯，不合口味。①

在10月中旬视察保定地区时，邓小平听到宣传共产主义越多越好的说法时指出：共产主义优越性要宣传，但要说清楚哪些是现今可以办的，哪些是将来可以办的。在谈到分配、奖励等问题时指出：工资拉平，是平均，不是平等。现在讲各取所需还早着呢。奖励问题是个理论问题，可以肯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靠物质奖励是靠不住的，但物质奖励现在还有积极作用。②

10月25日，邓小平在同云南省委负责人谈话时说，人民公社现在还在积累经验，走在前面一点的是河南、河北，河南也不是普遍地走在前头，河北主要是徐水。农村有些问题还要进一步去解决，但问题不大，方向明确了。徐水要消灭家庭，分成小孩队、老年队，分开去住。还是要慢一点，自然一点。徐水造房子，将人分别集中，实际是行政的办法，要自然一些好。愿意的，可以在一起；不愿意的，可以不在一起。都可以。③ 11月4日，他在贵州遵义县大风暴公社视察，谈到社员的衣食住行等生

①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459页。

②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462页。

③ 《邓小平画传》，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23页。

活问题时又指出：各人有各人的喜好，要允许人们有选择的自由。要有点自由主义，大集体，小自由。[①]

在川北，当邓小平看到男女老少都在大炼钢铁，田野一片空寂时，很不高兴。他对陪同的省、地负责同志说，你们这里农业生产是大失败，大垮台，明年是大减产！群众干劲大，热情高，这很好，但越是这种情况，你们越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要实事求是，保护好群众的积极性。[②]

由上可以看出，“大跃进”运动发动后，邓小平在积极贯彻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同时，也在不断思考和探索“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具体做法，并在思考和探索的过程中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思想观点。

1958年秋冬之际，毛泽东和党中央其他领导人开始发觉“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了不少问题。这年11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了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纠正在人民公社问题上出现的错误，规定要实行劳逸结合，既抓生产又抓生活的方针。毛泽东在会上批评了急于想使人民公社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以及废除商品生产等错误主张。这次会议是我们党纠正错误的开端。邓小平是11月6日从西南视察结束后直接赶赴郑州参加会议的。邓小平到会后，接受毛泽东的提议，主持起草《郑州会议纪要》（经毛泽东修改后改名为《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

11月21日至12月10日，邓小平在武昌先后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共八届六中全会。11月21日，邓小平主持《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起草委员会会议，讨论《决议》

①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467页。
② 《邓小平画传》，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24页。

起草问题。[1] 他在讲话中指出：《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它的性质是要给人民公社立一个宪法、一个共同遵守的章程。[2] 12月9日，邓小平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作《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说明。在谈到向全民所有制和共产主义过渡问题时指出：社会主义是高标准的，共产主义的标准更高。我们必须划清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必须划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目前的人民公社基本上是集体所有制的性质，不能说就是全民所有制，只是含有全民所有制的若干成分。我们的任务是建成社会主义，逐步增加共产主义的因素，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准备条件。我们必须根据这个质的规定性来制定方针和政策。在谈到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问题时，他指出：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所必需的。目前我国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应当利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形式来促进生产的发展。在谈到分配问题时，他指出：按劳分配原则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具有积极的作用，不能加以否定。在谈到集体生活中的个人自由问题时，他指出：凡涉及人民群众生活的事情，应当和群众商量，不能凭主观愿望办事。公共福利事业，如公共食堂、幼儿园、托儿所等，应当用把它办好的方法，吸引群众参加，绝不能用强迫命令的办法。在兴办公共福利时，个人生活资料永远归个人所有，这一点要公开向群众宣布。总之，在集体生活中的个人选择自由，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不是越来越小，而是越来越大。在谈到城市中组织人民公社问题时，他指出：总的精神是从稳从缓，以后再作专门研究。[3]

---

① 《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是以《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为基础起草的。

②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471页。

③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472—1473页。

邓小平所作的说明，从理论上阐明了社会主义同共产主义之间、集体所有制同全民所有制之间的明确界限，并对人民公社的性质、两个过渡等问题作了详尽论述，澄清了人们在这些问题上的混乱思想，对于遏制和纠正“大跃进”特别是人民公社化过程中出现的“左”倾错误发挥了重要作用。

进入1959年，由高指标导致的国民经济紧张局面日益严重，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对计划指标问题的认识渐为清醒。1959年1月6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谈到建设材料严重不足时指出：这是个大问题，各方面都出现了。工业出乱子，可能把整个国家计划搞垮。这牵连一系列的问题，钢影响机械，机械影响一系列。在谈到1959年计划问题时指出：今年任务是量力而行，重点是把生产秩序调整好。[1] 4月5日，他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就经济工作作说明时说：经过第一季度的实践，看来我们原来规定的某些生产指标搞大了一点，基建项目多了一点，而原材料的生产是有限度的，不可能保证这样大的生产指标和基建规模。现在看得明白，如果不根据客观的可能来制定计划，就难免在执行的过程中作一些不适当的安排，造成一些人为的困难。其结果不是搞得更多，很可能是搞得更少。我们都想多搞一点，这是可以理解的。这种热情是宝贵的。但是，如果我们过分夸大人的能动性，制定一个人们难于实现的计划，那我们也会犯主观主义的错误，同样不利于事业的发展。[2] 4月29日、30日，他在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上就计划指标问题又指出：现在还是议论多，方法值得研究，由下而上算。不要再议计划了，解决具体问题，方法是按实际可能来办。根据下面能包多少就包多少，能生

①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478—1479页。

②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502页。

产多少就是多少，不要从上面来规定。最后，完成多少，宣布多少。主要抓措施。我完全赞成退够，站稳了，再前进。[①] 这些内容都表明邓小平在经济计划问题上有了更为切实、更加深入的思考。

另外，邓小平还认为眼睛不能只盯着少数几个指标，而要看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平衡发展这个大局。他在5月28日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强调：思想上应从1800万吨钢中解放出来，注意力放在全局上，要注意整个国民经济。中央下了决心，退到可靠的阵地。钢、煤、粮、棉四大指标都要下调。在落实的基础上，积极增产。原来那种做法，只会上不去，最后还得下来。现在的问题是，究竟1800万吨钢完不成事情大，还是国计民生和市场问题大？眼睛只看到1800万吨钢，就会把全局丢掉，包括丢掉人心。[②]

随着“大跃进”运动的后果日益严重地暴露出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也开始对“大跃进”运动进行初步反思。邓小平认为“大跃进”运动最大的问题是浮夸风，造成的损失也比较大。1959年1月26日，他在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上谈到宣传问题时指出：宣传要鼓干劲，但要实事求是，力戒浮夸。去年在宣传方面确实有不实事求是的浮夸现象。[③] 2月20日，他在上海市委工业会议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我们对成绩要有足够的估计，但是同时也不能言过其实，迷惑自己。去年下半年宣传工作有点浮夸，有不少是言过其实的。有一些事情本来做得不错，但是擦上了一层厚厚的粉，不光外国人，连我们本国人也不

①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507页。
②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515—1516页。
③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486页。

相信。这样的例子在报纸、刊物、电影中都有。公开宣传要谨慎，宁可做的多说的少，不要说的多做的少。[1] 他在6月4日、5日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更为明确地指出，这一时期党内最大的损失是浮夸风。[2]

基于对上述问题的认识和反思，1959年五六月间，中共中央连续发出紧急指示，降低钢产量，强调要搞好综合平衡，国民经济形势开始朝好的方面有所转变。但由于对“大跃进”错误的严重性仍缺乏清醒的认识，庐山会议后形势又发生逆转，“左”倾错误继续发展。

连续三年的“大跃进”，由于违背客观经济规律，不仅没有实现“大跃进”，反而事与愿违，打乱了正常的经济建设秩序，浪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使我国的经济发展遭到严重挫折，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给党和人民带来一场灾难。

后来，在总结这段历史时，邓小平对自己的责任从不讳言，更未否认。相反，他多次提到：“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3] 1981年3月24日，他在会见坦桑尼亚总统朱利叶斯·克·尼雷尔时说：“毛主席的一生，成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在后期确实有不少错误，特别在‘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文化大革命’前，毛主席也有

---

①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490页。

②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517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6页。

些失误，比如说‘大跃进’，但这些失误的责任不能只放在他一个人头上，我们这些人也要负责任，因为当时我们也参加了中央领导。就我来说，我也要负责，否则不公道。”[①] 1986 年 9 月 2 日，他在答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问时又说：“‘文化大革命’前，我们也有一些过失，比如‘大跃进’这个事情，当然我不是主要的提倡者，但我没有反对过，说明我在这个错误中有份。”[②] 这些话说得很中肯，很公正，充分体现了邓小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态度。

①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725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73 页。

第十一章
DI SHI YI ZHANG 主持制定《工业七十条》

邓小平主持了《工业七十条》的起草工作，并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整顿工业企业，改进和加强企业管理的一系列正确主张，为推进国民经济调整作出了历史贡献。如果说我国农村比较快地从“大跃进”的灾难中走向恢复，主要是得益于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农业六十条》，那么，工业战线的调整和整顿，则得益于邓小平亲自主持制定的《工业七十条》。

《工业七十条》（全称《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是中共中央于 1961 年 9 月为克乱求治、整顿工业企业而制定的一个重要文件。它的公布试行，对于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大跃进”以来国营工业企业管理工作的经验，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恢复和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及正常的生产秩序，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技术水平和生产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邓小平主持起草《工业七十条》，为推进国民经济调整作出了历史贡献，并对此后国营工业企业管理章程的制定积累了有益经验，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开始转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以后，邓小平经常探索和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如何办好工业企业，改善和加强企业管理，并形成以下观点和认识：

第一，工业企业要维护正常的生产秩序，必须恢复和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大跃进"期间，全国工业企业掀起过一个大破规章制度的高潮，许多必要的规章制度都被废除了，出现了严重的无政府状态，并由此造成了严重后果。针对这种混乱局面，邓小平多次强调，要维护正常的生产秩序，必须恢复和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1959年1月6日，他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谈到企业管理问题时指出："现在确实很乱，要调整，要恢复过去好的制度。没有制度的要建立制度，一行一业地搞。总之不能不要制度。"同年1月26日，他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上谈到工业生产时又说："规章制度只能废除那些必须废除的，不能统统否定，有的废除了之后要新建，没有规章制度不行。"1959年2月20日，邓小平在中共上海市委工业会议开幕式上谈到企业规章制度时再次强调："规章制度是必要的，做任何事情没有一个规矩是不行的。越是大生产，越要注意这个问题。重要环节的改动，要经过试验，不要轻易废除。特别是一些技术上的问题，操作规程，技术规范，没有把握随便乱动，对生产不利。"1961年3月2日，他在与河南省委负责人谈到工业生产管理时，明确要求他们"把原来的好制度恢复起来。不立不破，多立少破，一步步地搞"，"要制定合理的工资制度，认真搞好奖励"。[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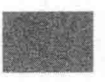
第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是民主与集中的结合。我国

①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478、1485、1490—1491、1619页。

国营工业企业的领导制度，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东北地区开始推广的是厂长负责制，其他地区则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1954年开始，关内各地经中共中央批准也相继实行厂长负责制。1956年中共八大否定了厂长负责制，决定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此后，邓小平几次发表讲话，阐述这一领导制度的基本内涵及实行的必要性。1959年1月6日，他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明确指出："工厂还是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由上而下、由下而上的民主集中制，是党的八大肯定的，这是一个完整的制度。"同年2月20日，邓小平在中共上海市委工业会议开幕式上再次指出："我们企业的领导制度，是党委统一领导下的民主集中制，是高度民主与高度集中的结合，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结合。"1959年2月25日，他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关于现代化工业企业领导制度和领导方法的决议（草案）》时又解释说："厂长负责制不能误解为一切都是厂长管；而是党委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制，厂长也是分工的一种。关键问题是现代化的生产需要集中统一指挥，所以要实行厂长负责制。"[①]

第三，企业要党政分开，党委不能过多干预行政工作。"大跃进"以来，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在实践中发生了许多问题，主要是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厂长负责变成了一句空话，而党委领导又削弱了政治思想工作。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明确指出，工业企业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和党委领导下的工人代表大会制，这就决定党委不能过多干预行政工作。党委对企业的领导，一是大政方针的讨论，一是领导群众监督。[②] 1959年2月20日，他在中共上海市委工业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

①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478、1491、1492页。
② 参见《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348、1351页。



“党政要分开。有的地方提出党政合一，这不好，这会使党委陷入日常事务之中，不利于党委讨论决定大事。”同年 2 月 25 日，他在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进一步指出：“在日常生产管理和指挥方面是由厂长负责。企业党委对大政方针不能居于超然地位，但对具体业务保持超然地位为好。现在许多地方党委一切上前线，什么事都直接管。”1961 年 3 月 28 日，邓小平在接见铁道部党委部分委员和参加铁路政治工作会议的代表时再次强调：“要考虑怎样保证真正实行党委集体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政治部门主要是抓方针政策，不要干涉行政事务，不要党政不分，把政治部门变成行政部门，致使思想政治工作没有人抓，这就削弱了党的领导作用。”①

第四，企业管理要搞民主化，其方向是群众监督。1956 年 10 月 16 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关于国营工业企业的领导问题的决定（草案）》时指出：“党委讨论问题，不能只听党员的意见，要注意党外的意见、群众的意见、专家的意见。党委讨论重大问题，可吸收党外管理专家参加，认真考虑他们的意见，这不是方式方法问题，是加强党内外联系的问题。”②1957 年 3 月 14 日，他在太原市部分厂矿企业厂长、党委书记座谈会上谈到群众监督问题时又指出：“党的八大确定了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现在再加上一个，党委领导下的群众监督制度，这是民主集中制在企业中的具体运用。”③ 同年 4 月 8 日，邓小平在西安干部会上所作报告中提出，要搞职工代表大会，加强它的作用，在厂矿企业里扩大群众的监督。他认为“厂矿企业的

①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491、1492、1626 页。
②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320 页。
③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351 页。

领导同志，有群众监督比之没有群众监督要好一些，会谨慎一些。实行群众监督可以把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会提出很多好的意见。”① 1959年2月20日，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谈到企业的领导制度时再次指出：“领导的关键问题是发扬民主。发扬了民主，就能够充分发挥人的能动性。”②

上述思想观点是邓小平探索工业企业管理制度与方法所取得的重要成果，是对“大跃进”以来工业企业管理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大跃进”期间工业企业方面出现的问题发表的切中时弊的见解，对于此后的工业企业整顿和国民经济调整发挥了积极作用。这些重要意见成为后来邓小平主持起草《工业七十条》的指导思想，有些意见在条例的基本精神中得到了体现，有些则直接写成了具体条文。

另一方面，为准备起草《工业七十条》，邓小平领导和组织中共中央书记处进行了一系列工业方面的调查工作。1961年初，李富春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意见，从国家计委、经委、一机部、中央高级党校等单位抽调人员，成立调查组，到北京第一机床厂等企业，对工业情况进行全面摸底和系统调查，从而为草拟工业条例准备了丰富的第一手材料。这次调查对《工业七十条》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工业七十条》中很多正确规定，就是针对调查中发现的带有普遍意义的问题作出的。《工业七十条》还概括了这次调查中总结的很多企业管理的好经验。

为指导制定《工业七十条》，1961年7月间，邓小平还亲自到东北工业基地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就企业管理问题发表了重要意见。7月15日、16日，邓小平在听取辽宁

①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1页。

②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491页。

省委负责人的汇报时指出："企业问题的解决要从几定[1]着手。定员、定额、责任制、技术政策、工资政策，这些问题解决了，企业才好领导管理。"又说："企业管理归根到底一定要集体领导，这是根本原则。集体领导有相互监督、相互制约的作用。"7月18日，邓小平在谈话中对正在沈阳为起草工业条例作调研的中共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进行了具体指导。他说："靠整风这点材料搞工业条例不够，根本问题是企业管理。用一个月时间搞典型试验，搞一点解决具体问题的经验。东北搞20个企业试点，从几定入手，定任务，包括品种、数量、质量、定员，规定每个职能机构和每个人的责任制，在管理制度、领导制度方面积累一点经验。"7月25日，他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介绍赴东北考察情况时再次指出："工业条例对厂长负责制一定要写清楚，包括副厂长、总工程师等的责任制，要规定一套制度。"[2] 这些重要意见为起草《工业七十条》提供了丰富依据，提出了明确要求，起到了基石作用，其中的基本精神和许多内容都写入了《工业七十条》，对当时及后来改进企业管理产生了重要作用。

起草《工业七十条》是在1961年6月17日邓小平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正式提出的，[3] 但此前已有一段时间的酝酿。

1958年"大跃进"以来，由于许多企业没有实行严格的责任

---

① 当时所说的"几定"，是为了加强整个工业生产的计划性，在计划管理中正确处理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保证企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国家对企业必须实行"五定"。其主要内容是：定产品方案和生产规模；定人员和机构；定主要原料、材料、燃料、动力、工具的消耗定额和供应来源；定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定协作关系，等等。这"五定"实际上是国家对国营企业所给予的生产条件和实行管理的基本原则。与此同时，企业对国家要实行"几保"，即保证产品的品种、质量和数量；保证不超过工资总额；保证完成成本计划并力求降低成本；保证完成上缴利润；保证主要设备的使用期限，等等。这"五保"的内容，实际上是企业对国家对社会应尽的义务。

②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649、1651、1654页。

③ 参见《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645页。

制，不讲究经济核算，工资、奖励制度上存在平均主义，以及党委包揽企业的日常行政事务等，相当普遍地出现了生产秩序混乱，瞎指挥、乱操作，设备损坏严重，经济效果很差等问题。严峻的形势迫切要求中共中央采取重大步骤，迅速扭转这种困境。在此背景下，起草工业企业工作条例的任务提上了议事日程。

早在 1961 年 3 月 27 日，邓小平就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农业六十条'是中央搞的，工业方面也要拿出若干条。"① 5 月 20 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搞工业文件问题。当薄一波表示搞工业文件光发个原则性的指示已不够时，邓小平当即表示："要写各项政策，如责任制、技术政策、工资政策等。"② 6 月 17 日，邓小平再次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正式确定起草工业企业工作条例。邓小平在讲话中对具体负责此事的薄一波明确指示："工业比农业复杂得多，究竟如何搞？现在心里无底。只有结合调查研究，条例才能搞得出来，可从各部抽人，必要时找少数大厂的人一块来参加；头 10 天左右，先把情况好好摸一下。"③

这次书记处会议后，薄一波组织了一个班子到沈阳，在那里一边调查研究，一边起草条例。7 月初，草拟出一个比较简单的稿子，题为《国营工业企业管理条例》。这时，中共中央书记处要求早些拿出初稿，以便大家酝酿、讨论、修改。7 月 3 日，邓小平在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曾问道："一波的初稿何时可搞出来？"④ 薄一波将草稿修改补充后形成初稿，改题为《国营工业管理工作条例（草案）》，于 7 月 16 日报送中共中央书

---

①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625 页。
②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641 页。
③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669—670 页。
④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671 页。

记处。7月下旬，薄一波到北戴河向邓小平作了汇报。[①]

7月28日，邓小平在北戴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薄一波关于《国营工业管理工作条例（草案）》起草情况的汇报和说明，[②] 并对条例草案进行讨论。在讨论中，邓力群建议在条例中加一段序言，邓小平表示赞成。[③] 书记处会议后，起草小组就在北戴河根据讨论意见进行修改。在讨论、修改过程中，起草小组发现中南区陶铸提出的一条意见很有价值。这条意见说，根据以往的经验，看来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还要坚持，但要增加一个新内容，即：对于党委的意见，如果厂长不赞成，可以请示报告上级，由上级来裁决；在此期间，厂长不同意党委意见，可以暂不执行。起草小组觉得，这条意见对减少由于党委的过分干预而使厂长无法负责，可能会起好作用。这条意见经邓小平同意后加写进条例。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意见，修改后的稿子题目定为《国营工业企业管理工作条例（草案）》，于8月10日报送中共中央书记处。[④]

从8月11日起，邓小平在北戴河连续4天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对条例稿逐条进行讨论，边议边改，最后定为10章、70条。据邓力群回忆，此前加写上去的关于加强党委对企业的领导那些内容，在讨论时引起轩然大波。有人首先质问：这不是推翻了党委领导的原则吗？这不是复辟一长制吗？这位同志讲完之后，还有好几个人发言。最后，邓小平说："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这一章由我来修改和构思，我先好好考虑一下。"在讨论条例稿的第二次书记处会议上，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这

---

① 参见邓力群：《〈工业七十条〉起草始末》，《百年潮》2011年第12期。

② 参见《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654页。

③ 参见邓力群：《〈工业七十条〉起草始末》，《百年潮》2011年第12期。

④ 参见邓力群：《〈工业七十条〉起草始末》，《百年潮》2011年第12期。

一章，就由邓小平口授，起草小组记录，在文字上没再出现厂长有否决权的字眼。按照邓小平口授写成并讨论通过的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这一章，可以说是邓小平的手笔。①

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是工业企业管理的根本制度，由邓小平口授写成并讨论通过的这一章是《国营工业企业管理工作条例（草案）》的核心内容和关键部分，是邓小平对整顿工业企业，加强和改进企业管理作出的重要贡献。邓小平在讲这一章怎么修改时，还对企业中党委的工作提出了很好的意见。他指出：党委要把反映群众意见、了解实际情况作为经常工作。党委的经常工作，就是加强调查研究工作，要向上下左右做调查，要进行深入的、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通过这些调查研究来考虑党委应该做些什么工作，怎样做工作。对厂里的日常工作，不应过多干预。②

8月15日，邓小平和彭真、李富春、薄一波致信毛泽东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就条例草案的起草经过及主要问题作了说明。针对当时国营工业企业管理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信中说，条例草案着重对以下几方面作了具体规定：在计划管理中，确定了国家对企业实行"五定"、企业对国家负责实行"五保"的办法；加强责任制，建立以厂长为首的全厂统一的行政指挥系统；端正对技术人员、老工人的政策；调整和固定企业之间的协作关系，严格实行经济合同制度；确定每个企业的生产行政工作只能由一个行政主管机关管理，不能多头领导，等等。信中建议将此条例提到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讨论修正，然后用草案形式发到各重要企业，一面试行，一面讨论提出意见，以便作进一步的

① 参见邓力群：《〈工业七十条〉起草始末》，《百年潮》2011年第12期。
② 参见邓力群：《〈工业七十条〉起草始末》，《百年潮》2011年第12期。

修改。[1] 毛泽东对条例草案很赞赏，说："我们终究搞出一些章法来了。"[2] 8 月 15 日当天，中共中央办公厅将条例草案和邓小平等四人的联名信印发给即将参加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各同志，请他们事先阅读，提出意见。

8 月 23 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庐山开幕，《国营工业企业管理工作条例（草案）》提交会议讨论。邓小平在大会讲话时说：这个条例将采用《农村六十条》的办法，先发下去试行，在试行中再修改。[3] 对于条例草案，多数与会者认为是一个好文件，对于兴利除弊、整顿工业企业、搞好企业管理十分必要。有了这个条例后，工业企业的工作就有章可循了。但也有人持不同意见，认为条例草案对"大跃进"的正面经验总结得不够，肯定得太少，党的领导问题也不够突出等。有些人担心，实行这个条例，又将回到"大跃进"以前的老路上去。还有人说了一句很尖刻的话：看来看去，这个条例是刚从苏联回来的人起草的。邓小平听说这话后很反感，说："我倒是留过苏，但不是刚从苏联回来的。"[4] 会议经过讨论，通过了《国营工业企业管理工作条例（草案）》。毛泽东对此表示满意，说："这次会议搞了几个好文件，如'工业七十条'、'高教六十条'等，证明我们的经验比较多了。"[5]

中共中央书记处认真研究了会上的不同意见，凡能吸收的都尽量吸收，并对条例稿再次作了修改。9 月 16 日，因邓小平已出访朝鲜，故由彭真将修改后的条例草案报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①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655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95 页。

③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672 页。

④ 参见邓力群：《〈工业七十条〉起草始末》，《百年潮》2011 年第 12 期。

⑤ 《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169—1170 页。

会。次日，毛泽东批示："指示及总则已阅，很好。"[1] 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审阅时，不约而同地在条例的题目上圈掉了"管理"二字，所以最后定稿的题目是《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工业七十条》）。1961 年 9 月 16 日，《工业七十条》由中共中央公布试行。

《工业七十条》针对当时国营工业企业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明确规定了国营工业企业的性质和基本任务，重新肯定了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要求建立和健全必要的责任制和各项规章制度，强调计划管理、按劳分配、企业经济效果和职工物质利益等项原则，并作出许多具体规定。《工业七十条》不仅在当时指导着工业企业的整顿工作，而且在此后很长一个时期内成为我国工业企业管理的纲领性文件。

邓小平在主持起草《工业七十条》的过程中，除肯定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并对企业中党委的工作提出了很好的意见之外，还提出车间、工段不实行党总支、支部领导下的车间主任、工段长负责制。[2] 当时，许多企业的车间、工段和科室，仿效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实行所谓党总支或党支部领导下的车间主任或工段长负责制、党总支或党支部领导下的科长或室主任负责制，有的班组甚至也实行所谓党小组领导下的班组长负责制。对此，邓小平明确表示反对。这一问题在《工业七十条》起草过程中曾有过激烈争论，有不少人说这与毛泽东历来主张党支部建在连上的精神相违背，是错误的，邓小平反驳说：这是工厂，和军队不完全一样，你完全叫他负责任不行。[3] 事实证明，邓小平

---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9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560 页。

② 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677 页。

③ 转引自王永华：《"工业七十条"争论始末》，《党史博采》2010 年第 2 期。

关于企业中党政关系的主张，既保证了党的领导，又限制了党委特别是党总支或党支部对生产行政工作的过多干预，强化了厂长及车间主任、工段长对生产行政工作的指挥权。这对纠正当时企业领导制度执行中发生的偏差，贯彻实行厂长负责制，推动工业企业整顿起了很大作用。

规定企业实行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是邓小平为健全和规范企业规章制度，改进和加强企业管理工作而提出的又一项正确主张。企业实行民主管理是邓小平的一贯思想。早在 1957 年 9 月 23 日，邓小平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作整风报告时即指出："党委领导下的职工代表大会，是扩大企业民主、吸引职工群众参加企业管理、克服官僚主义的良好形式，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有效方法之一。"① 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工业七十条》将职工代表大会制度载入条例，并作出具体规定。这对调动广大职工的生产积极性，激发职工群众主人翁的责任心，促进工业生产，保护职工权益，加强群众监督，发挥了重要作用。

邓小平在主持起草《工业七十条》过程中提出的关于整顿工业企业，改善和加强企业管理，实行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等观点，已作为党在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所积累的重要领导经验，载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② 这些正确主张是邓小平为恢复和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改进和加强企业管理作出的重要理论贡献，对推进工业企业整顿发挥了积极作用。如果说我国农村比较快地从"大跃进"的灾难中走向恢复，主要是得益于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农业六

① 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679 页。

② 参见《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753 页。

十条》，那么，工业战线的调整和整顿，则得益于邓小平亲自主持制定的《工业七十条》。

《工业七十条》政策明确，办法具体，下发后受到企业干部和职工的广泛拥护。各地区各部门选择不同行业和大、中、小不同类型的企业进行试行，与此同时，按照邓小平提出的要做"笨"工作的要求，[①] 根据条例的规定对国营工业企业进行整顿。邓小平对《工业七十条》的试行情况高度重视。1962 年 3 月 9 日，他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由李富春率工作组到长春协助企业抓精简节约和贯彻《工业七十条》工作。[②] 通过试行和整顿，一些在"大跃进"中受到破坏的工业企业较快地恢复了元气，开始出现新气象，正如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的报告中所说："在那些认真讨论和试行工业七十条的企业，成绩都比较显著。"[③] 1962 年第一季度，国家经委会同各地区各部门，对《工业七十条》的贯彻执行情况进行了检查。第一批试点的中央和地方工业企业近 3000 个，都不同程度地调整了企业内部关系，改善了管理工作，生产逐步好转。[④] 经过一系列试行和整顿工作，由于"大跃进"运动造成的企业管理混乱局面发生了很大改变，经济效果有了明显提高，我国工业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发展，重新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有力地促进了国民经济的调整。

但试行工作也存在阻力，并始终伴随着争论。试行的阻力来自地方各级党委。"大跃进"以来，由于权力下放过多，分散主义的倾向有了严重滋长，使得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中集中统一的领导受到破坏。而《工业七十条》实际上是要求集中统一，因此下面党

---

① 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683 页。
② 参见《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695 页。
③ 《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357 页。
④ 参见《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1 版，第 588 页。

委反应很强烈,不高兴,实际上就是反对集中统一,并要求作出修改。对此,邓小平明确表示反对。1961年12月18日,他在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旗帜鲜明地说:“现在不能改,先试行。七十条是要解决具体问题,大家要求改,说限制得太死,如果照大家的意见改,无非是加一些‘成绩伟大’等空洞语言,那解决什么问题呢?”[①]1962年2月2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讲到工业问题时又说:“还是搞‘工业七十条’。首先把直属企业搞好。有了‘工业七十条’,生产规模就好定。”[②]

《工业七十条》在试行中引起争议较大的是厂长行政负责制。邓小平在这个问题上态度十分坚决,就是要不折不扣地执行行政管理方面的厂长负责制。1961年12月18日,他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企业整顿问题时指出,企业生产指挥权一定要集中在厂长负责制上,至少三年内如此。1962年7月11日,邓小平在谈到企业管理问题时再次指出:七十条明确规定行政上由厂长负责,书记不干预日常行政事务,为什么企业要设那么多的副书记?针对有人强调七十条还在试点时,邓小平说:七十条不要试点了,也不要等修改了,就那样办;哪一个书记独断专行,不执行七十条,请你们提出名字来。今天各部都在这里,今后要按新章程办事,要百分之百地执行七十条。[③]

实践证明,《工业七十条》确是一部有效的治乱文件。邓小平后来多次对具体负责条例起草工作的薄一波说:“毛主席直到临终时,还把《工业七十条》的文件摆在枕边,始终没有提出过批评。”[④]

---

①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677页。
②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693页。
③ 转引自王永华:《“工业七十条”争论始末》,《党史博采》2010年第2期。
④ 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687页。

第十二章 在“七千人大会”上

DI SHI ER ZHANG

当陶涛建议为了打通思想，把全国的地委书记找到北京来开会时，邓小平当即表示赞成。随后根据毛泽东的意见，邓小平负责“七千人大会”的准备工作，主持和参加了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提出的书面报告的起草工作，并在会上就恢复党的优良传统特别是民主集中制等问题发表讲话，代表中央书记处作自我批评，为大会取得积极成果作出了历史贡献。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扩大的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及地委、县委、重要厂矿和部队的负责干部共七千多人，故称“七千人大会”。这是在“大跃进”造成严重经济困难、经过一年调整形势开始有所转变、但困难还很大、党内外思想上各种疑虑和分歧还很多的情况下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会议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以来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上的经验教训，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加强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统一了思想认识，增强了全党的团结，对推动国民经济全面调整、扭转经济困难局面起到了积极作用，并对此后党和国家的历史进程产生了重

大而深远的影响。

有学者指出：“关于召开七千人大会问题，可以说，首倡者之一是邓小平。”[①] 笔者在一定程度上赞成此说。在中央领导一线工作的邓小平，深感“大跃进”以来分散主义问题之严重。表现在粮食征购问题上，就是各地“怕当老实人，总想减任务，不努力完成”。[②] 1961 年 11 月 6 日至 10 日召开的中共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工作会议在讨论 1962 年粮食上调方案时，遇到困难，粮食调不上来。当陶铸建议为了打通思想，把全国的地委书记找到北京来开会时，邓小平当即表示赞成。[③] 11 月 12 日，邓小平在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汇报中共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工作会议的情况及陶铸的建议时，毛泽东提出要召集县委书记来开个会。会议决定，12 月 20 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之后，召开县、地、省、中央局四级会议，也就是后来的“七千人大会”。[④] 11 月 16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可见，在召开“七千人大会”问题上，邓小平的确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作为党的总书记，邓小平负责准备这次大会。为此，他多次主持召开会议，研究和部署大会的准备工作，阐述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和用意。1961 年 12 月 12 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 1962 年 1 月“七千人大会”的准备等事项。[⑤] 12 月 18 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并指出：“明年初要开七千人大会，其用意就是要统一全党思想，鼓足干劲，在一

① 张素华著：《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22 页。

②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669 页。

③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669—1670 页。

④ 参见《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670 页；《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184 页。

⑤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676 页。

个目标（长远规划）之下，立志气，有奔头，不要搞得思想解体，灰溜溜的。”① 12月21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做长篇讲话，在谈到如何开好“七千人大会”的问题时说：“这次七千人大会搞什么？中央发了通知，主要的就是八个字：鼓足干劲，统一思想。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统一行动。准备在会上作一个报告。这个报告正在准备，来得及的话，最好在我们的工作会议上来讨论一下。报告想讲三部分问题：第一，讲形势和任务，包括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规划要搞个什么样子，这样来鼓足干劲。第二，讲集中统一的问题。第三，讲党的问题。总之，我们这个会实际上也就是为那个会作准备。”② 1962年1月8日，邓小平再次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批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有关安排。③ 通过上述工作，明确了大会要解决的问题，提高了大家的思想认识，为“七千人大会”的顺利召开作了充分准备。

准备工作中最重要的是起草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提交的书面报告。报告“先由邓小平主持、继由刘少奇主持起草”，④“1961年12月31日以前的起草工作，主要是邓小平抓的”。⑤ 从1962年1月1日起，起草工作主要由刘少奇主持，邓小平始终参加此项工作，并发挥了重要作用。1月2日，邓小平同刘少奇、陈伯达、胡绳等讨论“七千人大会”报告稿。1月4日至8日，邓小平又召集有关人员开会，继续讨论报告稿。⑥ 1月9日形成第一稿，报送毛泽东审阅。1月10日，毛泽东在看过报告稿的前

①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677页。
② 《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191页。
③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682页。
④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448页。
⑤ 张素华著：《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年版，第50页。
⑥ 参见《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682页。

两部分后，把邓小平、陈伯达、田家英找去商量，决定将报告立即印发“七千人大会”，分组讨论三天，征求意见。[①]“七千人大会”从1月11日开始对报告进行讨论后，邓小平多次主持、召集有关人员开会，听取和通报大会各小组对报告稿的反映及讨论情况，传达毛泽东对报告稿的意见，讨论对报告稿的修改，[②]组织和推动讨论及修改工作的正常进行。

在大会讨论报告稿期间，鉴于大会各组对报告稿有许多意见，毛泽东提议重新成立报告起草委员会，吸收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和中央的一些负责人参加。会议当即组成一个有21人参加的报告起草委员会，[③]充分听取大会代表的意见，对报告作进一步修改。邓小平是报告起草委员会的重要成员。1月17日至24日，刘少奇先后8次主持召开报告起草委员会会议，邓小平出席了各次会议，并对报告提出重要修改意见。1月18日，邓小平在发言中指出：“反分散主义是向全党提问题，一定要这样抓。下面只看到小天地，这不怪他们。我们要用正确的思想去引导他们。要在群众中树立全局观点、整体观点，要让他们看到长远目标、光明前途，这些很重要。”[④]在彭真发言时邓小平还插话说：“我们到主席那儿去，主席说，你们的报告把我写成圣人，圣人是没有的，缺点错误都有，只是占多少的问题。不怕讲我的缺点，革命不是陈独秀、王明搞的，是我和大家一起搞的。”[⑤]1月19日，邓小平在发言中指出：“当前的主要矛盾是不是主观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矛盾？有人说是。这样提问题，得不出结论。”1月

---

① 参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191、1192页。
② 参见《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683—1684页。
③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684页。
④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684—1685页。
⑤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720页。

21日，邓小平在发言中指出："不提大跃进，三面红旗就少了一面。事实上，品种齐全，质量提高，也是大跃进。大会报告时可以对大跃进解释清楚。十年计划中就可以提在科学技术和工业产品的品种、质量方面实现大跃进。李富春多次提到要加强计划机关，我看现在应该提出加强地方计划机关的问题。要有一个书记专管计划工作，使其真正成为党委的助手，成为财政经济工作的综合机构。"[①] 这些意见对报告稿的修改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经过反复讨论修改，1月24日，起草委员会拿出了报告修改稿。在刘少奇和邓小平向毛泽东汇报后，毛泽东肯定了对报告的修改，表示"赞成这个方向"。[②] 1月25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并基本通过报告修改稿，同意将此报告正式提交大会。邓小平在发言中指出："这个报告的中心问题，一是总结了十二年主要是最近四年的经验，二是提出了现在的主要矛盾，三是专门讲了党的问题。这个报告中有那么几个核心问题，特别是方向提得对不对，经验总结得对不对，这是关乎全党很重要的问题。"[③] 至此，报告起草工作圆满完成。1月27日，正式印发与会代表。

起草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提交的书面报告，是会议准备工作的重中之重；讨论和修改书面报告是"七千人大会"第一阶段的主要内容。报告分析了目前国内经济状况以及造成困难的原因，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经济建设工作的基本经验教训，代表中共中央承担了责任，对于统一全党思想，动员和鼓舞全党同心同德地克服当前困难、完成各项工作任务，起到了积极作用。

---

①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685页。

② 《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193页。

③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686页。



报告的形成为大会的成功召开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在会议的准备和报告的起草及修改过程中，邓小平发挥了重要作用。

1962年1月28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他准备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话的内容。2月5日，邓小平再次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并同意他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要点。[①] 2月6日，邓小平在“七千人大会”全体会议上讲话。2月19日，邓小平将讲话稿送毛泽东审阅。2月24日，毛泽东批示：“邓小平同志：全文看过，很好。”3月2日，邓小平将讲话稿再批送刘少奇、彭真看过后交杨尚昆付印。[②]

邓小平在大会上主要讲恢复党的优良传统。他指出：“最近几年，我们党的领导，党的工作，是有严重缺点的。特别重要的是党的优良传统受到了削弱。有些地方有很大的削弱，严重的削弱；有些地方好些。就全党来说，有相当程度的削弱。我们宁肯把这个问题估计得重一点，使全党有所警惕。因为这几年许多同志忙于具体工作，不大谈党的问题，不大注意党的建设，所以强调指出这一点是十分必要的。”[③]

邓小平在讲话中首先回顾了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他说：“我们党的好传统、好作风，就是毛泽东同志所概括指出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作风，联系群众的作风，自我批评（当然也包括批评）的作风。总的来说，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实事求是的作风。”“我们还有一个传统，就是有一套健全的党的生活制度。”“比如民主集中制；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批判从严、处理从宽，不搞过

①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686、1688页。
②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692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1页。

火斗争、无情打击；艰苦朴素、谦虚谨慎，等等。”[①]

接下来，邓小平分析了党的优良传统受到削弱的原因：首先，“这几年来，我们不大注意调查研究，因而所提的一些任务往往不是实事求是的，所提的一些口号，也有许多不是切合实际的。指标过高，要求过急，还有一些不适当的‘大办’，这就使得我们的许多好传统受到了冲击。”“其次，在这几年的党内斗争中发生了一些偏差。”“由于这些偏差的影响，我们党的许多好的传统受到了削弱。例如，实事求是，说老实话，本来是我们党的传统，但是，由于没有贯彻实行民主集中制、运动中斗争过火等种种原因，这几年在我们党内滋长了一种不如实反映情况，不讲老实话，怕讲老实话的坏风气。”[②]

对于如何恢复和坚持党的优良传统，邓小平认为：“除了调查研究、实事求是、联系群众、及时纠正错误等等以外，必须注意健全党的生活。这是坚持党的优良传统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③] 为此，他在讲话中从坚持民主集中制、建立经常工作、培养和选择干部以及学习理论等四个方面论述了这个问题，重点是讲民主集中制。

关于民主集中制，邓小平在讲话中有以下重要观点和主张：第一，民主集中制是党和国家最根本的制度，坚持并完善这个制度，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事情。第二，这几年，工作中的分散主义相当厉害，命令主义也发展了，党内民主削弱了。这次会议提出要加强民主集中制，发扬民主，加强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是很必要很适时的。第三，没有民主，就没有集中统一；

①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9、300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2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4页。



没有集中统一，党就没有战斗力。今后一定要建立党员与党的正确关系，保障党员权利。第四，要把我们党的老传统真正地恢复和发扬起来，党的各级领导同志的态度很重要。各级领导同志要善于倾听反面意见，倾听不同意见；要听老实人的话，听老实话；要服从和团结多数，尊重少数。第五，对于党的各级领导人应该有监督，这种监督最重要的来自党委会本身，或者书记处本身，或者常委会本身。要重视党委内部的互相监督作用。邓小平说：“我们一些领导同志，同伙夫、勤杂人员等同志们编在一个党小组里，那是起不了多少监督作用的。”“同等水平、共同工作的同志在一起交心，这个监督作用可能更好一些。”又说：“上级不是能天天看到的，下级也不是能天天看到的，同级的领导成员之间彼此是最熟悉的。”[①] 为此，他建议把领导人的主要的小组生活，放到党委会去，或者放到书记处去，或者放到常委会去。在党委会里面，应该有一段时间交交心，真正造成一个好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空气。第六，党委内部要注意集体领导，分工负责。日常的问题要分工负责；重大的问题必须分别情况，提到委员会、常委会，或者书记处加以讨论，取得共同的意见，作出共同的决定。[②]

“七千人大会”的主旨是强调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中心问题是民主集中制。毛泽东在大会上的讲话和刘少奇向大会提出的书面报告都重点论述了这个问题。邓小平从健全党的生活、恢复党的优良传统的高度，对民主集中制的重要意义、基本内涵及实施举措等问题进行了深刻分析和全面论述，提出了重要的观点和主张。这些观点和主张是对大会主题的具体阐述，与毛泽东

①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0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4—312页。

和刘少奇在大会上关于民主集中制问题的论述彼此呼应，相互补充，共同形成"七千人大会"的重要理论成果，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民主集中制的思想宝库。

在健全党的生活的其他方面，邓小平也都提出了重要的思想和主张。关于建立经常工作，他在讲话中指出："一切工作的成绩，都是由一点一滴的细致工作积累起来的。群众运动只是实行群众路线的一种形式，而我们这几年把大运动当成了群众路线的唯一形式，这是不好的，应吸取教训。有了经常的细致的工作，了解问题可以比较深入，对调查研究也有帮助。"关于培养和选择干部，特别是培养和选择各级领导核心，他在讲话中说："这几年，我们在几个大运动中对相当数量的干部处理得不慎重，损伤了一部分干部。要实事求是、分别对待地进行甄别、平反工作。干部好坏长短应从他长期工作中去鉴别，而不能只从某一运动或某一短时期的表现去鉴别。"关于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毛泽东著作，他在讲话中强调："要造成一种学习理论、学习实际的空气。不学习或不注意学习，忙于事务，思想就容易庸俗化，就要犯错误。"[①] 这些重要思想和主张，和邓小平关于坚持民主集中制的论述一样，都是"七千人大会"所取得的积极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对"七千人大会"所作出的理论贡献。这些观点和主张对我们今天加强党的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七千人大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盛会，开得比较成功，"取得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所能取得的重要成果"。[②] 对于大会的成果和精神，邓小平及时组织传达和学习。1962 年 2 月 8 日，也就是大会闭幕的第二天，邓小平就

①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689—1690 页。

②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598 页。

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讲了大会精神的传达和文件阅读的问题。2月12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决定：中央和国家机关17级以上、司局长级以下的干部，根据报告传达讨论；司局长级以上的干部除了传达报告外，还传达毛泽东和政治局其他常委同志的讲话。各省、市、自治区都分别在2至4月间，按党中央规定的范围，传达、讨论和贯彻会议精神，在各级党组织内发扬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总结经验教训。[①]

“七千人大会”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充分发扬民主，认真开展了批评和我批评。在全体会上，毛泽东带头作自我批评，对几年来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承担了主要责任。刘少奇在报告中代表中央承担了领导责任。周恩来也作了自我批评，说这几年的缺点、错误，国务院及所属各综合部门，要负很大责任。邓小平在大会上讲话，代表中央书记处作自我批评，指出：“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的责任，中央首先负责，而在中央，首先应由做具体工作的中央书记处负主要责任。”[②] 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和中央各主要部门负责人，也都在这次会上作了自我批评。

由党的主要领导人带头在如此广大的范围内作诚恳的自我批评，主动承担失误的责任，这样广泛地发扬民主和开展党内批评，在新中国成立后党内生活中还不曾有过，所以“七千人大会”的意义和作用尤其重要。正如陈云在参加“七千人大会”的陕西省全体干部会上所说：“这次大会取得了非常大的胜利，不要估计低了。只要有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条，坚持真理，改正错误，我们共产党就将无敌于天下。”[③] 对于“七千人大

①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717页。
②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688页。
③ 《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7页。

会”的这种自我批评精神，邓小平一直深深怀念。1992年7月下旬，他在审阅中共十四大报告稿时，再一次回忆起“七千人大会”，说：在那次会上，大家都作了检讨嘛！①

“七千人大会”的另一个重要成果是加强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在会上，中央领导人抓住削弱民主集中制特别是抓住破坏民主的倾向，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分析出现缺点和错误的原因，的确是抓住了问题的要害，这也是这次大会的一个显著特点。在“七千人大会”上，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关于民主集中制问题的一系列论述，把党的民主集中制理论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使之得到了恢复和加强。“七千人大会”在动员全党为战胜困难而团结奋斗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会后，国民经济和政治关系等方面的调整都有进一步的发展，国民经济形势开始好转。

①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722页。

第十三章 论战主将

DI SHI SAN ZHANG

从1960年开始，邓小平以相当大的精力投入到中苏两党论战中，曾多次率代表团去莫斯科同苏联共产党进行谈判，成为“那场争论的当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在论战中，邓小平根据中共中央确定的方针，在一些重大问题上阐明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的原则立场，批评苏共“老子党”的霸道作风，谴责他们把两党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的错误行径，维护了中国共产党的尊严，捍卫了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毛泽东后来多次提到邓小平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没有屈服于苏修。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了新的复杂情况。从1960年开始，中苏两党之间爆发了一场长达数年之久的论战。作为党的总书记的邓小平以相当大的精力投入到这场论战中，曾多次率代表团去莫斯科同苏联共产党进行谈判，成为“那场争论的当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

1960年，邓小平三次赴莫斯科谈判，和苏共展开论争。在此之前，中苏两党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已产生明显分歧，并日益

公开化。邓小平利用会见外宾等场合，就中苏两党的原则分歧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观点和主张，争取了社会主义阵营的理解和支持，为此后赴莫斯科谈判进行了舆论准备。

苏联《真理报》发表的《列宁主义伟大思想的胜利》一文指出：苏共和苏联政府把和平共处问题看成是在现代条件下解决一切国际问题的出发点。苏共发展了列宁的学说，作出了新的重要的理论和政治性的结论，即在资本主义仍在世界的部分地区存在时，有了把世界大战从人类社会生活中根除的现实可能性。①

针对这一观点，5月13日，邓小平在会见即将回国的捷克斯洛伐克驻中国大使布希尼亚克时指出：我们共同致力于争取世界持久和平，争取和平应该“两条腿走路”。一方面是群众的斗争，包括社会主义阵营力量的壮大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反对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另一方面，我们也准备与帝国主义谈判，例如最高级首脑会议、裁军会议，如能达成协议当然很好，如不能，也能达到揭露帝国主义的目的。打仗也是“两条腿走路”，就是争取和平，也准备战争。现在有两个口号“没有战争的世界”、“没有武器的世界”。办到当然很好，不过在阶级社会中绝不可能办到。② 5月25日，他在同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黎笋举行会谈时指出：历史不能根据某些人的情绪改造，不能凭个人感情。我们能否认斯大林领导革命三十年的主要作用吗？如果斯大林三十年这么丑恶，过去革命都是假的，那么，苏联三十年也是丑恶，我们脸上也无光彩，全世界人民还有什么勇气搞革命？和平过渡关系到人类的三分之二。不要

① 转引自《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544页。

②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548页。

轻易下判决书，判决不许革命。[1] 6 月 30 日，邓小平在与拉美十二国兄弟党学习代表团讲到战争与和平问题时又说：我们的观点是，力争和平，防止帝国主义战争，要对付战争打不起来，还要对付打起来怎么办。一方面有信心力争和平，另一方面，如果发生战争，也有信心和力量最后消灭帝国主义。[2]

关于时代性质问题，5 月 25 日，邓小平在同黎笋会谈时指出：有人提出我们的时代问题。什么是我们的时代？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是否过时了？我们的观点是，情况有变化，但帝国主义的特征未变，一九五七年莫斯科宣言没有过时。[3] 6 月 5 日，他在刘少奇主持的招待外宾的宴会上发表讲话指出：关于我们的时代的问题，我们认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没有过时。现在有些人说反对教条主义，实际上是在反对马列主义。我们认为莫斯科宣言是根据国际共产主义的发展和时代的特点制定的，它作出了正确的结论。[4] 6 月 30 日，邓小平在会见拉美十二国兄弟党学习代表团时又指出：一切问题的关键在对时代的分析，这个问题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有不同的解释，发生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个论断合不合用的问题。我们的观点概括地说，列宁的论断并没有过时，帝国主义的特征没有改变。[5]

针对赫鲁晓夫在匈牙利党代表大会上要求各国党“对对表”的问题，5 月 27 日，邓小平在同黎笋会谈时指出：“对表”是应该的，问题是向谁对？向一个人的指挥棒对，还是向一个共同纲领对？应该向马列主义对，向莫斯科宣言对。[6]

①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552 页。
②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562—1563 页。
③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552 页。
④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556—1557 页。
⑤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562—1563 页。
⑥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553 页。

6月23日，在有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党的代表团参加的布加勒斯特会议前夕，苏共代表团将苏共中央6月21日给中共中央的《意见书》和《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谈公报》交给中共代表团，并在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散发给参加会议的各党代表。《意见书》从时代性质、战争与和平、和平共处等7个方面对中共进行指责。《会谈公报》则强调了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问题。赫鲁晓夫煽动一些代表团对中共代表团进行围攻和指责，并在24日强迫中共代表团在《会谈公报》上签字。[①] 7月16日，苏联政府照会中国外交部，单方面决定召回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25日，又通知中国政府，将从7月28日起撤回全部在华专家，并废除200多个科技合作项目的协定。8月底，苏联专家基本撤完。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9月16日，邓小平和彭真率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中苏两党会谈。9月17日至22日，邓小平率中共代表团同以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中央书记苏斯洛夫为团长的苏共代表团进行了五次会谈。在会谈中，邓小平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确定的坚持原则、坚持团结的方针，集中在重大原则问题上，阐明中国共产党的立场，批评苏共中央的立场，特别是苏共中央把两党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的几次重大政治行动。

9月17日，邓小平在克里姆林宫（下同）出席中苏两党代表团第一次会谈。在发言中指出，我们对苏共中央建议两党会谈感到高兴，我们这次是怀着求得团结一致的愿望来的，希望在这一方面能够有所成就。在听完苏方代表苏斯洛夫发言后邓小平指出：现在需要审查一下我们之间的分歧究竟何在。请苏共中央冷

①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560—1561页。

静地想一想，你们是不是真正为了两党、两国的团结，是不是真正想把两党、两国的关系搞好。实际上，你们已经把两党在重大原则问题上的争论，扩大到两国的国家关系上去了。布加勒斯特会议后，你们发表了六七十篇文章反对和指责中共；片面停止中苏双方友好杂志的出版；片面全部撤走苏联专家；无理要求中国政府召回驻苏使馆一位工作人员；挑起边界事件。因此，我们想提一个最本质的问题，究竟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想把中苏两党和两国的关系带到哪里去，导致什么结果。只有弄清这个问题，才能找到真正消除我们之间的分歧的前提。①

9 月 19 日，邓小平出席中苏两党代表团第二次会谈。在苏方代表科兹洛夫发言后指出：首先，苏斯洛夫在十七日的讲话中，说什么我们对苏共中央意见书的答复是“捏造”，是“污蔑性的指责”等等。今天科兹洛夫又列举了一系列的事件，来证明我们所说的不是事实。究竟谁捏造，这很容易审查清楚。黑的说不成白的，白的也说不成黑的。我倒是感觉，我们讨论的一个前提应该是尊重事实，根据事实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其次，对你们在布加勒斯特会谈后所采取的一系列行动，我们感到忧虑。你们到底想把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引导到哪里去？科兹洛夫对这个问题的答复是不能令人信服的。②

9 月 20 日，邓小平出席中苏两党代表团第三次会谈。在发言中指出：从去年九月塔斯社发表声明后，赫鲁晓夫带头集中攻击中共和中国，反华运动到布加勒斯特会议时达到了高潮。一方面集中地攻击中国，参加反华大合唱，一方面美化美帝国主义和艾森豪威尔，这是同时进行的两件事。根据大量事实，我们想请苏

①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575—1576 页。
②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576 页。

联同志考虑一下，是不是苏联同志把和敌人、和自己同志之间的关系安排得不那么恰当。我们多少年来就有这种感觉，你们不是以平等的、兄弟国家的态度来对待中国，而是以父子国家的态度来对待中国。坦率地说，中国共产党永远不会接受父子党的关系。在兄弟党之间，是不存在少数服从多数的组织原则的。要想利用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并且使父子党的关系合法化，这是徒然的。最后，我们提出这些批评，目的是坦率地交心。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我们两党两国只能团结，不能分裂。你们对中国单方面撤回专家，撕毁协议，给我们带来很大损失，但中国人民决心把这一损失吞下去，用自己双手的劳动来弥补这个损失。①

9 月 21 日，邓小平出席中苏两党代表团第四次会谈。苏方代表苏斯洛夫和科兹洛夫在会上发言，批驳中方的说法不符合事实，是丑化苏共中央和它的政策。

9 月 22 日，邓小平出席中苏两党代表团第五次会谈。在发言中指出：我们对于苏联在和平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各种正确的主张和行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支持的。就我们两党的整个关系来说，分歧只是部分性质的。但不能因为主要的方面是好的，就可以取消指出缺点和克服缺点的必要性。在这次会谈中，我们向你们交了心，我们认为，我们的观点是正确的，希望能得到你们的仔细考虑。②

这五次会谈充分显示了邓小平思维敏捷、言辞犀利、不辱使命的外交才干和政治韬略。因双方分歧很大，这次会谈在各项原则性问题上没有取得共识，但各自表明了观点。9 月 22 日，邓小

---

①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577 页。

②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578 页。



平在苏共代表团举行的宴会上，对这五次会谈进行了总结。他说：这次我们两党代表团进行了五天的会谈，我们坦率地讲了自己的观点，用了尖锐的语言，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达到团结。虽然有分歧，但这些分歧是会逐步消除的。我们两党两国的团结是永恒的，这种友谊和团结，不仅关系到我们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也关系到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根本利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全世界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①] 当晚 11 时，邓小平率中共代表团乘飞机离开莫斯科。

9 月 30 日，邓小平和彭真率中共代表团飞赴莫斯科，参加于 10 月 1 日至 22 日举行的 26 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文件起草委员会会议。会议共举行了 8 次全体会议和 11 次秘书处会议。会议对苏共中央起草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草案》中提出的关于时代、和平共处、和平过渡、战争与和平、全面彻底裁军、“单干”和“民族共产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集团活动和派别活动、个人迷信、对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一大的评价等问题进行了激烈争论。中苏两党代表团之间多次交锋，邓小平在全体会议上作了两次发言。

10 月 5 日，邓小平在 26 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文件起草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发言，就战争与和平、和平过渡、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式和方法、团结等问题阐述中国共产党的原则立场。在肯定了《声明草案》里正确的部分后指出：关于和平过渡问题，我们的观点历来很清楚，应该提出和平过渡和非和平过渡两种可能性，而工作的重点，放在艰苦地积聚革命力量，准备随时迎击反革命袭击方面，而不应当像《草案》这样没

①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578 页。

有根据地不适当地强调和平过渡可能性在目前时期的增长。《声明草案》在谈到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时说修正主义已经在思想上粉碎了，这种说法是不合乎实际情况的，是完全错误的。为了有利于总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造性发展，我们认为，应该承认各国党，无论是大党，还是小党，无论是取得革命胜利的党，还是尚未取得革命胜利的党，在自己的革命斗争中，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都有自己的贡献。这三年来，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式和方法，不断出现许多新创造，十分丰富多彩。中国人民也在自己的实践中创造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新经验。但《声明草案》故意强调采用所谓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集体经验，为在国际范围内反对中国共产党现行的社会主义建设方针制造根据。对于这种做法，我们不能不表示坚决反对。《声明草案》中关于团结讲了很多，但却用了大段文字批评所谓"民族共产主义"、"单干"、集团活动或派别活动等等，这些话，都是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我们不能不郑重声明，这将对国际共产主义事业蕴藏着极大的危险，我们要求起草委员会的全体同志注意这个问题。[①]

10 月 10 日，邓小平在 26 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文件起草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作书面发言，就以下 12 个问题阐述中国共产党的原则立场：（一）时代问题。（二）战争与和平、和平共处问题。（三）帝国主义是纸老虎问题。（四）人民革命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问题。（五）"没有武器，没有战争的世界"的口号问题。（六）团结问题。（七）中苏两党分歧问题。（八）所谓"单干"和"民族共产主义"的提法问题。（九）大国沙文主义问题。（十）责任问题。（十一）以苏联为首，以苏共为中心问题。（十二）反对修

①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583—1584 页。

正主义与教条主义问题。[1]

10月22日，邓小平在26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文件起草委员会闭幕会上作简短声明，对这次会议进行总结和评价。他指出：这次会议采取反复讨论和协商的办法，制定了一个基本上能够为大家所接受的文件，证明这个方法是缩小分歧、导致一致的有效方法，不同于布加勒斯特会议所采取的方法。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声明草案》比原先的有很大改善，好的部分改得更好了，不确切、不妥当、不利于团结的部分，除少数例外，都作了修改。遗憾的是，还有几个重大的原则问题没有达成协议。我们愿意在另外的机会继续和大家交换意见。[2] 10月23日，邓小平在同印尼共产党代表阿吉多罗普交换对会议的看法时，又指出了这次会议的两个主要收获，（一）揭开了盖子。从几十年来的历史看，任何党都必须跟着苏共走，如果有谁批评苏共就叫犯法。这实际上是要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把马列主义垄断起来！实际上，这样就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搞死了，这样就必然要导致犯机会主义或教条主义的错误。这次会议上把盖子揭开是破天荒第一次。（二）解决了多数和少数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是件重要的事，这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应不应该靠表决机器的问题。[3] 当晚，邓小平率中共代表团乘飞机离开莫斯科回国。

后来，邓小平在1983年4月29日会见印度共产党（马）中央代表团时，对在26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文件起草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情况进行了回忆。他说："一九六〇年莫斯科会议我是我们党的主要发言人，在二十六国会议上我讲了四个多小时。但如

①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586页。
②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588页。
③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590页。

果现在讲，有好多提法就不同了。”①

1960年11月5日，邓小平作为中国党政代表团副团长，和团长刘少奇率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43周年庆典，并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81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这是邓小平当年第三次赴莫斯科。这一次，邓小平与赫鲁晓夫进行了面对面的交锋。

11月10日，81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赫鲁晓夫代表苏共中央在会上发言。他分段解释由苏方起草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草案》，一方面喊团结，一方面影射攻击中国共产党，强调不能容忍派别活动，提出不能过分强调民族特点，要大家“对表”。《声明草案》全面肯定苏共二十大、二十一大，不点名地指责中共搞所谓派别活动、“民族共产主义”等。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11月14日，邓小平在81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第四次全体会议上作第一次大会发言，就世界形势、战争与和平、革命、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中苏分歧、团结和援助等问题，阐述中国共产党的原则立场。在讲到团结问题时指出：希望苏共中央放弃把同志式批评看成是同团结不相容的观点。在马列主义基础上，用经过协商取得一致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必须肯定这是处理兄弟国家、兄弟党之间关系的一个根本原则。任何一个党都不应当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都不应当以“父子党”的态度对待兄弟党，都不应当干涉兄弟党内部事务，都不容许在另一个兄弟党内制造分裂活动。在讲到中苏两党关系时，列举一系列事实指出中苏分歧的来历，说明：（一）中苏关

①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905页。

系的严重化，是由于苏联同志在处理某些有关问题上违反了相互关系中平等和协商的原则。（二）中苏分歧的实质，关系到是否完全遵守一九五七年莫斯科宣言的问题。（三）我们诚恳地希望苏联同志能够有勇气允许和接受兄弟党提出的一些正确的善意的批评。（四）中苏分歧仍然是局部性的问题。发言共4个小时，全场肃静，气氛紧张。[①]

11月24日，邓小平在81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第13次全体会议上作第二次大会发言。提出：昨天赫鲁晓夫的发言，支持了所有那些对我们的攻击和污蔑。这种严重情况，使我们不能不作第二次发言。发言集中答复两个问题：（一）究竟我们是坚持了还是违反了莫斯科宣言？（二）究竟我们的立场是为了维护团结还是威胁着团结？指出：现在这个《草案》中所谓派别活动、集团活动和“民族共产主义”的话都是为反对中共的运动制造合法根据的。《草案》中一字不提兄弟党之间平等协商的关系，全面肯定苏共二十大、二十一大对于所有兄弟党的意义，实际上是把一个党的决议强加于其他兄弟党，肯定了兄弟党之间的不平等的关系。所有这些都是不利于团结的。难道不写上这些，我们就不能共同反对帝国主义？恰恰相反，消除这些障碍，我们就能够得到一个一致同意的文件，我们的团结就会巩固起来，我们的共同事业就会得到更顺利的发展。[②]

由于中共代表团采取了坚定的态度，并进行了会内会外的斗争，《声明草案》作出重要修改，会议取得较好结果。12月1日，81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举行闭幕大会。会议通过《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公报》《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

①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596—1597页。
②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599—1600页。

明》《告世界人民书》。刘少奇代表中共代表团在会上讲话并签字。

12月2日，邓小平在苏共中央招待宴会上代表中共代表团所作的讲话中，对这次会议的成果进行了总结和评价。他指出：继一九五七年宣言之后，我们又有了一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行动的纲领。我们的敌人天天希望我们不团结，特别是中苏两党不团结，这次会议的结果和文件的公布，回答了它们的目的永远达不到，我们的共同事业一定要胜利。[①] 当日，邓小平率中国党政代表团部分成员回国。

回国后，邓小平又在两次会议上介绍了81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所取得的结果。12月7日，他在周恩来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关于莫斯科81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情况的报告。在介绍完会议情况后指出：整个会议的结果，（一）揭开盖子，破除迷信。尽管那么气势汹汹的围攻，但最终我们敢于批评赫鲁晓夫，敢于批评苏共，这一件事情是震动的。这个会议不能不对今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影响。（二）整个文件应该说是比较好，内容有利于我们进行斗争。虽然文件其中还有模糊的地方，各有各的利用，但整个我们能够利用的多。（三）最大的收获，这次确立了“通过协商取得一致”的原则。[②]

1961年1月14日，邓小平在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全体会议上所作的《关于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报告》中又指出：这次会议规模之大，时间之长，斗争程度之激烈，都是空前未有的。这场斗争最大的特点是

①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602页。
②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603—1604页。

由全世界最有威信的中苏两个大党为代表。斗争的性质是坚持和保卫马列主义根本理论阵地，坚持马列主义和莫斯科宣言的革命旗帜。会议结果：（一）总的来说是好的，是一个革命的文件。（二）揭开盖子，破除迷信。（三）对于锻炼马列主义队伍发生了深远影响。（四）确立“一致协商”的原则。[①]

1963年7月，毛泽东再次点将邓小平为团长，率中国代表团去莫斯科与苏共中央举行会谈。自7月6日至20日，中苏两党进行了9次会谈。在7月8日的第二次会谈中，邓小平作了近5小时的发言，系统阐述中苏两党分歧的由来和实质。并指出：苏共近一个月来打着停止争论的幌子来加剧公开争论，采取武断的、毫不讲理的态度对待中共提出的积极建议，并进一步把两党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②] 在7月12日的第四次会谈中，邓小平发言阐明中苏两党分歧集中表现在两个重大问题：（一）要不要革命；（二）要不要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指出：在一系列问题上，苏联搞的是分裂主义而不是国际主义。[③] 在7月19日的第八次会谈中，邓小平提出：中苏两党存在严重的分歧。特别是从七月十四日《真理报》发表《苏共中央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以后，苏联的报纸、刊物纷纷攻击中国共产党。在这种情况下，两党就某一些问题达成协议已不可能，甚至连保证会谈在平静的气氛中进行也难以做到。因此，他代表中共代表团提出建议：中苏两党会谈暂时告一段落，休会到另一个商定的时间再举行。[④] 在7月20日的第九次会谈中，苏斯洛夫表示接受邓小平关于暂时停止谈判的建议，并拿

---

①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612—1613页。
②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763—1764页。
③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764页。
④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765页。

出苏方起草的两党会谈公报稿征求意见。休息后，邓小平向苏方提出对公报稿的意见，建议双方指定两人商量修改。后指示参加修改的吴冷西：不要说“友好的、同志式的气氛”，按中央复电的指示，改为“各自阐述自己的观点”。删除“两党一致同意停止公开争论”。只讲“会谈暂告一段落，以后再继续举行会谈，会谈的时间、地点另定”。[①] 当晚，邓小平在赫鲁晓夫为中共代表团举行的宴会上，针对赫鲁晓夫提出的中苏两党之间没有严重的分歧，分歧是臆造的说法，指出：不同意这样的说法。只有认清分歧的性质，才有可能找到克服分歧的途径。提出希望下次会谈在北京举行。[②]

此次会谈由于双方分歧较大，谈判最终破裂。7 月 21 日，邓小平率代表团回到北京，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等领导人以及首都各界五千多人的热烈欢迎。代表团刚走下舷梯，毛泽东率先走上前去，与邓小平亲切握手，并与代表团成员在飞机前合影留念。

中苏谈判破裂后，两党全面论战达到白热化。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邓小平的直接领导下，1963 年 9 月至 1964 年 7 月，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组陆续写出了 9 篇评论苏共《公开信》的文章（后通称为“九评”）。1966 年 3 月，中苏两党关系正式中断。

时隔十几年后，邓小平对这场论战进行了反思和评价。1983 年 11 月 6 日，他在同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希尔和夫人谈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论战时说：“大论战我们发表了九篇文章，这些工作我都参加了。从现在的观点看，好多观点是不对的。我们的错误不在个别观点，个别观点上谁对谁错很难讲，应

①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765—1766 页。
②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766 页。



该说，我们的许多观点现在看还是正确的。我们的真正错误是根据中国自己的经验和实践来论断和评价国际共运的是非，因此有些东西不符合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原则。主要是这个问题。至于这个观点、那个观点，都可以争论。”①

1989 年 5 月 16 日，邓小平在会见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时说：“从一九五七年第一次莫斯科会谈，到六十年代前半期，中苏两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我算是那场争论的当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一九六三年我率代表团去莫斯科，会谈破裂。应该说，从六十年代中期起，我们的关系恶化了，基本上隔断了。这不是指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这方面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②

在这场论战中，邓小平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后来在同一些来访的外国党客人会谈时，几次提到他当初在中苏论战中所起的作用。1983 年 1 月 11 日，他在会见墨西哥统一社会党代表团时说：五六十年代中苏两党会谈我是一直参加的，多数是我当团长。③同年 4 月 29 日，他在会见印度共产党（马）中央代表团时又说：同苏联打交道，我打得多了，我七次去莫斯科。同苏联谈判，中国党代表团差不多都是我出面的。④ 这些谈话都实事求是地反映了邓小平在中苏论战中所发挥的重大作用。

邓小平在中苏论战中的重要作用得到了毛泽东的充分肯定，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1972 年 8 月 14 日，毛泽东在邓小平 8 月 3

---

①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944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91、294—295 页。

③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880 页。

④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905 页。

日要求出来工作的信上所做的批示中，列举了邓小平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没有历史问题、协助刘伯承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等民主革命时期的历史事实之后，又专门说："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作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①] 邓小平从 1952 年 7 月开始参加中共中央的领导工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展开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毛泽东在邓小平进城后 20 年的工作中特别提到他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没有屈服于苏修，可见这件事在他心中的分量和位置。也正是这个批示加速了邓小平 1973 年的复出。

中苏论战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也严重影响了我们党对国际国内形势的判断和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但通过中苏论战我们树立了独立自主的大国形象，这对我国后来发展的影响同样是重大而深远的。正如江泽民在纪念毛泽东诞辰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从近几年来国际风云的变幻中可以更加清楚、更加深刻地看到，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坚持独立自主，不倦地探索适合自己情况的道路，以及由此培养起来的自强自立、不依附于人、不怕鬼、不信邪的精神，对于维护国家的主权和民族的尊严，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发挥着多么重大的作用！"[②] 这其中无疑有邓小平在毛泽东领导下所作出的功绩。

①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961 页。

② 《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608 页。

第十四章
DI SHI SI ZHANG “文革”岁月

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两次受到错误批判和斗争，并被撤销一切职务，经历了他革命生涯中最艰难、最曲折的时期。在江西蹲点期间，他在参加劳动之余阅读了大量马列著作和古今中外的书籍。林彪事件后，毛泽东有意让邓小平出来工作，他于1973年恢复了国务院副总理职务。1974年他代表中国政府在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上发言，系统阐述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在筹备四届人大和酝酿国务院领导人选时，毛泽东评价他“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1975年，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党、国家和军队日常工作，对“文化大革命”以来所造成的严重混乱局面进行大刀阔斧的整顿，收到显著成效，得到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毛泽东因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10月6日，“四人帮”被粉碎，“文化大革命”结束。邓小平再次迎来政治转机。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不久，邓小平即被打倒，受到错误批判和斗争，并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在他的政治生涯中，又一

次受到严重挫折。

邓小平在被打倒后，特别是面对大字报对他的污蔑诽谤和造反派对他的批斗，很不平静，在1967年几次提出见毛泽东的请求，想当面向毛泽东澄清自己的问题。4月3日，致信毛泽东，表示近日看了戚本禹的文章，[①]觉得自己所犯错误的性质似已确定，迫切想求见主席。5月，在家里对受毛泽东之托前来看望的汪东兴说：外面大字报中提出的许多问题与事实不符，要求同毛泽东当面谈谈。汪东兴回去后将邓小平的要求转报给毛泽东。7月9日，致信毛泽东，请求见毛一面。7月29日，致信汪东兴，求见毛泽东；后又致信毛泽东，请求面谈。9月18日，致信汪东兴，再次提出见毛泽东的要求。汪东兴将信转呈毛泽东。[②]

1967年5月的一天深夜，邓小平被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接到毛泽东处谈话，直到天快亮时才回家。谈话当中，邓小平向毛泽东详细汇报三十年代离开红七军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的情况，并表示接受毛泽东对他和刘少奇派工作组“错误”的批评。在询问以后如有事情向毛泽东汇报找谁时，毛泽东回答说可以找汪东兴，也可以给他本人写信。在毛泽东询问对即将在九大被确定为接班人的林彪的看法时，邓小平未表态。[③]

邓小平被打倒后，毛泽东在不同场合多次就邓小平的问题作过表态。在这些谈话和批示中，毛泽东一方面认为邓小平所犯错误是严重的，要批；但同时又坚持对邓小平要保。毛泽东多次提到刘、邓要分开。1967年5月，汪东兴受毛泽东之托前来看望邓

---

① 指1967年4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的戚本禹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文中，刘少奇被诬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小平也被诬为“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党内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②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937—1939页。

③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937页。

小平并转达毛泽东的三条意见，其中一条就是刘、邓可以分开。[①] 9 月 16 日，毛泽东在杭州同浙江省军管会负责人谈话时提到，邓小平和刘少奇还是有区别。[②] 9 月 19 日，毛泽东在武昌同杨成武、张春桥、汪东兴、余立金谈到召开中共九大的问题时提到：选中央委员，刘、邓是不是有区别？我看是应该有区别。邓小平打过仗。[③] 9 月 24 日，毛泽东在召集周恩来等开会谈到召开中共九大问题时又说：刘少奇、邓小平要有区别。[④] 10 月 9 日，毛泽东在审阅陈伯达、江青关于选编《刘少奇言论》的报告及所附此书的《出版说明》稿时，把《说明》中的“他伙同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小平”一句改为“伙同其他一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删去另一处同刘少奇并列的邓小平的名字。批示：“《说明》中，不提邓小平。是否妥当，请酌定。”[⑤] 11 月 5 日，毛泽东在与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有关中共九大和整党问题时说：邓小平要批。我的意见还要把他同刘少奇区别一下。怎样把刘、邓拆开来。[⑥] 1968 年 10 月 31 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中说：邓小平，大家要开除他，我对这一点还有一点保留。我觉得这个人嘛，总要使他跟刘少奇有点区别，事实上是有些区别。我这个人的思想恐怕有点保守，不合你们的口味，替邓小平讲几句好话。[⑦] 1969 年 3 月 12 日，毛泽东在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开会讨论九大政治报告起草问题时说：我历来不主张把邓小平同刘少奇弄到一

---

①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937 页。
②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939 页。
③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939—1940 页。
④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940 页。
⑤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941 页。
⑥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941 页。
⑦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946 页。

起。22日，毛泽东在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九大准备工作时再次表示：九大报告上只写我和刘少奇的名字。邓小平与刘少奇要有区别。[①] 4月23日，毛泽东在中共九大主席团扩大会议的讲话中对预选名单作说明和解释时说：邓小平与刘少奇要有区别。[②] 1971年9月10日，毛泽东在同浙江省委负责人谈到党的历史问题时又说：邓小平不同于刘少奇，要有区别。[③]

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多次肯定邓小平的历史功绩。如1967年9月20日谈到：邓小平恐怕要保。一个，他打过一些仗。第二，他不是国民党的人。第三，他没有"黑修养"。[④] 1968年10月13日谈到：邓小平这个人，我总是替他说一点话，就是鉴于他在抗日战争跟解放战争中间都是打了敌人的，又没有查出他的别的历史问题来。[⑤] 1971年9月10日又谈到：百万雄师过大江，当时有个前委，主要还是邓小平起作用的。[⑥]

除了肯定邓小平的功绩，毛泽东还驳斥一些人对邓小平的污蔑。1968年6月30日，毛泽东说：对邓小平，我的观点还是一样。有人说他与敌人有勾结，我就不太相信。你们那样怕邓小平，可见此人厉害。[⑦] 在1972年1月10日陈毅追悼会上，毛泽东把邓小平的问题定性为人民内部矛盾。[⑧] 毛泽东的这些表态，使林彪、江青等欲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开除邓小平党籍、把邓小平置于死地的图谋未能得逞。

---

①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947页。
②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947页。
③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955页。
④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940页。
⑤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946页。
⑥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955—1956页。
⑦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944页。
⑧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958页。

作为一名有着坚定信念、久经考验的大政治家，即使身处险恶环境，邓小平仍然表现出相当的从容镇定，努力争取解决自己问题的机会。他在1968年六七月间写出的《我的自述》中表示：我的最大的希望是能够留在党内，做一个普通党员。我请求在可能的时候分配我一个小小的工作，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给我以补过自新的机会。[①] 11月4日，邓小平在致汪东兴的信中表示：我最大的希望是，能够继续留在党内，做一个普通党员。如果可能的话，请党分配给我一个小小的工作，或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②] 1969年5月3日，他在致汪东兴并请转报毛泽东、林彪和中共中央的信中再次表示：“我本人的最大要求是能够留在党内，使我能有机会，以一个普通党员的身份，执行新党章的规定，在我的余年中，努力做好党分配给我的工作，或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不断地用毛泽东思想来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尽力做一些有利于人民的事情，以求补过于万一。”[③]

尤为可贵的是，即使身处逆境，邓小平在为他人写证明材料时，仍坚持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原则。1967年11月3日，他就卫生部三个“造反派”组织要求交代“如何包庇、重用、提拔”钱信忠问题，致信汪东兴，对“揪斗钱信忠小组”所提问题说明如下：“十多年来，钱信忠同二野的工作历史关系是很久的。我们，主要是我，对他是信任的。我和其他一些负责同志长期认为，他在主持卫生工作方面是较有能力的。他的外科手术在当时条件下是难得的。他的工作，特别是战场救护工作是努力的。所以我过去对他的总的看法是小毛病很多，但大的方面还好，对战

①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944页。
②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946页。
③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948页。

争是有功绩的。钱信忠当卫生部长是总理提出来商量的，我是赞成的。对钱信忠任卫生部长事，我同安子文没有什么密谋。”[1] 12月28日，邓小平就要求回答有关魏文伯[2]工作调动和任职等问题致信汪东兴：我对魏文伯的情形是不甚了解的，他的历史问题我不清楚。对他历次工作调动，都不是由我提出的，其过程查档案当可了解。[3]

1969年10月，邓小平被下放到江西省新建县。在那里，他度过了三年零四个月的时光。临走前，邓小平向汪东兴提出，到江西后有事情给汪写信，请汪帮助做几个木箱子把家中的藏书带到江西。江西方面一开始准备把邓小平夫妇安置在赣州，周恩来得知后向江西方面提出：把邓小平夫妇安排在赣州不妥，那里交通不便，山区条件差。应安排在南昌市郊为宜，并住两层楼房，独家独院，便于照顾和保证安全。据此，江西省革命委员会重新调整方案，拟定将邓小平夫妇安置在南昌市郊。[4]

10月21日，邓小平致信汪东兴表示：保证遵循主席教导，小心谨慎，以一个普通党员和社会主义公民的身份，尽力工作和劳动。10月22日，在专案组两名工作人员监护下，邓小平和卓琳从北京沙河机场乘伊尔-14型军用飞机去江西南昌。中午，到达南昌，住滨江招待所。10月24日，专案组工作人员同江西省有关人员一起，选定南昌市郊新建县望城岗原福州军区南昌陆军步兵学校校长住宅作为邓小平一家的住所，并选定附近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作为邓小平夫妇的劳动地点。10月26日，邓小平

---

①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941页。

② 魏文伯，“文化大革命”前曾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政法委员会副主任、中央人民政府司法部副部长、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等职。“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

③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942页。

④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949页。

和卓琳离开南昌市滨江招待所，到达新建县望城岗住所住下。11月9日，邓小平到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参加劳动。先被分配清洗零件和看图纸，后根据他本人的要求，被安排做钳工，用锉刀加工零件。①

11月26日，邓小平致信汪东兴，谈到南昌后劳动和生活情况说："十一月九日，我和卓琳就开始到工厂劳动。每天上午六时半起床，七时三十五分由家动身，二十几分钟就走到工厂，在厂劳动大约三小时半，十一时半由厂回家，吃午饭后睡睡午觉，起来后读毛选（每天力求读一小时以上）和看报纸，夜间听广播，还参加一些家务劳动，时间也过得很快。""我们是在新建县（南昌市属，距南昌二十余里）县办的一个拖拉机修造厂劳动。这个厂原是县的拖拉机修理站，现扩大为修理兼制造的厂，全厂八十余人，除劳动外，还参加了两次整党会议和一次大干年终四十天的动员大会。""厂里职工同志对我们很热情，很照顾，我们参加的劳动也不重。"随信还附有一便条，请汪安排人将在北京家里的一些衣物和图书托运来江西。便条说："来江西时，因飞机超重，只带了一半东西来，还有一些衣物和书籍没有来，书籍差不多全未来，原说由火车托运，至今未到。如可能，请令有关同志查查，最好能运来，如决定留在北京，也请方便时告诉我们。"② 不久，这些衣物和图书运到江西。图书中除马列著作和毛泽东著作外，还有中外历史、文学、哲学、传记等方面的书籍。③

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江西庐山召开。会议期间，林彪、陈伯达等人发起突然袭击，鼓吹"天

①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949—1950页。

② 《邓小平自述》，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版，第148页。

③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950—1951页。

才论”，坚持设国家主席，进行抢班夺权活动。8 月 31 日，毛泽东写下《我的一点意见》一文，揭露陈伯达等人的阴谋活动。会后，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批陈整风运动。从广播中得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召开的消息后，邓小平于 9 月 13 日致信汪东兴，并请汪东兴转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表示拥护九届二中全会公报的各项决议和号召，自己绝不做不利于党和人民的事情。毛泽东阅后，批转林彪、周恩来、康生阅。[①]

1971 年 9 月 13 日，林彪集团策动的反革命武装政变阴谋败露。林彪、叶群和儿子林立果等乘坐飞机仓皇出逃，摔死在蒙古境内温都尔汗。9 月 18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10 月 6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林彪集团罪行的材料。10 月 24 日，这几个文件的传达扩大至全国基层群众。11 月 5 日，邓小平被通知去工厂听取传达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及其反党集团的罪行材料。考虑到邓小平听力不好，工厂负责人让他把文件带回家自己看。[②]

11 月 8 日，邓小平就林彪事件、陈伯达问题等给毛泽东写信，报告自己来江西后的情况，表达希望出来工作的愿望。信中说：林陈反革命集团这样快地被揭发被解决，真是值得庆幸的大事。如果不是由于主席和中央的英明的领导和及早的察觉，并且及时地加以解决，如果他们的阴谋得逞，正如中央通知所说，即使他们最终也得被革命人民所埋葬，但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我们社会主义祖国会遭到多少曲折和灾难。现在终于解除了这个危险，我和全国人民一道，是多么的高兴呵！我在主席的关怀下，到江西来整整两年了。这两年，我每天上午到工厂劳动，下

①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953 页。
②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956 页。

午和晚上，看书、看报、听广播和做些家务劳动。除到工厂外，足不出户，与外界是隔绝的。我们的生活，由于组织上的照顾，没有什么困难。我个人没有什么要求，只希望有一天还能为党做点工作，当然是做一点技术性质的工作。我的身体还好，还可以做几年工作再退休。毛泽东阅信后在信封上批示：“印发政治局。”①

林彪反革命政变阴谋被粉碎后，毛泽东有意让邓小平出来工作，邓小平的政治处境随之有所好转。1972年2月，中共中央恢复他的党组织生活。8月3日，邓小平到拖拉机修配厂参加全体职工会议，第四次听取关于林彪反党集团罪行材料的传达。当天致信毛泽东，揭发林彪、陈伯达，并再次表达出来工作的愿望。信中说：对于林彪和陈伯达，没有什么重要材料可以揭发，只能回忆一些平时对他们的感觉。对林彪，觉得他是一个怀有嫉妒心和不太容人的人。对于林彪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现在看来，他的确是为的打着红旗反红旗，是准备夺权。过去在两点上我一直是不同意的。一是林彪只强调“老三篇”，多次说只要“老三篇”就够用了。我认为毛泽东思想是一切领域中全面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只讲“老三篇”，不从一切领域中阐述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就等于贬低毛泽东思想，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一是总觉得林彪的提法是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割裂开来，这也是同样贬低了毛泽东思想的意义，特别是损害了毛泽东思想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反对国际修正主义运动中的作用。对陈伯达，印象是，这个人很自负，很虚伪，从来没有自我批评。他会写东西，对于能写的别人，他是嫉妒的。我同全党全国人民

---

①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956—1957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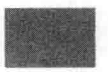
一道，热烈地庆祝摧毁了林彪反党反革命集团的伟大胜利。在去年（1971 年）11 月我在呈给主席的信中，曾经提出要求工作的请求。我是这样认识的：我在犯错误之后，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接触已经五年多快六年了，我总想有一个机会，从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经 68 岁了，还可以做些技术性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工作七八年，以补过于万一。[①] 这封信连同 1971 年 11 月邓小平给毛泽东的信，对促成他 1973 年复出起了重要作用。

8 月 14 日，毛泽东在邓小平来信上批示："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二）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作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当晚，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毛泽东的批示内容。[②] 毛泽东的批示，成为邓小平复出的主要依据。12 月 18 日，周恩来在致纪登奎、汪东兴的信中提出："邓小平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③] 正是以毛泽东的表态为依据的。

临复出之前，邓小平到井冈山、赣州、景德镇等地进行了视

---

①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959—1960 页。
②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961 页。
③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969 页。



察，实地了解到许多真实情况。1972年11月13日，邓小平在离开茅坪时，对井冈山地方负责人说，你们在这里很辛苦，过去毛主席在这里干革命时很穷，现在还是穷，以后会好的。12月6日，他听到当地干部介绍兴国是个贫困地区，水土流失严重、农民生活十分困苦时，表情凝重。12月11日，在瑞金谈话时说，解放后我们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和西方国家比起来，我们最少落后40年，还需要努力。[①] 这些话反映了他在江西期间对国家建设大事的思考。

此后不久，邓小平正式复出。1973年2月回到北京。3月9日，毛泽东审阅周恩来报送的中共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稿，批示：“同意。”周恩来在报告中说：“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问题，政治局会议几次讨论过，并在主席处开会时报告过。邓小平同志已回北京。为在全国树立这样一位高级标兵，政治局认为需要中央作出一个决定，一直发到县团级党委。”《决定》稿说：“一九七二年八月十四日，在邓小平同志写给主席的一封信上，毛主席作了重要批示。中央政治局认真讨论了毛主席的批示和邓小平同志的问题。遵照批示精神，中央决定：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恢复他的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由国务院分配他担任适当的工作。”此件次日发出。[②]

3月29日，邓小平到毛泽东处谈话。同毛泽东见面握手时，毛泽东说：“努力工作，保护身体。”毛泽东问起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回答说：“等待。”这是两人分别6年后的第一次会面。[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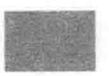
①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962、1964、1967页。
②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972页。
③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973页。

晚9时，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邓小平参加。会议决定：邓小平正式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外事活动；有关重要政策问题，邓小平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30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报告政治局会议所议上述事项，毛泽东批示同意。邓小平正式恢复国务院副总理工作。4月12日，邓小平出席周恩来为欢迎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视察柬埔寨解放区后回到北京举行的盛大宴会。这是他自“文化大革命”被打倒后首次在公开场合同中外人士见面。[①]

在江西的三年多时间，是邓小平非常重要的人生经历。在寂然的等待中，邓小平保持着与中共中央的联系，并通过看报、听广播时刻关注着国内政局的走向。在这期间，他直接感受到了基层社会的情况和人民群众的意愿与要求，阅读了大量马列著作和古今中外的书籍，并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众所周知的“邓小平小道”，就是他勤于思考的见证。正因如此，邓小平复出后对世情、国情的判断和分析完全没有落伍。1973年11月下旬至12月上旬，他在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多次召开的会议上，分析当前中美、中苏、美苏之间战略关系时提出：看待国际关系和国与国关系，不能凭一次谈判和某一句话来进行判断，关键要看大的形势。目前来看，要讲打仗，各方都还没有准备好，特别是美苏两家自己没有准备好。[②]这是对国际形势很精到的分析。在对国情的判断分析上，他多次强调中国人口多，经济还很落后，是发展中国家。这些观点都表现出他的智慧和远见卓识。

---

①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974页。
②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990页。



邓小平复出之初，主要工作是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外事活动。在1973年8月24日至28日召开的中共十大上，邓小平当选为中央委员。12月12日，毛泽东在他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我和剑英同志请邓小平同志参加军委，当委员。是不是当政治局委员，以后开二中全会追认。当晚，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毛泽东关于邓小平任职的意见等问题，一致赞成毛泽东的意见，同意邓小平列席政治局会议和参加政治局工作，作为政治局委员，将来提到中共十届二中全会追认，并补为军委委员，参加军委和军委办公会议的工作。[①] 12月22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和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中共中央发出通知：邓小平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待十届二中全会开会时追认；邓小平任中央军委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②]

1974年，邓小平暂管体委工作，并作为军委6人小组成员，参加讨论处理军委大事及紧急作战事项，但他的主要工作仍是协助周恩来分管外事，并于4月10日代表中国政府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发言，系统阐述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在国际上产生巨大影响。

随着20世纪70年代初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中国对外关系的发展，毛泽东对国际格局有了新的认识。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和思考，他于1974年2月在同赞比亚总统卡达翁谈话时，初次提出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③]

3月20日，毛泽东通过王海容转告周恩来：由邓小平担任将

①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991页。

②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993页。

③ 这一思想的基本点详见《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600页。

在4月召开的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但暂不要讲是我的意见，先由外交部写请示报告。22日，外交部向周恩来送呈《关于参加特别联大的请示报告》，建议由邓小平任团长。[①] 3月24日至27日，周恩来连续几天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外交部根据毛泽东提议提出的由邓小平担任出席联大特别会议代表团团长的报告。会上，江青以“安全问题”和“国内工作忙”为由，反对邓小平担任代表团团长。24日，周恩来批示同意外交部的报告，并送毛泽东和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传阅。江青阅后表示反对，并要求外交部撤回报告。25日，毛泽东了解此情况后，派人转告周恩来：邓小平出席联大，是我的意见，如政治局同志都不同意，那就算了。周恩来当即表示：完全同意毛主席的意见。并将此意见转告中央政治局其他成员，特别要在场的王洪文负责向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转达毛泽东的意见。在26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除江青外，与会成员均表示同意由邓小平率团出席联大会议。周恩来要王海容、唐闻生将会议情况报告毛泽东。27日，毛泽东写信批评江青：“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提议。”当晚，在中央政治局主管批林批孔运动的7人小组会议上，江青勉强同意由邓小平率团参加联大特别会议。会后，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大家一致拥护主席关于小平同志出国参加特别联大的决定。小平同志已于27日起减少国内工作，开始准备出国工作。”“小平等同志出国安全，已从各方面加强布置。4月6日代表团离京时，准备举行盛大欢送，以壮行色。”[②]

从3月底到4月初，邓小平开始着手赴联大的各项准备工

①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004页。
②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005—2006页。

作，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工作是起草联大特别会议发言稿。在讨论发言稿初稿时，邓小平指示讲话稿的结束语要写上“中国现在不称霸，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如果中国有朝一日，变了颜色，变成一个超级大国，也在世界上称王称霸，到处欺负人家，侵略人家，剥削人家，那么，世界人民就应当给中国戴上一顶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就应当揭露它，反对它，并同中国人民一道，打倒它”。①

4 月 3 日，邓小平和周恩来将联大特别会议发言稿第一部分第五稿报送毛泽东：“小平同志在特别联大的发言，经过小平同志同外交部同志的讨论和修改，小平同志在四月二日定了四稿。四月二日晚政治局会议上宣读和讨论了四稿的第一部分，又作了一些修改，成为五稿。这一部分为形势有六页，现先呈上，请予审阅。其他部分为原料和发展问题及我们的主张约九页，共为十五页。今（三日）晚政治局将继续宣读和讨论其他部分，可修改好明（四日）呈阅。”毛泽东当日圈阅。4 月 4 日，邓小平又和周恩来将在联大特别会议上的发言稿（六稿）报送毛泽东。毛泽东当日阅批：“好，赞同。”②

4 月 6 日，邓小平率中国政府代表团乘专机离开北京前往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周恩来、叶剑英等，以及首都群众四千余人到机场送行。4 月 7 日，邓小平率中国政府代表团抵达纽约。

4 月 10 日，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发言，全面阐述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及我国对外政策。他说，现在的世界实际上存在着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着的三个方面、三

---

①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008 页。
②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009 页。

个世界。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两个超级大国是当代最大的国际剥削者和压迫者，是新的世界战争的策源地。邓小平表示，中国政府和人民赞同和支持第三世界国家要求改变目前不平等的国际经济关系的主张和合理的改革建议。他最后强调：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中国政府和人民，一贯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斗争，这是我们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①] 邓小平的讲演引起世界各国的高度关注，特别引起第三世界国家的强烈反响和热烈欢迎。各国媒体对此做了大量报道和评论。

10 月 4 日，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王洪文给在武昌休养的毛泽东写报告，提出政治局近期拟以准备四届人大为中心工作。毛泽东圈阅了这个报告。同日下午，毛泽东要秘书打电话给王洪文，提议邓小平在四届人大上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并要王洪文向政治局传达这个意见。王洪文没有立刻向周恩来、叶剑英及其他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传达毛泽东的意见，却在当晚先向江青、张春桥、姚文元 3 人进行了通报。[②]

江青一伙为阻挠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企图借“风庆轮”事件扳倒周恩来和邓小平。10 月 14 日，江青在 13 日新华

①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012 页。
②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053—2054 页。

社内部刊物《国内动态清样》有关“风庆轮”事件[1]的报道上批写大段批语，称：“试问，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部？国务院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关，但是交通部确有少数崇洋迷（媚）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这种洋奴思想、爬行哲学，不向它斗争可以吗？”还提出：“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个表态，而且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康生等先后批示，表示完全同意江青的意见，要求抓住“风庆轮”问题，进一步批判修正主义路线，对交通部进行彻底检查整顿。邓小平圈阅了江青要求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传阅的批件。[2]

10 月 17 日，江青等人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所谓“风庆轮”事件逼迫邓小平表明意见。张春桥、姚文元跟着一起攻击邓小平。在江青质问对风庆轮问题是什么态度时，邓小平回答：文件我已经圈阅了。对这个材料还要调查一下。在江青逼问对批判“洋奴哲学”是什么态度时，邓小平驳斥：政治局开会讨论问题要平等嘛，不能用这样的态度对人嘛！并反问：这样政治局还能合作？强加于人，一定要写出赞成你的意见吗？在江青大闹会场时说：问题还没有了解清楚，就戴了这么大的帽子，这会怎么开！随即愤然退出会场。[3] 当夜，江青召集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密谋。江青提出要王洪文尽快去长沙向毛泽东告邓小平和周

---

① 风庆轮是一艘国产万吨级远洋货轮，这一年出航罗马尼亚，国庆前夕返回上海港。江青等利用此事指责国务院，说国产万吨级轮船早就该远航，就因为修正主义路线造成的阻力，致使万吨级轮船没有及早远航。交通部所派在风庆轮上工作的两名干部，拒绝将交通部作为“崇洋媚外”“卖国主义”加以批判，并对“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亲信表示不满，被定性为“反动政治事件”。船到上海后，王洪文下令把交通部派往风庆轮工作的一名干部扣留在上海，进行批斗，并责令交通部严厉处理。

②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056—2057 页。

③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058 页。

恩来的“状”。

10月18日，王洪文背着周恩来、邓小平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乘飞机到长沙报告毛泽东：为“风庆轮”的事，江青和邓小平在政治局会上发生争吵，吵得很厉害。看来，邓还是搞过去“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那一套。又说：邓有那样大的情绪，是与最近酝酿总参谋长人选一事有关。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周总理虽然有重病，但昼夜都忙着找人谈话，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他们来往这样频繁，是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王洪文还向毛泽东吹捧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毛泽东识破了他们的阴谋，当即批评王洪文说：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要跟小平同志搞好团结。① 此后不久，毛泽东再次当着王洪文的面，称赞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②

10月20日，毛泽东在长沙听取王海容、唐闻生有关“风庆轮”问题的汇报后说：“风庆轮”的问题本来是一件小事，而且先念已经在解决，但是江青还这么闹。他指示王、唐二人回京后转告周恩来和王洪文：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如果他身体可以，由他和王洪文一起跟各方面商量，提出一个人事安排的名单。邓小平任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这是叶剑英的意见，我赞成照他的意见办。战时有事，平时无事，挂个名。杨成武可以做个副总长。王洪文来的时候没有这样明确，再明确一下。③

11月12日，邓小平在长沙陪同毛泽东会见外宾后，当面向毛泽东反映了10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争论情况。在毛泽

---

①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058—2059页。

②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076页。

③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060—2061页。

东表示对江青强加于人的做法不满，赞同邓小平开了一个“钢铁公司”时表示：我实在忍不住了，不止一次了。她在政治局搞了七八次了。我主要是感觉政治局的生活不正常，最后我到她那里去讲了一下，“钢铁公司”对“钢铁公司”。并表示：最近关于我的工作的决定，主席已经讲了，不应再提什么意见了。但是看来责任是太重了一点。毛泽东说：没办法呢，只好担起来喽。找几个人帮帮忙。我们这个党内也复杂呢，不要紧。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总参谋长没有事做，但出了危险，就有事做了。①

11 月下旬，邓小平根据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意见，主持起草周恩来准备在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稿。邓小平指示把报告稿限定在 5000 字以内；把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四个现代化目标再次写入报告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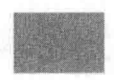
12 月 17 日，邓小平在长沙陪同毛泽东会见外宾后，同毛泽东就《政府工作报告》稿进行了长时间谈话，对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提出许多重要观点。邓小平说：工业 10 年来增加了 1.9 倍，每年递增百分之十一点几，这个数目还可以。报告想提出到 1985 年钢达到 5500 万吨左右，粮食达到 7500 亿斤左右。毛泽东说：钢 5500 万吨太多了。邓小平说：到 1985 年恐怕就 10 亿人口了。毛泽东说：人口非控制不可。邓小平说：政府工作报告不超过 5000 字，现在只有 4900 字，不超过主席的规定。毛泽东问：国际部分怎么样？邓小平说：我们研究了主席近来和外宾的谈话，报告中考虑用“革命和战争的因素都在增长”的提法。毛泽东说：天天讲缓和，天天准备打。邓小平说：战争的危险来自两个

①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066 页。

超级大国，主要来自苏联。毛泽东说：所以我说美国怕苏联。邓小平说：但最近挥舞战争大棒的是美国，石油问题和粮食问题，所以讲多了不好，还是说，来自两霸。不为美国开脱。毛泽东说：可以。谈到对外合作和贸易时，邓小平说：当然，我们什么也不搞，也可以发展，但是速度慢些。现在国际上没有哪个国家可以脱离国际范围，都是取长补短，包括美国。以后国际环境可能还能争取到5年，主要是美国不敢打，铺得很开，苏联很集中。我们要利用这5年时间，不能耽误。归根到底就是主席讲的要安定团结。搞建设不安定不行。我觉得主要的关键是要有稳定的、有威信的省委，要能够发号施令，大家都听，当然要发得对。这么大的国家，都靠中央不行。现在下边议论，大家不安，大家感到乱哄哄的。比如，搞科研的绝大多数没有做什么事，不是说群众不要求工作，是没有办法。旷工不是个别的，少数的，而是相当大量的，但这并不等于工人群众对现状满意。总的意见是，这几年认真抓一下生产，鞍钢这样的地方要搞好。毛泽东说：要先念、余秋里、你合作。邓小平说：这个不成问题。恐怕还是革命和生产的位置怎么摆的问题。我看，不安定，生产搞不起来，主席讲8年了，这里包括怎样帮助省委树立威信。毛泽东说：你这个想法好。①

1975年1月5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发出1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1月8日至10日召开的中共十届二中全会，追认邓小平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在1月13日至17日召开的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邓

①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073—2074页。



小平被任命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周恩来病重后，在毛泽东支持下，邓小平主持党、国家和军队的日常工作。

重新走到中国政治舞台中心的邓小平，本着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高度负责的历史使命感，对"文化大革命"以来造成的严重混乱局面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顿。

1月25日，邓小平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机关团以上干部会上作了军队要整顿的讲话，提出军队的总人数要减少，编外干部太多要处理，优良传统要恢复，要提高党性，消除派性，要加强纪律性。[①] 由此拉开了全面整顿的序幕。

邓小平以铁路交通作为经济整顿的突破口。3月5日，他在全国工业书记会议上发表讲话，指出全党要讲大局，要为到20世纪末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在谈到怎样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时，邓小平指出当前的薄弱环节是铁路。铁路运输的问题不解决，生产部署统统打乱，整个计划都会落空。解决铁路问题的办法，是要加强集中统一，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增强组织性纪律性，还必须反对派性。[②] 同日，中共中央发出当年9号文件《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邓小平的讲话和中央9号文件，成为指导铁路整顿的纲领。

经过4个月的整顿，全国铁路形势有了显著变化。一些派性严重的班子逐步形成安定团结的局面，主要干线恢复畅通，铁路运输生产大幅度提高，铁路基本建设步伐加快，铁路治安秩序有所好转。铁路整顿的成功，为其他行业的整顿树立了榜样，创造了经验。

---

①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0—11页。

②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5页。

5月29日，邓小平在钢铁工业座谈会上讲话。指出：把钢铁工业搞上去，重点要解决四个问题。第一，必须建立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钢铁生产搞不好，关键是领导班子问题，是领导班子软、懒、散。领导班子就是作战指挥部。搞生产也好，搞科研也好，反派性也好，都是作战。指挥部不强，作战就没有力量。领导班子问题，是关系到党的路线能不能贯彻执行的问题，因此我们首先强调要把领导班子解决好。第二，必须坚决同派性作斗争。对于派性，领导上要有个明确的态度，就是要坚决反对，要敢字当头。对坚持闹派性的人，该调的就调，该批的就批，该斗的就斗，不能慢吞吞的，总是等待。对于派性，还要发动群众起来共同反对。第三，必须认真落实政策。不仅要解决戴上帽子的那些人的问题，而且要解决他们周围受到牵连的人的问题。要特别注意那些老工人、技术骨干、老劳模，要把这一部分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第四，必须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执行规章制度宁可要求严一些，不严就建立不起来。①

会后，中央调整了冶金部领导班子，发出了题为《中共中央关于努力完成今年钢铁生产计划的批示》的13号文件，国务院也专门成立了钢铁工业领导小组。经过近一月的整顿，钢铁生产形势开始好转。

7月4日，邓小平对中央读书班第4期学员作了题为《加强党的领导，整顿党的作风》的讲话，指出：搞好安定团结，发展社会主义经济，需要加强党的领导，把我们党的优良作风发扬起来，坚持下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毛泽东同志讲军队要整顿，整个党也有这个问题，特别是在党的领导和党的作风方

---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11页。

面。[①] 7月14日，邓小平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作《军队整顿的任务》的讲话，提出军队整顿的任务就是整肿、散、骄、奢、惰五个字，要联系起来解决。在整顿中，还要加强干部学习，增强党性，反对派性，加强纪律性，发扬艰苦奋斗的传统作风。[②] 8月3日，邓小平又在国防工业重点企业会议上发表讲话。指出：第一，一定要建立敢字当头的领导班子。领导班子问题一定要抓紧解决，要找一些能够办事、敢于办事的同志来负责。主要是配备好一、二把手，一、二把手敢字当头，就可以把队伍带起来。第二，一定要坚持质量第一，特别是军工产品。没有必要的规章制度，质量难于保证，这方面要很好地整顿。第三，一定要关心群众生活。在这方面要做许多踏踏实实的工作。[③] 这些讲话对加强党的领导，促进军队整顿，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科技领域，7月中旬，邓小平派胡耀邦到中国科学院，对科技领域展开整顿。9月26日，他在听取胡耀邦作科学院工作汇报时，对《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给予充分肯定。指出，如果我们的科学研究工作不走在前面，就要拖整个国家建设的后腿。现在科研队伍大大削弱了，接不上了。一些科研人员打派仗，不务正业，少务正业，搞科研的很少。少数人秘密搞，像犯罪一样。陈景润就是秘密搞的。像这样一些世界上公认有水平的人，中国有一千个就了不得。说什么“白专”，只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好处，比闹派性、拉后腿的人好得多。现在连红专也不敢讲，实际上是不敢讲“专”字。科研工作能不能搞起来，归根到底是领导班子问题，不把领导班子弄好，谁来执行政策？领导班子，特

---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0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27页。

别要注意提拔有发展前途的人。对于那些一不懂行、二不热心、三有派性的人，为什么还让他们留在领导班子里？科研人员中有水平有知识的为什么不可以当所长？要让党性好的组织能力强的人搞后勤。要给有培养前途的科技人员创造条件，关心他们、支持他们。要后继有人，这是对教育部门提出的问题。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拖住了。提高自动化水平，减少体力劳动，世界上发达国家不管是什么社会制度都是走这个道路。科技人员是不是劳动者？科学技术叫生产力，科技人员就是劳动者！要解决教师地位问题。几百万教员，只是挨骂，怎么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毛主席讲消极因素还要转化为积极因素嘛！教育战线也要调动人的积极性。[1]

在教育领域，9月下旬至11月上旬，教育部根据邓小平“文化教育也要整顿”的指示，起草了《教育工作汇报提纲》。在《提纲》起草过程中，邓小平多次强调，教育工作关系到整个现代化的水平，今后25年发展远景，关键是我们教育部门要培养人。科学研究工作后续有人问题，中心是教育部门的问题。由于“四人帮”的干扰，《提纲》最终未能定稿，但《提纲》过程稿提出了教育整顿的具体措施。[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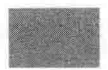
在文艺领域，邓小平强调文艺政策要调整，并批准解放了一批被江青一伙作为“毒草”而禁锢的电影、音乐。《创业》《海霞》和《长征组歌》等相继放映和演出。

在短时间内，邓小平主持的包括军队、工业、交通、科教、文艺在内的全面整顿，收到显著成效。由于这种整顿反映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愿望，代表了党的正确领导，因而得到了全国人民的

---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34页。

②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09页。



衷心拥护。这次整顿实质上是后来改革的实验。

对邓小平主持的1975年全面整顿，毛泽东一开始是支持的。在邓小平与"四人帮"围绕"反经验主义"和"评《水浒》"的斗争中，毛泽东批评了"四人帮"，支持了邓小平。但随着整顿的深入势必会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这是毛泽东所不能容忍的。

11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讨论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提出由邓小平主持作一个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总的看法是"文化大革命"基本正确，有所不足。这是毛泽东有意给邓小平一次机会，希望他就此妥协。但邓小平婉拒了这个建议，表示：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①]这令毛泽东很是失望。

11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打招呼会议，会上宣读了经毛泽东审定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要点》提出：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总是要翻案。[②] 26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传达到党政军各大单位负责人，要求他们进行讨论并将讨论情况上报中共中央。12月10日，中共中央又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将这个文件传达范围逐步扩大到基层。一场全国范围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开始了。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四人帮"发出种种禁令，

---

①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1—132页。

②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3页。

竭力阻挠群众性的悼念活动。在中央讨论由谁来为周恩来致悼词时，“四人帮”更是有意将邓小平排除在外。1月12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当张春桥提出由叶剑英在周恩来追悼会上致悼词时，遭到叶剑英反对。叶剑英提议由邓小平给周恩来致悼词，得到与会绝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同意。[①] 1月15日，已处于受批判地位的邓小平出席周恩来追悼大会，并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词。

2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宣布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自中共中央通知发出后，邓小平实际上被停止中央的领导工作。2月25日至3月初，中共中央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打招呼会议，传达经毛泽东批准、由毛远新整理的毛泽东自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多次谈话。其中，毛泽东点名批评邓小平说：小平提出“三项指示为纲”，不和政治局研究，在国务院也不商量，也不报告我，就那么讲。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他不懂马列，代表资产阶级。又说：他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要帮助他，批他的错误就是帮助，顺着不好。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会上，华国锋代表中央讲话提出：当前，就是要搞好批邓，批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错误路线；对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可以点名批判，但点名的大字报不要上街，不要广播、登报；注意不要层层揪邓小平在各地的代理人。[②] 3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的通知》和华国锋在打招呼会议上的讲话，“批邓”

---

①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43页。

②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47—148页。

问题在党内公开。

4月4日清明节，天安门广场发生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拥护邓小平的群众运动。“四人帮”乘机诬陷邓小平，毫无根据地认定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①] 4月4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江青等人的左右下，将天安门广场发生的群众运动定性为“反革命搞的事件”，“是邓小平搞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形成的”。[②] 4月7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一致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决议》还提出“保留党籍，以观后效”。这是他政治生涯中的第三次严重挫折。

9月9日，毛泽东逝世。10月6日晚，华国锋、叶剑英等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采取断然措施，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实行隔离审查，一举粉碎江青反党集团。“文化大革命”结束。邓小平再次迎来了政治转机。

①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50页。

②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49页。

第十五章 艰难复出

DI SHI WU ZHANG

粉碎“四人帮”后，要求邓小平复出的呼声日益高涨。在叶剑英、陈云等的积极推动下，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邓小平在全会上讲话说：作为一名老的共产党员，还能在不多的余年里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在我个人来说是高兴的。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应该老老实实地履行党员的责任，听从党的安排。

1976 年 10 月 7 日，也就是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二天，邓小平即从家属那里得知这一消息。10 月 10 日，邓小平致信汪东兴转华国锋并中共中央，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的果断行动，拥护党中央关于由华国锋担任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的决定。信中写道：“最近这场反对野心家、阴谋家篡党夺权的斗争，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后这样一个关键时刻紧接

着发生的，以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战胜了这批坏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是巩固党的伟大事业的胜利，这是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我同全国人民一样，对这个伟大斗争的胜利，由衷地感到万分的喜悦。”“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万岁！”[①]

粉碎“四人帮”后，叶剑英、李先念等老一辈革命家在不同场合呼吁，要求邓小平早日出来工作。华国锋觉得时机尚不成熟，采取了拖延的方针。10 月 26 日，他在听取中共中央宣传口负责人汇报时说：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天安门事件要避开不说；要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②] 但在内部则采取措施，逐步恢复邓小平的政治待遇。12 月 14 日，中共中央决定，恢复邓小平看中央文件的权利。邓小平看到的第一批文件是 12 月 10 日中共中央发出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看完文件后邓小平说：这就够了。不需要之二、之三了。可以定罪了。[③] 邓小平还被接到玉泉山，听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和汪东兴介绍粉碎“四人帮”的经过。[④]

从 1977 年 1 月开始，群众要求恢复邓小平工作的呼声日益高涨。人民群众通过集会、演讲、刷大标语、写大字报等形式，声讨“四人帮”，肯定邓小平 1975 年主持整顿的成绩，表达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的迫切愿望。但华国锋还是认为时机不成熟，坚持邓小平出来工作问题应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在 1977 年 1 月 6 日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中，华国锋把他对

---

①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52 页。
②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52—153 页。
③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53 页。
④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54 页。

邓小平复出问题的想法和盘托出。他说：关于邓小平的问题，在处理“四人帮”问题的过程中反复考虑过，当时提出批邓反右是正确的。邓小平同志的问题是要解决的，实际上也在逐步解决，外电也看出了这个动向，开始提深入批邓，后来提继续批邓，现在又提“四人帮”批邓另搞一套。现在有人不主张这样搞，主张打倒“四人帮”后，小平马上出来工作。如果一打倒“四人帮”邓小平就马上出来工作，“四人帮”的人会说邓小平可能要上台，有人要给邓小平翻案。邓小平不是一个人，是一层人，如果急着给邓翻案，会带来问题。因为材料之一还没有发，问题没有澄清，坏人会乘机煽动。这样会被动的。如果急急忙忙提出要邓小平出来工作，那么四号、五号文件，毛主席处理的这些问题，还算不算数？吴德的讲话还算不算数？这样人家会不会说是为邓小平翻案？是不是不继承毛主席的遗志？

华国锋说：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不是为邓小平翻案，是反对“四人帮”搞阴谋、搞篡党夺权。“四人帮”反对毛主席，是极右。抓住这些问题进行斗争，才是正确的。如果打倒“四人帮”就马上提出解决邓小平的问题会引起混乱。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长期斗争的继续。他们是要篡党夺权。我们要抓住这个实质性的问题同“四人帮”斗争，把那些不急于解决的问题，往后拖，这样有利。有些问题要逐步解决，要经过适当步骤，把问题弄清楚，要服从同“四人帮”斗争这个大局，不要把问题搞颠倒了。当时这样的决策是对的。

他还说：现在提出问题的同志，有些是思想认识问题，有些是对批邓想不通，有些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有个别人是别有用心。有人过去批邓非常积极，现在提得也很激烈，说邓小平



不出来工作，会变成“五人帮”。这是不怀好意的。首钢有一派人，先逼中央解放邓小平，然后说你们不继承毛主席遗志，然后把王洪文抬出来。这个问题值得我们重视。解放军报出邓小平同志的名字，没有请示中央，这是不对的。博物馆展出了邓的照片。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在揭批“四人帮”的过程中，有些正在澄清，出来工作的问题，应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头脑要清醒。

他最后说：我们不是为邓小平翻案，是同“四人帮”作斗争。小平同志的问题，要解决，但不要急。我们这样解决的办法，小平同志自己也会理解的。有些不同的看法，不要紧，要引导，要讲清楚。

广大干部群众要求邓小平复出的这股强劲潮流引起了华国锋的高度重视，但他未能尽快顺应这股历史潮流，反而用“两个凡是”予以回应。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社论是经华国锋批准发表的。1977年2月，邓小平同前来看望的王震谈话，对“两个凡是”的提法提出异议，认为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毛泽东思想。①

1977年3月10日至20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会议开始前，华国锋就给各组组长打招呼，说有两个敏感问题，一个是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问题，一个是天安门事件平反的问题，希望各组讨论的时候不要触及。尽管如此，陈云、王震等老革命家还是冲破禁区，尖锐地触及了这两个敏感问题。

---

①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55页。

陈云在发言中明确指出：邓小平同志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听说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1]

王震发言说：邓小平同志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这是毛主席讲的，周总理传达的嘛！还说他能打仗、反修坚决。七五年主持中央和国务院工作，贯彻执行毛主席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取得了巨大成绩。他是同“四人帮”作斗争的先锋，“四人帮”千方百计地、卑鄙地陷害他。现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热切地希望他早日出来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2]

他们的发言内容在会内外传开，产生了重要影响。3 月 14 日，华国锋在全体会议上讲话，一方面，坚持认为确有极少数反革命分子，制造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认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毛主席定的，批是必要的。另一方面，又说：群众到天安门悼念周总理，是合乎情理的。还表示：经过调查，邓小平同志根本没有插手天安门事件。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应当解决，但是要有步骤，要有一个过程，只能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中央政治局的意见是，经过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和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正式作出决定，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这样做比较适当。[3] 陈云说：“时机成熟的时候，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我很赞成。”[4]

4 月 10 日，邓小平给华国锋、叶剑英和中共中央写信，对华国锋 3 月 14 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和代表中央政治局宣布

① 《陈云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30 页。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国史研究通讯》，1993 年第 4 期。
③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56 页。
④ 《陈云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450 页。

的在适当时机、通过一定程序让他出来工作的决定作出回应。邓小平在信中说："我感谢中央弄清了我同天安门事件没有关系这件事，我特别高兴，在华主席的讲话中，肯定了广大群众去年清明节在天安门是合乎情理的。至于我个人的工作问题，做什么，什么时机开始工作为宜，完全听从中央的考虑和安排。"针对"两个凡是"，邓小平在信中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邓小平在信中提出："如果中央认为恰当，我建议将我这封信，连同去年十月十日的信，印发党内。"4 月 14 日，邓小平致信华国锋、叶剑英，说明根据他们的意见，对 4 月 10 日那封信修改的有关情况。当天，华国锋在邓小平来信上批示："东兴同志：信及附件印发中央政治局同志，经研究后确定印发的范围。"①

4 月 14 日后，汪东兴、李鑫前来看望邓小平，同他谈中共中央转发他 4 月 10 日和 1976 年 10 月 10 日致中共中央信的有关情况。邓小平对他们讲：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一九七六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毛泽东同志自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他说，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又说，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常常改了

①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57 页。

又改呢？改了又改就是因为原来有些观点不完全正确，不那么完备、准确嘛。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他说：一个人能够“三七开”就很好了，很不错了，我死了，如果后人能够给我以“三七开”的估计，我就很高兴、很满意了。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该像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对待这个问题。①

邓小平又说：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我给中央写信，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这是经过反复考虑的。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我们要高举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②

5 月 3 日，中共中央将邓小平 1977 年 4 月 10 日和 1976 年 10 月 10 日致中共中央的信转发至县团级，实际上在党内相应范围内发出了邓小平即将复出的信息。

此时，要求邓小平复出的呼声更加高涨。在这样的情况下，华国锋作出顺乎党心民意的决定，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正式恢复邓小平的工作。1977 年 7 月 17 日，全会一致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决定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

7 月 21 日，邓小平在全会上讲话，说：作为一名老的共产党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国史研究通讯》，1994 年第四期。
②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8—39 页。

员，还能在不多的余年里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在我个人来说是高兴的。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应该老老实实地履行党员的责任，听从党的安排。[①]

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不仅是他个人的沉浮荣辱，它体现了党内外干部群众的强烈愿望，是对“两个凡是”的重大突破和根本否定，对于正确评价“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毛泽东晚年错误，恢复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具有重要意义。

邓小平恢复工作后，自告奋勇抓科学教育，很快就使科教事业走上了正轨。他推动恢复高考制度，推倒关于教育战线的“两个估计”，调动了亿万学生和广大教师的积极性，实现了教育领域的拨乱反正。

邓小平在恢复工作之前，就已经开始关注科学和教育问题了。1977 年 5 月 12 日，他约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方毅、李昌谈科学和教育工作问题。邓小平指出：整个国家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科学研究是先行官。抓科研就要抓教育。抓教育，关键在中学，中学又以小学教育为基础。中小学现在接不上茬，十年没有好好上课，数理化不行，外文也不懂。多数中学教师水平不高。因此，要抓好重点小学、重点中学。要加强教师的配备。要重新审定大中小学的教材。过去没有吸收外国先进的东西。

邓小平又指出：抓科研要注意选接班人。关键是人。方针正确，组织路线要跟上。加强党的领导，选好科研人员，选好后勤人员，很重要。

①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62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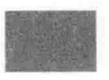
邓小平着重讲了搞好科研规划、明确指导思想的问题。他说：还要搞规划。要有一个明确的指导思想。现在各部门掌握的资料都不交流，保什么密？自己封锁自己。我们同国外的科技水平比，在很多方面差距拉大了，要赶上很费劲。我们要努力赶，你不赶，距离就更大了，人家是一日千里。世界发达国家都注意最新的科学成果。据说他们政府头头每天办公桌上都放一张每日科技新闻。中国在清朝时搞闭关自守，“四人帮”也是搞闭关自守。科学研究方面的先进东西是人类劳动的成果，为什么不接受？接受这些东西有什么可耻的？要花高价把世界上最新的资料买到手。要着手搞科学技术的长远规划。要抓重点学校、重点科研院所、重点人才、重点项目。要从问题堆里找长远的、根本解决问题的东西。为什么要抓理论研究？就是为了这个。讲空话不行，要有具体措施，统一认识。实事求是是毛主席讲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懂得这一条就有希望。

邓小平特别强调科研人员是劳动者。他说：一个时期，说科技人员是“臭老九”，连发明权都没有。科学研究是不是劳动？科研人员是不是劳动者？三大革命运动有科学实验嘛。科研人员搞点体力劳动是需要的，但他本身是脑力劳动者。自动化技术是以脑力劳动为主的。①

5月24日，邓小平在同王震、邓力群谈话时，又谈了他对科学和教育工作的一些思考。邓小平强调：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整整落后了二十年。抓科技必须同时抓教育。

---

①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57—159页。



办教育要两条腿走路，既注意普及，又注意提高。要经过严格考试，把最优秀的人集中在重点中学和大学。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反对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不论脑力劳动、体力劳动，都是劳动。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也是劳动者。[①] 这次谈话是5月12日同方毅、李昌谈话的继续，视野更加开阔，重点更加突出，说理更加透彻，对科学教育的指导思想、方针政策也更加明确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高等学校停止招生。1970年毛泽东发布“大学还是要办的”指示后，高等学校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采取推荐与选拔的方法，导致招生工作中“走后门”的风气越来越严重。1972年，周恩来提出要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收大学生，但由于“四人帮”的拖延和破坏，这一建议未能执行。1975年，邓小平再提此议，又因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遭到批判而搁浅。此次复出并主管科学和教育工作后，邓小平再次将恢复高考这一战略问题提上日程。

1977年7月29日，邓小平在听取教育部负责人汇报工作时提出：“是否废除高中毕业生一定要劳动两年才能上大学的做法?”[②] 8月8日，他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指出：“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③]

教育部根据邓小平的指示，于8月13日起在北京召开第二次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会上发生了激烈争论。由于教育

---

①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60页。

②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67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5页。

部门个别领导受“两个凡是”的束缚，不敢改革高校招生制度，怕否定“两个估计”，触犯“两个凡是”，对邓小平的正确主张抱犹豫、观望态度，恢复高校招生考试制度又一次陷入困境。

9月19日，邓小平同教育部主要负责同志谈话。针对会上激烈争论的问题，他再次重申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生的主张。他说：“为什么要直接招生呢？道理很简单，就是不能中断学习的连续性。十八岁到二十岁正是学习的最好时期。过去我和外宾也讲过，中学毕业后劳动两年如何如何好。实践证明，劳动两年以后，原来学的东西丢掉了一半，浪费了时间。”关于招生条件，邓小平说：“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政治历史清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有这几条，就可以了。”①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会议决定恢复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制度。教育部发出了在邓小平指导下拟订并经邓小平亲自修改的招生工作意见。10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招生工作文件。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意见》，中断10年的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恢复了。

10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搞好大学招生是全国人民的希望》。社论说：高等学校的招生工作，直接关系大学培养人才的质量，影响中小学教育，涉及各行各业和千家万户，是一件大事。今年，高等学校的招生工作，采取自愿报名，统一考试，地市初选，学校录取，省、市、自治区批准的办法。凡是符合招生条件的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

---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7—69页。

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均可自愿报名，并可根据自己的爱好和特长，选报几个学校和学科类别，让祖国进行挑选。这样做，为的是广开才路，提高质量，早出人才，早作贡献，以适应国家建设的迫切需要。为了保证招生质量，必须坚持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的原则。文化考试，是考查学生政治理论、文化水平的重要方法之一，是择优录取的主要依据之一，一定要抓好。

恢复高考制度，是一项深得人心的重大决策，此举涉及各行各业和千家万户，是一件功在千秋的大事，也是教育战线拨乱反正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标志。

教育战线的“两个估计”，是1971年7月姚文元修改、张春桥定稿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里提出来的，即“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两个估计”沉重地打击了教育战线的干部师生，严重地搞乱和禁锢了人们的思想。推倒“两个估计”是教育战线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关键。邓小平亲自抓这件事，作为全国各条战线拨乱反正的突破口。

1977年8月8日，邓小平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谈了对十七年的估计问题。他说：主导方面是红线。十七年中，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不管是科学工作者还是教育工作者，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努力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现在各条战线的骨干力量，大都是建国以后我们自己培养的，特别是前十几年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①]

---

①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78页。

9月19日，邓小平再次同教育部主要负责人谈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问题，指出“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他说：怎么能把几百万、上千万知识分子一棍子打死呢？我们现在的人才，大部分还不是十七年培养出来的？对这个《纪要》要进行批判，划清是非界限。《纪要》是毛泽东同志画了圈的。毛泽东同志画了圈，不等于说里面就没有是非问题了。我们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词，就是“实事求是”四个大字，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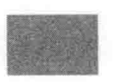
邓小平这次谈话后，教育部即组织写作班子起草批判文章。11月1日，邓小平审阅《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一文的修改稿，作出批示：“我看虽写得不算很好，但可用，先念、东兴、方毅同志审改后送请华主席审定。”[②] 11月18日，文章以教育部大批判组名义在《人民日报》发表。

《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揭露了“四人帮”对毛泽东指示的封锁和篡改，批判了“四人帮”破坏教育事业的罪行，驳倒了“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恢复了毛泽东关于教育工作估计的本来面目，砸掉了束缚知识分子的枷锁。文章发表后，不单教育战线掀起了批判“两个估计”的热潮，意识形态领域各部门及其他各条战线等也都结合自身情况，掀起了深入揭批“四人帮”、肃清其流毒的热潮，有力地推动了拨乱反正的进程和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

邓小平在推动教育领域拨乱反正的同时，在思想领域强调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旗帜鲜明地反对“两个凡是”的错

①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03—204页。

②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34页。



误观点，支持和领导开展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1978 年 5 月 11 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提出了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而且是“唯一标准”，任何理论都要接受实践检验的重要观点，拉开了一场全国性真理标准讨论的序幕。

文章指出：一个理论，是否正确反映了客观实际，是不是真理，只能靠社会实践来检验。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原理。正是实践，也只有实践，才能够完成检验真理的任务。凡是科学的理论，都不会害怕实践的检验。相反，只有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才能够使伪科学、伪理论现出原形，从而捍卫真正的科学与理论。客观世界是不断发展的，实践是不断发展的。新事物新问题层出不穷，这就需要在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指导下研究新事物、新问题，不断作出新的概括，把理论推向前进。

文章尖锐地指出：当前仍然存在着“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错误倾向，现在，“四人帮”及其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已被摧毁，但是，“四人帮”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还远没有完全粉碎。无论在理论上或实际工作中，“四人帮”都设置了不少禁锢人们思想的“禁区”，对于这些“禁区”，我们要敢于去触及，敢于去弄清是非。科学无禁区。凡有超越于实践并自奉为绝对的“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就没有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只有蒙昧主义、唯心主义、文化专制主义。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这种态度是错误的。

文章发表后，受到来自最高层的指责。5 月 17 日，当时主管宣传工作的中央负责同志表态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这篇文章“理论上是荒谬的，思想上是反动的，政治上是砍旗帜的”。华国锋指示中共中央宣传部对这种讨论“不表态”、“不介入”。[①]

与指责和批评相反，邓小平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观点给予了坚决有力的支持。

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批评了把坚持实事求是等说成是“犯了弥天大罪”的奇谈怪论，批评了“两个凡是”的观点，有力地支持了真理标准的讨论。他指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但是，一定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总结过去的经验，分析新的历史条件，提出新的问题、新的任务、新的方针。这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

邓小平着重讲了实事求是的问题。他说：我们开会，作报告，作决议，以及做任何工作，都为的是解决问题。我们说的做的究竟能不能解决问题，问题解决得是不是正确，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够理论联系实际，是否善于总结经验，针对客观现实，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一切从实际出发。我们只有这样做了，才有可能正确地或者比较正确地解决问题，而这样地解决问题，究竟是否正确或者完全正确，还需要今后的实践来检验。如果我们不这样做，那我们就一定什么问题也不可能解决，或者不可能正确地解决。

他说：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

① 转引自程中原、王玉祥、李正华：《转折年代——1976—1981年的中国》，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93页。



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是违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怎么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

他还说：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这是唯物主义。不然，我们开会就只能讲空话，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邓小平回顾了毛泽东的光辉革命实践，指出：毛泽东同志从参加共产主义运动、缔造我们党的最初年代开始，就一直提倡和实行对于社会客观情况的调查研究，就一直同理论脱离实际、一切只从主观愿望出发、一切只从本本和上级指示出发而不联系具体实际的错误倾向作坚决的斗争。

他指出：我们领导干部的责任，就是要把中央的指示、上级的指示和本单位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不能当“收发室”，简单地照抄照转。

邓小平还说：我们应该也只能采取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方法，总结过去的经验，分析新的历史条件，提出新的问题、新的任务、新的方针。如果我们只把过去的一些文件逐字逐句照抄一通，那就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更谈不到正确地解决什么问题。[①] 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大会上的讲话，对真理标准讨论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随着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不断展开和深入，邓小平对一些给这场讨论制造障碍的人进行了批评。7 月 21 日，邓小平对中共中

①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13—125 页。

央宣传部部长张平化说："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再把刚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向后拉。"[1] 8月19日，邓小平在同文化部负责人谈到理论问题时说："我说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是驳不倒的，我是同意这篇文章的观点的。但有人反对，说是反毛主席的，帽子可大啦。"[2] 11月，邓小平通过对谭震林应《红旗》杂志约稿撰写又遭拒登的《井冈山斗争的实践与毛泽东思想的发展》一文的批示，严肃地批评了《红旗》对真理标准讨论的消极态度："我看这篇文章好，至少没有错误。我改了一下，如《红旗》不愿登，可以送《人民日报》登。为什么《红旗》不卷入？应该卷入。可以发表不同观点的文章。看来不卷入本身可能就是卷入。"[3]

邓小平的支持，有力地推动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在全国的展开和深入。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是在邓小平等中央负责同志领导和支持下的一场全国范围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解放运动。它冲破了长期以来"左"的错误思想的束缚，打碎了"两个凡是"和个人崇拜的精神枷锁，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

①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345页。
②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359页。
③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444页。

第十六章 领导核心

DI SHI LIU ZHANG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创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邓小平在全会前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这个讲话实际上是这次全会的主题报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并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经过这次全会，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京西宾馆举行了为期36天的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为随即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做了充分准备。

中央工作会议的原定议题有三项：（一）讨论如何进一步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的问题。（二）商定1979、1980两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安排。（三）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

主持会议的华国锋在宣布上述议题时同时宣布："中央政治局决定，在讨论上面这些议题之前，先讨论一个问题，这就是：要在新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的指引下，从明年一月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动员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鼓足干劲，全力以赴，为加快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奋斗。"他指出："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政治局一致认为，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及时地、果断地结束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是完全必要的。""这是一个关系全局的问题，是我们这次会议的中心思想。"会议要求，头两三天讨论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问题。请大家出主意，想办法，畅所欲言，集思广益。这以后，再讨论前面所讲的三项议题，这些讨论也都要围绕着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个中心问题来进行。[①]

及时结束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是邓小平 1978 年 9 月在东北视察工作时首先提出来的。针对华国锋"抓纲治国"要搞好几年的方针，邓小平在沈阳军区的讲话中指出，批林彪也好，批"四人帮"也好，怎样才叫搞好了，要有几条标准。对搞运动，你们可以研究，什么叫底？永远没有彻底的事。运动不能搞得时间过长，过长就厌倦了。究竟搞多久，你们研究。有的单位，搞得差不多了，就可以结束。[②] 又说，揭批"四人帮"运动总有个底，总不能还再搞三年五年吧！要区别一下哪些单位可以结束，有百分之十就算百分之十，这个百分之十结束了，就转入正常工作，否则

① 转引自《陈云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476 页。

②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382—383 页。

你搞到什么时候。①

10月11日，邓小平在工会九大致词中重申了这个意见。他说："很明显，林彪、'四人帮'在工人队伍中所散布的流毒和造成的恶果，还要下很大的功夫去肃清，整顿队伍的工作还要在每个企业中完全落实。我们一定要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但是同样很明显，这个斗争在全国广大范围内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我们已经能够在这一胜利的基础上开始新的战斗任务。"②

邓小平关于及时实现工作重点转移的战略决策，得到华国锋的高度重视及中央政治局的一致同意。华国锋对为他起草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讲话稿的李鑫说，不要再强调揭批"四人帮"第三战役了，现在要强调经济建设。李鑫问：第三战役不是政治局决定的吗？华国锋回答说：邓小平同志在沈阳讲了这个问题，政治局都同意。③

中央工作会议开始后，由于绝大多数与会者的意志，会议没有按照原定议题进行讨论，而是集中讨论了陈云提出的一些重大历史遗留问题，以及关于真理标准讨论问题、关于健全党内民主问题以及中央人事调整问题等。

邓小平因11月5日出访东南亚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11月14日才回国，所以没有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开幕会。但他回国后，很快就把注意力放到会议上，并在许多场合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谈话。

11月25日，邓小平和其他中央政治局常委一起，听取中共

---

①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94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5页。

③ 转引自程中原：《与哈佛学者对话当代中国史》，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7页。

北京市委和团中央几位负责人汇报天安门事件平反后群众的反应和北京市街头大字报的情况。当时西单墙的大字报中，有的要求公布“四五”惨案的内幕，有的要求起诉阴谋的策划者，成立天安门事件调查委员会。大字报上有不少小字批语，写着“坚决支持”“好得很”等等。针对这些情况，邓小平等中央政治局常委讲了一些重要意见，事后形成一个常委指示记录要点。这些指示主要是邓小平的话。记录要点上有这样一些内容：

天安门事件平反后，群众反应强烈，大家很高兴，热烈拥护，情况是很好的。当然，也出现一些问题。有的大字报提出要追查天安门事件的打人凶手，要追究一些同志的责任，有的甚至追到了毛主席。对这种情况，我们的工作要跟上去，要积极引导群众，不能和群众对立。……另一方面，对大字报不能任其自流。……我们一定要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毛主席的旗帜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团结的旗帜，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旗帜。现在，有的人提出一些历史问题，有些历史问题要解决，不解决就会使很多人背包袱，不能轻装前进。有些历史问题，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不能勉强去解决。有些事情我们这一代人解决不了的，让下代人去解决，时间越远越看得清楚。有些问题可以讲清楚，有些问题一下子不容易讲清楚，硬要去扯，分散党和人民的注意力，不符合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一些问题总要有一个暴露和认识的过程。对一些具体问题，要实事求是地、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原则去解决。现在报上讨论真理的标准问题，讨论得很好，思想很活泼，不能说那些文章是对着毛主席的，那样人家就不好讲话了。但讲问题，要注意恰如其分，要注意后果。……报纸要十分谨慎。迈过一步，真理就变成谬误了。毛主席的伟大功勋是不可磨灭的。中国历史证明，陈独秀、

王明、李立三……都不行，只有毛主席能领导我们走向胜利。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毛主席的伟大，怎么说也不过分，不是拿言语可以形容得出来的。毛主席不是没有缺点错误的，但与他的伟大功勋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外国人问我（邓副主席），对毛主席的评价，可不可以像对斯大林评价那样三七开？我（邓副主席）肯定地回答，不能这样讲。党中央、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干赫鲁晓夫那样的事。现在中央的路线，就是安定团结，稳定局势，搞社会主义现代化。……人心思定，人心思治，人心思上，乱是脱离群众的。国际上也十分注意我们国内局势是不是能够保持稳定。现在外国反应很大，香港有些报纸都在议论，你们那么多问题，应当稳当一点嘛，何必那么急，急了会出问题。……引进新技术，利用外资，你稳定了，人家才敢和你打交道；你乱了起来，别人就不敢和你打交道了。安定团结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必要政治条件，不能破坏安定团结的局面。这是中央的战略部署。……这是大局，我们处理任何问题，都要从大局着眼，小局服从大局，小道理服从大道理。不搞什么新运动，不要提中央没有提的什么运动。要引导群众向前看。……平反工作，中央和各地都在抓紧处理，都是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的。群众要求解决的问题，都有解决的渠道，可以在党的会议上提出来，可以写信、来访。林彪、“四人帮”破坏造成的一些遗留问题，都可以逐步解决。解决这些问题是为了创造一个安定团结的稳定局势，把各种积极因素调动起来。①

26 日和 27 日，邓小平先后接见日本民主社会党委员长佐佐木良作和美国专栏作家罗伯特·诺瓦克，讲了同 25 日大致相同

① 朱佳木：《我所知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81—83 页。

的话。

关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邓小平说：毛主席在中国历史上的伟大功绩是难以用言语表达的。在中国，人人都懂得“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我们在实现四个现代化进程中，要善于完整地准确地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要生动活泼，心情舒畅。

关于平反冤假错案，邓小平说：毛主席一贯主张“有错必纠”。天安门事件是个错案，当然必须纠正。不只是天安门事件，如果有些问题处理不正确，也必须实事求是地加以纠正。有错必纠这正是我们有信心的表现。这样全国人民才能心情舒畅，大家向前看，一心搞好四个现代化。

关于群众议论的问题，邓小平说：群众的议论，并非一切都是深思熟虑过的，也不可能要求都是完全正确的，这不可怕。我国绝大多数人民群众鉴别是非的能力和关心国家命运的觉悟是了不起的。广大群众是要求安定团结的，是顾全大局的。有些问题群众有疑问，有些话对安定团结、实现四个现代化不利，要向群众说清楚，要善于领导。①

27 日晚，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等中央政治局常委听取各组召集人汇报。大家又反映了代表们在发言中提到的一些问题，如“二月兵变”、“一月风暴”、纪登奎的错误、对毛泽东的评价等等。针对这些问题，邓小平重申了他 25 日、26 日、27 日的讲话精神。

在华东组提出“二月兵变”需要澄清时指出：我那时就说，这个事不可能。当时我是总书记，但调两个团到北京也不行。那

① 《新华月报》1978 年第 12 期，第 1—2 页。

时规定，调一个连，归大军区管，调一个营，归军委、总参谋部管。在华东组提出对"一月风暴"的评价问题迟讲不如早讲时指出："一月风暴"问题，势必要解决，还是早一点讲好。就西南组提出为天安门事件、"六十一人叛徒集团"、"二月逆流"和彭德怀、陶铸冤案等问题平反，势必涉及对毛主席的评价问题，建议中央应有一个统一的说法时，指出：毛主席那时身体不好，连华国锋同志也不能见到他。在大家提出邓小平 11 月 26 日同日本民社党佐佐木良作谈话的十九条可否向干部传达，并根据谈话精神向群众做工作时，强调：那个谈话的概括基本正确。毛主席的伟大功勋是不可磨灭的。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毛主席的伟大，怎么说也不过分，不是拿语言可以形容得出来的。毛主席不是没有缺点错误的，我们不能要求伟大领袖、伟大人物、思想家没有缺点错误，那样要求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毛主席讲马克思、列宁写文章就经常自己修改嘛。对毛主席的缺点错误，这个问题是不能回避的，在党内还是讲一讲好。外国人问我，对毛主席的评价，可不可以像对斯大林评价那样三七开？我肯定地回答，不能这样讲。党中央、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干赫鲁晓夫那样的事。在中南组提出康生的问题时，针对《五一六通知》附件二讲《二月提纲》是背着康生搞的这一说法，指出：他是《二月提纲》的组织人之一。在谈到对中央几个有错误的领导人如何处理的问题时指出：现在国际上就看我们有什么人事变动，加人可以，减人不行，管你多大问题都不动，硬着头皮也不动。这是大局。好多外国人要和我们做生意，也看这个大局。①

12 月 1 日，鉴于代表们的注意力没有转到讨论经济工作问题

①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440—441 页。

上，中央政治局常委又召集部分大军区司令员和省委第一书记开会，通过他们向会议打招呼。邓小平就以下几个问题作了重要谈话。他说：

历史问题只能搞粗，不能搞细。一搞细就要延长会议，这就不利。算我一个请求，要以大局为重，道理在你们，在群众。外国人对其他事没兴趣，主要看中国安定不安定。我是有意识地"和稀泥"，只有"和稀泥"是正确的。我们想同美国在明年1月1日达成建交协议，等公报出来再同他们谈，不然他就要翘尾巴。

对中央的人事问题，任何人都不能下，只能上。对那几个同志要批评，但不能动，实际上不止他们几个。现有的中央委员，有的可以不履行职权，不参加会议活动，但不除名，不要给人印象是权力斗争。对那些大家有意见的人，过关算了。检讨没有全过关的，我们过去也没过关嘛。

关于上的问题，至少加三个政治局委员，太多，也不恰当，不容易摆平。加上几个什么人？陈云，兼纪委书记；邓大姐、胡耀邦。够格的人有的是，如王胡子（指王震），也够格。两个方案，一个是三个人，一个是四个人。党章规定，中央委员会不能选中央委员，想开个例，补选一点，数目也不能太多。有几个第一书记还不是中央委员，如习仲勋、王任重、周惠，还有宋任穷、韩光、胡乔木、陈再道。将来追认就是了。

1957年反右派斗争是正确的，但后来扩大化了。对"文化大革命"现在也要回避，不能追。清华几个青年贴大字报说："反周民必反，反毛国必乱。"这个话水平很高。①

由上可见，邓小平从11月14日出访回国后直至12月13日

① 转引自朱佳木：《我所知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当代中国出版社2008年版，第85—86页。

中央工作会议闭幕这段时间里，发表了不少指导会议发展进程的重要讲话，显示他已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居于核心地位。

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邓小平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著名讲话。这篇讲话是邓小平亲自主持起草的。讲话原定主题是实行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中央工作会议开始后，会场内外形势的变化使工作重点转移的问题变得不那么突出了。在这样的情况下，邓小平决定他的讲话稿要重起炉灶。

12月2日，邓小平约见胡耀邦、胡乔木、于光远，谈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稿问题。根据中央工作会议上出现的新问题，提出讲话稿的主要内容要转到反映真理标准问题、发扬民主问题、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问题和经济管理体制问题上。此前，邓小平亲笔拟出讲话提纲："一、解放思想，开动机器。理论的重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争论的必要。实事求是，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全党全民动脑筋。二、发扬民主，加强法制。民主集中制的中心是民主，特别是近一时期。民主选举，民主管理（监督）。政治与经济的统一，目前一时期主要反对空头政治。权力下放。千方百计。自主权与国家计划的矛盾，主要从价值法则、供求关系（产品质量）来调节。三、向后看为的是向前看。不要一刀切。解决遗留问题要快，要干净利落，时间不宜长。一部分照正常生活处理。不可能都满意。要告诉党内外，迟了不利。安定团结十分重要，要大局为重。犯错误的，给机会。总结经验，改了就好。四、克服官僚主义、人浮于事。一批企业做出示范。多了人怎么办，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扩大管理人员的权力。党委要善于领导，机构要很小。干什么？学会管理，选用人才，简化手续，改革制度（规

章)。五、允许一部分先好起来。这是一个大政策。干得好的要有物质鼓励。国内市场很重要。六、加强责任制,搞几定。从引进项目开始,请点专家。七、新的问题。人员考核的标准。多出人员的安置(开辟新的行业)。”[①]

12月5日,邓小平约见胡乔木、于光远、林涧青,谈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稿问题,再次就讲话稿的主题、内容、文字和结构发表意见。在谈话中说:要解放思想,开动机器,一切向前看,否则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应该允许出气,出气是对没有民主的惩罚。有了正常的民主,大字报也就少了。建立健全民主与法制,实行经济民主,用经济的办法管经济,责任到人,做到有职有责有权。没有民主培养不出人才。[②] 12月9日,再次约见胡乔木、于光远、林涧青,谈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稿的修改问题。认为稿子基本上可以了,但还需要加加工,并讲了具体修改意见。11日,约见胡耀邦、于光远、林涧青,继续谈他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讲话稿的修改问题。之后,将修改稿送华国锋阅。[③]

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邓小平发表了这一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讲话。讲话共分四个部分:

第一,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

邓小平指出: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

---

①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45—446页。
②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48页。
③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49页。



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

他分析了思想不解放的主要原因：一是因为十多年来，林彪、“四人帮”大搞禁区、禁令，制造迷信，把人们的思想封闭在他们假马克思主义的禁锢圈内，不准越雷池一步。二是因为民主集中制受到破坏，党内确实存在权力过分集中的官僚主义。三是因为是非功过不清，赏罚不明，干和不干一个样，甚至干得好的反而受打击，什么事不干的，四平八稳的，却成了“不倒翁”。四是因为小生产的习惯势力还在影响着人们。

他还有针对性地指出了思想僵化的严重危害：思想不解放，思想僵化，很多的怪现象就产生了。思想一僵化，条条框框就多起来了；思想一僵化，随风倒的现象就多起来了；思想一僵化，不从实际出发的本本主义也就严重起来了。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

他分析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实质和意义，把全党的认识提到一个新高度：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就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第二，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

邓小平指出：解放思想，开动脑筋，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就是要真正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我们需要集中统一的领

导，但是必须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确的集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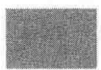
他强调民主的极端重要性：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因为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我们要创造民主的条件，要重申“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在党内和人民内部的政治生活中，只能采取民主手段，不能采取压制、打击的手段。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现在党内外小道消息很多，真真假假，这是对长期缺乏政治民主的一种惩罚。

他着重讲了发扬经济民主的问题：现在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计划地大胆下放，否则就不利于充分发挥国家、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积极性，也不利于实行现代化的经济管理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当前最迫切的是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同样，要切实保障工人农民个人的民主权利，包括民主选举、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

邓小平还联系民主，强调了加强法制的重要性：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国要有国法，党要有党规党法。没有党规党法，国法就很难保障。

第三，处理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

邓小平指出：这次会议，解决了一些过去遗留下来的问题，分清了一些人的功过，纠正了一批重大的冤案、假案、错案。这是解放思想的需要，也是安定团结的需要。目的正是为了向前看，正是为了顺利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变。我们的原则是“有错必纠”。凡是过去搞错了的东西，统统应该改正。有的问题不



能够一下子解决，要放到会后去继续解决。但是要尽快实事求是地解决，干净利落地解决，不要拖泥带水。对过去遗留的问题，应当解决好。但是，不可能也不应该要求解决得十分完满。要大处着眼，可以粗一点，每个细节都弄清不可能，也不必要。

针对解决历史问题中涉及到的毛泽东评价问题，邓小平强调指出：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当然，毛泽东同志不是没有缺点、错误的，要求一个革命领袖没有缺点、错误，那不是马克思主义。

对大家关心的“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邓小平也提出了原则意见：关于文化大革命，也应该科学地历史地来看。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总要总结，但是不必匆忙去做。要对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做出科学的评价，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那时再来说明这一段历史，可能会比我们今天说得更好。

第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邓小平指出：要向前看，就要及时地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否则我们就不可能顺利前进。各方面的新情况都要研究，各方面的新问题都要解决，尤其要注意研究和解决管理方法、管理制度、经济政策这三方面的问题。

针对管理体制上存在的问题，邓小平强调克服官僚主义、加强责任制：在管理方法上，当前要特别注意克服官僚主义。现在，我们的经济管理工作，机构臃肿，层次重叠，手续繁杂，效率极低。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

事业就会被葬送。在管理制度上，当前要特别注意加强责任制。要使责任制真正发挥作用：一要扩大管理人员的权限。二要善于选用人员，量才授予职责。三要严格考核，赏罚分明。

他特别强调，在经济政策上，要允许一部分人收入先多起来，生活先好起来：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建议同志们认真加以考虑和研究。①

邓小平的这个讲话虽然是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的，但实际上成为随后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江泽民在中共十五大报告中对邓小平的这个讲话予以高度评价，认为这篇讲话“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②

12 月 18 日至 22 日，邓小平出席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全会指出，现在就应当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及时地、果断地结束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

---

①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40—153 页。

② 《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0 页。

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这次全会标志着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实现了建国以来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创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经过这次全会，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

1989年6月16日，邓小平在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前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建立了一个新的领导集体，这就是第二代的领导集体。在这个集体中，实际上可以说我处在一个关键地位。”① 1997年2月25日，江泽民在邓小平追悼大会上的悼词中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建国以来党和国家历史的伟大转折，开辟了改革开放和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经过这次全会，邓小平同志成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② 2004年8月22日，胡锦涛在邓小平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邓小平同志成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③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9页。
② 《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31页。
③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50页。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2.《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4.《邓小平军事文集》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5.《邓小平军事文集》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6.《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

7.《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上、中、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8.《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9.《邓小平画传》，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10. 邓榕著：《我的父亲邓小平：战争年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

11. 邓榕著：《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从中央委员到领导核心　1945-1978年间的邓小平
作者=张金才著
页数=264
SS号=13834200
DX号=
出版日期=2015.05
出版社=河北人民出版社